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书

前 言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他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不仅领导我们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而且还以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为党和国家重新走在时代潮流前面，为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规划了崭新的和切合实际的宏伟蓝图。他立足中国大地而又面向世界，正视国情现实而又放眼未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高瞻远瞩地构思和设计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发展战略。他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进行艰辛的锲而不舍的理论探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曾在江西战斗、工作过。在这期间，他有顺利的发展，也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他曾因坚持正确的主张而受到错误的打击，在江西经历了革命生涯中艰难、曲折的时期。邓小平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过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出色地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地方政权建设，建立巩固的红色区域，支援革命战争，建树了卓著的历史功勋。但他又因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抵制中共临时中央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遭到错误的斗争和处分。然而，他仍然对党襟怀

坦荡，忠心耿耿，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继续坚定地履行他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所应尽的义务，继续在革命斗争崎岖而又艰难的道路上奋进。以后他在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机关报《红星》主编。遵义会议前，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扣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帽子，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押送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危难之时，他矢志不渝，坚贞不屈。除了参加劳动，他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以后并获准在江西境内调查研究。他在深深的思考着，从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他在江西度过了五个年头的艰难岁月。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始终坚信党和人民会作出正确的选择。他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念、智慧、魄力和威望，以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中所建立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爱戴。

人民爱戴邓小平，邓小平与人民心连心。他时常惦记着江西革命老根据地的父老乡亲，关心着江西的山山水水。新中国建立后，他对红色故土一往情深，多次到江西视察工作，多次为江西题词，缅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勉励江西人民发扬革命传统，建设好江西。1992年1月30日，邓小平结束南巡途经江西时，特地在鹰潭停留，对江西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鼓舞和激励江西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争取更大光荣。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传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

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为了帮助人们了解邓小平漫长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光辉革命生涯，学习邓小平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他的战略思想、理论观点、科学态度、创造精神，学习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的鲜明的革命风格，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做好党史资料征集、整理、编纂和加强党史宣传教育的指示，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将现已征集到的史料加以整理选编，特编纂了《邓小平在江西》一书。我们怀着对邓小平崇敬和爱戴的心情，力求本书能从几个不同阶段反映邓小平同志在江西战斗、工作和生活的若干侧面，使人们从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吸收丰富的政治营养。

《邓小平在江西》一书收录了散见于其他报刊图书中有关邓小平在江西工作和生活的文字史料，也有新整理的资料。书前收入邓小平在江西活动的照片，书后附录了邓小平在江西活动的大事记，供读者参考。鉴于我们收集选编的史料有限，加之水平不高，难免有遗漏和不当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指正。

在本书的编纂中，有关地、市、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提供了部分文字和图片资料，李新华拍摄了一部分图片和全部图片翻拍、洗印。刘端秤、章志红、胡小珍、王天照、萧丹、熊华也参加了部分工作。在此对他们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本书于1994年11月第一次印刷出版。如今为缅怀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同志，特再次印刷、并更名为《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奉献给广大读者。

编者

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

1931—1934：邓小平在中央苏区 瑞金与中央苏区

1931年7月中旬；父亲和阿金两人由上海上船，到广东汕头上岸，找到了交通站，即由交通站派一广东同志带路，径直北上，经广东边界大埔，顺利地进入福建的永定，这里已经进入中央苏区的地界。然后，他们再向西北经上杭、汀州（长汀），最后向西，跨过闽赣边界，到达江西的瑞金。

这时已是1931年8月间。

瑞金，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1927年8月南昌起义失败后，9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认为，目前攻打中心城市不可能取得胜利，应把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中去，保存力量，继续坚持斗争，以发展革命力量，并决定向湘赣边界的山区进军，在湘赣交界之处的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和军队要把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三项任务结合起来。而井冈山地处江西、湘南之间，远离敌人中心城市，且山势险要，易于攻守。这个地区曾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地方群众基础较好，还有中共的地方组织和地方群众武装，最宜作为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成为武装夺取政权的一个伟大转变的起点。

1927年底到1928年，由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广州起义部队和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相继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功地在井冈山开辟了一片革命的区域，并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经中央批准，决定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即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全军下辖三个师九个团，共一万余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1928年底，敌人成立了湘赣两省“剿匪”总部，纠集了二十五个团，约二万余人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猛扑。

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1929年1月，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红四军三千六百人的主力开始向赣南转移，留彭德怀率红五军等留守井冈山。

2月，红四军攻占赣东肩的宁都，此后由于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将湘粤赣三省军队抽调到武汉地区，闽赣境内空虚，乘机机会，红四军先进闽西，再转赣南，连克闽西长汀，赣南瑞金、于都、兴国、宁都等县。到了6月，红四军在赣南、闽西边境进行游击战，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相继建立了十多个县的红色政权。

1930年，红四军打退了敌人的“会剿”，排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又打通了赣、闽、粤三省红色区域的联系，解放了赣南大片土地，建立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等各项工作蓬勃开展。1930年初，闽西革命根据地已扩大为拥有八十五万人口、纵横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八十万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到了土地，各县普遍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

1930年6月，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红四军前委将红四军、红六军等部

队整编，成立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红军在赣南、闽西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形成了比较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

1930年10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掉转头来，集中兵力，“围剿”他的心腹之患，红军。国民党军十万部队，于11月间开始向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毛泽东、朱德采取了机智灵活的战略战术，先是诱敌深入，而后中间突破，接着各个击破，到12月30日，全歼敌军九千余人，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蒋介石经此惨败，并未罢休，狂妄地叫嚣要“三个月内消灭共军”。1931年2月，蒋介石令何应钦带队，调军二十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制定了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红军三万余人，经过十五天的激战，横扫七百余里，打了五个胜仗，缴枪二万余枝，痛快淋漓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闻讯气急败坏，立即又于1931年7月，集中三十万兵力，亲任总司令，还带着德国的、日本的和英国的军事顾问，坐镇江西省会南昌，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

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毛泽东提出“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采用盘旋式打圈子的方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声东击西，巧妙回旋，使得敌人不知红军主力何在，成天疲于奔命地追踪，却又屡遭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的袭击。经三个月的时间，敌军最后撤退，而我军则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枝。

蒋介石亲自出马督阵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就这么的失败了。

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及周围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包括二十一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的中央苏区。

蒋介石不顾民心，不顾国耻，“先安内，后攘外”的如意算盘，在坚不可摧的红军面前，彻底破产。

父亲到达江西瑞金是1931年8月，其时正是红军主力反击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时刻。

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父亲到那里后，发现瑞金县的党政领导权，已被反革命分子篡夺，许多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仅瑞金县城对面的一个山上就有百余人被杀害，群众情绪很大，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正在瑞金，由上海党中央派到中央苏区工作的余泽鸿也到了瑞金。当时他们与上级还没有建立联系，他们和邓小平一起商议，推举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后，邓小平和谢唯俊、余泽鸿二人，首先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革命干部平了反，然后召开了县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并着手发动群众。不久，瑞金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发挥起来了，特别是大多数本地的农民干部情绪很高。有了大批的群众和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本地干部的支持，全县局面大为改观。

在第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中华苏维埃的政权中心迁到瑞金，瑞金由此成为享誉全国的“红都”。

为了庆祝第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红都”瑞金召开了五万人的盛大祝捷大会。父亲说过，由于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扩音设备，因此大

会分设在四五个会场。父亲是大会的主持人，他曾陪同毛泽东到各个会场讲话。

那种庆祝胜利的场面，真是红旗标语如海，口号欢呼鼎沸，整个瑞金一片革命热情高涨。

有了在广西革命根据地开展地方工作的经验，使得父亲在瑞金的工作进行得得心应手，十分顺利。

对于在瑞金的这一段经历，时间虽短，父亲却常常提起。1992年的一天，我们全家在吃饭，我弟弟六岁的儿子小弟饿极了，吃得狼吞虎咽的。看着小孙子这么能吃的样子，爷爷笑了，他说：“我们在瑞金工作的时候，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后来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你们看，小弟不就是三岁小子，吃死老子！”我们都笑了，我对父亲说：“应该是六岁小子，吃死爷爷！”

父亲肚子里的故事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就是他大不爱讲述自己的过去了。如果他能像这次这样多讲点儿，我就可以“多捞点稻草”了，这本书也就可以更加生动一些了！

父亲在瑞金担任县委书记不到一年的时间。1932年5月，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将邓小平调离瑞金，到瑞金以南的会昌担任县委书记。

1972年秋天，父亲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被打倒后滴居江西时，他和母亲二人曾获准在江西境内“调查研究”。他们从南昌南下，先到井冈山，凭吊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遗址，后向东南，到瑞金、会昌、寻乌等地，这次到瑞金，离他在瑞金当县委书记，已时隔四十春秋有一之久，虽然他当时，还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未复出工作，但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给予了他热情的接待。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曾令父亲感动不已。在他蒙冤遭受

打击的时候，老区人民还惦念着他。

在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逐步推行到中央苏区和其他各革命根据地。

1931年6月，“左”倾错误统治的党中央给红军及各地方党组织发出训令，说由于反动统治的政治危机继续增长，革命力量逐渐发展，当前党的紧急任务是力争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实现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区。这个训令，就是要红军不顾现实状况地去攻击比我们力量强大得多的敌军，把整个的湖南、湖北和江西都变成苏区。

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又错误地决定，革命时机正在全中国成熟，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在望，红军要不给敌人喘息机会，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王明中央还气势汹汹地指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加深与组织上的巩固，是实现上述任务的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

为了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组织上发展了宗派主义。对于那些对“左”倾政策怀疑，不满或不积极拥护和坚决执行的人，一律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并对这些同志在组织上和人身上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使用对敌人的斗争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

1931年4月，上海的党中央派出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中央代表一到中央苏区，就像太上皇一样发号施令，横加指责。他们劈头就指责，红一方面军的前委和中央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斗争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在巩固革命根据地、红军、土地、党政关系、工人运动等问题上，中央都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加以斥责。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在中央代表团的把持下，“完全同意”了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工作的“批评”。会议指责中央苏区在根据地、红军、土地、政权、工会运动、反帝运动、共产党与共青团、肃清一切反动派的斗争方面犯有“错误和缺点”，指责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富农路线”，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毛泽东不去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认为红军还没有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攻击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有很大的错误”，致使“群众没有发动”，“反革命组织遍布于苏区”。会议还十分错误地要求在党内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在红军的问题上，会议强调必须“建筑在大规模的作战基础上”，会议最终排斥了毛泽东等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工作的正确领导。

与此同时，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华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本来，这是一次群英聚会、庆祝胜利的盛会，但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这次会议以错误的“阶级路线”为原则，规定地主“没有分配任何土地的权利”，富农“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等等过“左”的经济政策和劳动政策。“左”的高压气氛，使这次大会蒙上了一层不可名状的阴影。

父亲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他认识了许多苏区的同志，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铁路工人出身的红军将领“王胡子”王震。

父亲还说过，在这之前的一次大会上，他曾远远地看见了李明瑞。生死与共的老战友相见，本应令人十分高兴和激动，但是，父亲知道中央对自己的不悦，又鉴于那时的“左”的气氛，为了不影响李明瑞，父亲竟然没有上前去与李明瑞打招呼。他们二人，只是远远地相望了一下。这，也是父亲与李明瑞见的最后一面，后来，李明瑞终于没有逃脱“左”的魔掌，含冤被杀。

一系列“左”倾错误政策的制定，给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性。而这些错误的决定，从一开始，便遭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抵制。

从此，中央苏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的广大干部群众，一方面要面对敌人的强大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又要与“左”倾错误路线相抗争。

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命运，经受了一系列险象环生的重大考验。

第一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

1932年5月，父亲奉江西省委之命，调往会昌担任县委书记。

会昌，在瑞金以南五十公里，与瑞金紧相毗邻。1930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来到会昌时，在这里发展了党的组织和建立了中共会昌县委。在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后，会昌县农村许多地方已属红色区域，但会昌县城则仍是一个白点。1931年11月，红三军团攻克了会昌县城，12月，成立了中共会昌临时县委。1931年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这时，会昌全县已有党员六百六十人，区委十个，党支部六十六个。1932年5月，古柏调任江西省裁判部长，父亲由此到达会昌，

领导会昌地方党政军工作。

父亲一到会昌，几天之内，首先处理了排除敌人“靖卫团”搔扰的事情。其时，由于会昌县城刚刚解放才几个月，城外一些小股的国民党地方“靖卫团”和散兵游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并四处骚扰群众。父亲主持召开了会昌各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巡逻和搜索，并派出赤卫队继续清剿“靖卫团”的残余，从而稳定了局面，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邓小平在和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等研究工作时提出，会昌是江西的重要门户，离“红都”瑞金只有五十公里，又是一个大县，有十四、五个区，应设立一个军事部，以适应斗争的需要。经罗屏汉介绍，决定由原红十一军独立团副团长钟亚庆出任军事部长。钟亚庆担心自己没有文化，怕不适应工作，在邓小平几次电话催促下，他才背起背包，步行到会昌。

钟亚庆回忆道：“碰巧，当我走到会昌县杉塘区苏维埃住址时，突然遇到邓小平同志，他一见我就问：‘你这个同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姓什么？’声音很大。

“‘从澄江来，叫钟亚庆，到会昌去。’

“‘你叫钟亚庆，好啦，我是邓小平，走，到杉塘区苏维埃去坐坐。’

我向邓小平同志行了个礼，跟着他走到在大河排顶上的杉塘区苏维埃。苏维埃主席接待我们喝了茶。小平同志用带有批评的口吻对我说：‘你好调皮，老罗打了好多电话给你，你还不来。我又打电话批评罗贵波主任，你现在才来。你看看！’他手指着墙壁上挂着的文件说：‘你任会昌县军事部长，文件都发了，你还敢不来！’接着，邓小平同志把话题一转，说：‘你不要走，今天我到罗塘区，你跟我去。’

“我跟着小平同志，一路步行，到了罗塘区苏维埃。晚上，小平同志叫区委、区苏维埃领导开会，布置了扩大红军等任务。第二天早饭，区委领导款待我们吃猪肉，记得吃饭时，小平同志对区委书记说：‘猪肉，好是好，就是少了一项。’区委书记问：‘少什么？’小平同志直率地说：‘辣子！’区委书记即起身去寻找，很快就抓了一把新番椒回来。小平同志拿了一个放进嘴里咬了一口，说：‘不太辣，也还可以。’大家吃得非常愉快。

“在会昌，我们军事部的同志经常要下到各区去组织赤卫队。凡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为基干赤卫队，其他是普通赤卫队。要分别造册向小平同志汇报；还有扩大红军等任务都要同小平同志研究。小平同志对我的工作总是热情指导，生活上平易近人。”

钟亚庆的回忆，生动地勾画出了二十八岁的会昌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工作面貌和生活形象。

1932年，蒋介石仍然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绝不抵抗，而对抗日民主运动却大肆镇压的政策，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色革命根据地为中心腹之患。在前三次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失败以后，于6月又调集十余万大军，向我湘鄂西苏区发动进攻。由于“左”倾错误的指挥，令红三军向荆州、沙市进攻，致使我军蒙受重大损失，丢失了湘鄂西根据地。

蒋介石一方得手，便又开始调集更大的兵力，向我中央苏区开进，誓欲扼死中国工农红军而后快。在南路，广东的陈济棠部占领了福建上杭和广东梅县一带。

会昌，和它南面的寻乌、安远两县，是我中央苏区的边沿地带，三县毗邻，与福建、广东相接壤，东是武夷山，南有九连山，山峦重叠，地势险要，是江西的重要南边门户，也是我中央苏区的重要边区。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加强中央苏区的边区工作，更有效地粉碎敌人的南面进攻，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联成一个整体，在会昌的筠门岭建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也称会寻安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革命斗争。

筠门岭，古称军门岭，距会昌县城五十五公里，系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交界点，同时，它又是通往福建、广东的咽喉重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这里离红色首都瑞金仅一百公里之遥，实可称为守卫中央苏区的南大门。

1932年7月，在筠门岭倒水湾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三县区以上的党员干部共一百多人参加，中央代表罗迈（李维汉）出席会议。会上，邓小平、罗屏汉等讲了话，正式成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县委机关设在筠门岭坝下。

8月，以会昌边防游击队为主体的地方武装，成立了江西省军区第三分区，会昌县军事部长钟亚庆调任三分区指挥员，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兼任三分区政委。三分区的任务，主要是配合主力部队，在东留、桂坑一带牵制闽西敌人。

扩大红军，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在各个革命根据地，都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对于会昌中心县委，扩红同样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1932年，根据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精神，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对扩红工作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布置，把任务落实到各区。当时扩红的对象主要是十六到二十五岁的农民和工人；方针是耐心进行政治动员，提高觉悟，反对强迫命令和欺骗、贿赂；形式是干部、党员带头报名，亲劝亲，邻劝邻，父母劝儿子，妻子劝丈夫，轰轰烈烈，广泛宣传，在9月，还搞了一个扩红竞赛。由于工作深入，觉悟提高，广大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在1932年7月到9月的三个月中，仅会昌一县就扩大红军一千多名。

会昌中心县委，在扩大红军的同时，十分注意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会昌县还曾于1932年10月、11月连续召开两次党的代表会议。其时，会昌发展到党员二千五百多名，乡党支部八十二个，区委十三个；寻乌县党员二千多名，乡党支部四十五个，区委七个；安远县党员一千四百多名，乡党支部十六个，区委五个。三县共计党员近六千多，乡党支部一百四十三，区委二十五个。在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党的工作活跃，组织健全。

为了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由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多次三县苏维埃主席和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

地方苏维埃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动员扩大红军，完成公债的推销任务，彻底地分配土地，健全城乡代表会议，反对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并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选举条例，开始在一些地方进行正式的选举活动。会、寻、安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所以苏维埃政权还加紧了肃反工作和赤色戒严，实行坚壁清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1932年间正处于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时期，战火时刻威胁着苏区的生产。敌人对苏区实行了经济封锁，给苏区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同时，原来的一些“左”的经济政策，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得许多商店关门，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在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群众的热情很高，生产积极性也空前高涨。1932年5月，会昌县委成立了县、区、乡的各级春耕生产委员会，组织群众积极投入春耕生产，当年，全县的粮食即获得了好收成。会昌中心县委还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在会昌等地还办了小型兵工厂，中心县委为了改善财政收入，在筠门岭设立了“关税处”，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并成立了“对外贸易局”，代表政府经营盐、布、药材、烟、纸、粮食等重要物品的进出口，利用各种方式冲破敌人封锁，使物资源源不断地进行交流。1932年还推销国家公债约十七万九千元。

会昌中心县委十分注意发展地方武装组织。当时在会、寻、安活动的红军正规部队主要是红军独立三师，师长王云桥，政委李井泉，政治部主任罗贵波，参谋长宋时轮，下辖两个团，三千余人，一千五百条枪。为了更有力地保卫苏维埃政权，会昌中心县委积极发展地方的武装组织，到了1932年11月，会昌共有赤卫军四千九百七十人，模范师二千五百二十九人，其主要任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苏区，帮助红军运输和抬伤病员。除此以外还建立了赤少队，进行赤色戒严和站岗放哨。在各县，还各有一个二、三百人的独立团，各区还组织了游击队。

会昌中心县委注意发展各种组织。

1932年7月，召开了会昌县第一次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大会，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出席并讲了话。到了1932年8月，三县共有团员一千二百一十人。1932年9月，会昌县举办为期七天的县、区团的干部训练班，有四十多人参加，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亲自为训练班学员作了报告。

1932年下半年，会昌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同年12月，召开了全县工人代表大会，会后成立了手工业、店员、木船等行业的工会组织。

1932年，会昌成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还举办了妇女训练班，发动妇女群众，慰劳红军，支援前线。

会昌中心县委还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到了1932年8月，三县共办起了七十三所小学，百分之九十的儿童都入了学。各区县还设有俱乐部和剧社，演出“送郎当红军”等深受群众欢迎的节目。

1932年11月，寻乌县城失守，根据这一情况，会昌中心县委在筠门岭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议。邓小平主持会议，研究部署了新的军事行动和有关扩大地方武装问题。

会昌县的中心县委史稿上写道：“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经常深入会、寻、安三县，调查研究，对各县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1932年秋，邓小平在安远县视察工作时，出席了县委、县苏维埃在城南门坝举行的万人‘提灯会’，庆祝安远赤化一周年纪念，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要继续扩大和巩固赤色区域，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提高警惕，随时打击和消灭来犯之敌。会后不久，安远县委、县苏维埃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领导本县独立团、模范营等地主武装，在正光一举打退了敌伪四十四师王赞彬的两次偷袭，并打退了伪民团匪的几次捣乱，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苏维埃赤色区域。”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们，那时他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兼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的一个区域内往来走去。他的那匹马，长征过雪山前死了，他的警卫员，也在长征之前换掉了。父亲

这个人，最不讲排场，反对烦琐哲学。这种一人、一马、一警卫的习惯，他一直保持到抗战开始。在他就任更重要的职务后，他也是这样崇尚简朴。整个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他没有私人秘书。解放后直到文革开始前的十七年中，他也只有一个秘书。对他来说，不在人多，重要的是效率要高。

父亲是一个实干的人，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凡是在他主持工作的地方，他都能够迅速地打开局面，创造局面。在广西左、右江，在江西的瑞金和会昌，他都是这样，果断、坚定、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工作。这种魄力和能力，不断地因时日和经验而增加。在几十年后，当整个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他手中的时候，正是这种魄力和能力，加上那不同寻常的远见卓识，使得他能够为整个的中国，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

从1932年到1933年，父亲在会昌这一区域的工作，不但彻底改变了会昌这一红区边沿地带的容貌，而且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原在会昌的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钟亚庆回忆道：“1932年9月，我在福建东留同福建钟少奎部几百人打了一仗，在战斗中，我又负了伤。部队由参谋长带，我被抬到桂坑。由于出血过多，连夜又抬到会昌的罗塘区。第二天，又转到粤赣军区筠门岭收容所。邓小平同志（其时任三分区政委）接了战报，知道我受了重伤，亲自打电话询问。我不能起来接，收容所所长罗天观接了电话说，小平同志再三叮嘱，要我第二天坐船到会昌去医治。我叫罗所长回话说，由于我伤势重，一动就流血，暂时不能去，要等候几天。那时，小平同志天天都打电话来询问我的伤情。我过意不去，在收容所住了四天，人比较精神了，就搭了一条小船到会昌去。次日下午，邓小平、罗屏汉同志就到医院看我。小平同志亲切地安慰我：‘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毕，拿给我五十元，作营养费，我接了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小平同志工作繁忙，亲自来看望我，经济很困难，还给了我这么多钱，不觉流下了眼泪。

“我在会昌医院一直住到1933年3月。一出医院，我就去会昌县委，见到了罗屏汉同志，却没有见到邓小平同志，心里十分失望。一转眼，五十年过去了，五十年的变化真大啊！罗屏汉同志早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邓小平同志幸还健在，正带领我们搞四化建设。每当我想起往事，想起邓小平同志对革命事业深谋远虑、兢兢业业的精神，对同志体贴入微的言行举止，心里就非常激动。”

是的，当钟亚庆于1933年3月出院时，他没有见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已被调离会昌，原因是，他已经受到了“左”倾路线的批判。

“邓、毛、谢、古”事件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来到了中央苏区，来到了中央红军，并把它触角伸向各个革命根据地。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要坚决地攻打大城市，攻击毛泽东“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的领导，犯有“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同“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于是被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事职务，调他“专做政府工作”，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军权。

1933年1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使我白区工作丧失几乎百分之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也不得不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这就使执行王明路线的临时中央，形成了对中央苏区工作的更加直接的领导。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一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并于1932年建立了日本操纵下的伪“满洲国”。日本军队对中国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疯狂“讨伐”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杀害无辜平民，使我东北人民沦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1933年1月，日军继续扩大侵略，强行武装占领了我华北要冲山海关，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并把侵略矛头直指我热河省。3月初，日军攻占热河省会承德，同时进抵长城各口，已经摆开大举进犯我中原之势。

在这国难当头、强虏压境之形势下，蒋介石竟然不顾全国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从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调集了八十一个师、二十九个旅另三十九个团，共六十五万兵力，对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自任“剿匪总部总司令”，兼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

1932年6月至10月，蒋介石首先调集十万兵力，向湘鄂西洪湖和湘鄂赣三个革命根据地进攻，我各根据地均受到了重大损失，红军被迫撤离和转移。在这种形势下，由于张国焘等的“左”倾错误，使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主力两万余人退出鄂豫皖苏区，转至川北。由此，红军对武汉所构成的威胁基本解除。

1933年2月至3月，蒋介石气焰嚣张地出动五十万兵力，向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此时，毛泽东已被排挤离开了红军，周恩来、朱德抵制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左”的干扰，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战术，经过黄陂、草台岗等战斗，巧计歼敌，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共全歼敌人第一纵队的三个师，生俘敌二十五师师长李明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缴枪万余，俘敌万余。

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取得了“空前光荣伟大胜利”，而蒋介石则在致陈诚书信中哀叹为“有生以来的隐痛！”

经过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央苏区扩大到地跨湘赣闽粤四省，并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发展到十万人，全国红军三十万人，全国共有中共党员三十万人。

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由于红军采取了机动灵活、正确得当的战略战术，也是由于中央苏区在建立红色革命政权的同时，开展了土地革命，毛泽东等实行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广大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革命积极性都空前高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革命根据地一天天巩固，红军一天天壮大，红军的战斗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但是，天下从来没有天生成就的大道坦途。有真理就有谬误，二者就像正数和负数般的不可分割。真理，也只有在与谬误的较量中，方可显示其不朽的光辉。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总是有许许多多的跌荡起伏。有时真理占据主导，而有时，则是谬误占据主导。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后，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人，反对毛泽东等在苏区所实行的政策，他们不但将毛泽东排斥出对红军的领导，而且对于其他抵制“左”的政策同志大加排挤和

打击，他们还派出代表到各苏区，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斗争和“改造各级党的领导”，大行宗派主义。

1933年2月，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由于不赞成“左”倾错误政策，提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等建议，被“左”倾领导者斥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错误，即所谓的“罗明路线”，并受到撤职处分等种种打击。

3月，中共临时中央的斗争矛头指向了江西。

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给赣南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发出指示信，指责会、寻、安党和团组织犯有“与罗明路线及单纯防御路线相同的机会主义”。

这个事情起因是“寻乌事件”。

1932年，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广东军阀向我苏区南部步步紧逼，地处苏区边缘地区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强我弱的极端困难的斗争环境中，领导三县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却片面地强调扩大中央红军，把会、寻、安三县的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正规红军，大大削弱了苏区南部边区的地方武装力量，而后，又命令守卫在苏区南部前线的红军独立三师离开筠门岭一带，开往北线，这样，在中央苏区的南大门，就只剩下少数地方武装力量，进一步造成了苏区南部的兵力空虚。1932年11月，敌军大举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地处最南端，位于赣粤闽交界处的寻乌县城失守，被广东军阀占领。

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抓住这个“寻乌事件”，诬制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逃跑退却”，执行的是“单纯防御路线”。

从这里开始，拉开了会寻安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寻乌事件”仅是一个由头。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左”倾政策和反对“左”倾政策的一场斗争的结果，是王明“左”倾领导向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实行宗派主义打击的一个战略部署。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一大前后和1932年苏区中央政治局宁都会议上，批判了毛泽东的“富农路线”并排斥了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但是，广大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党员和干部不赞成王明的“左”倾政策，并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福建，就是罗明，而在中央苏区，则以邓小平等为代表。

会昌县的《中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中这样记载着：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从它成立开始，就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错误。他们根据边缘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会寻安三县的革命斗争形势大有改观，在一段时期内比较稳定。在具体作法上，他们主要采取了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不硬拼，不搞“堡垒对堡垒”和“拼消耗”。邓小平质问坚持“左”倾错误的人：这样的堡垒对堡垒、工事对工事、壕沟对壕沟、公路对公路，这种打法能行吗？而仍然坚持过去几次反“围剿”的打法，采用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好的苏区来消灭。不同意向中心城市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而主张向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发展，巩固农村根据地，积蓄力量和敌人作长期斗争。第二，在扩大革命武装的问题上，他们认为群众武装、

地方部

队和中央红军都应不断发展，并应注意质量，反对用削弱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中央红军和不顾质量单求数量地要求“武装一切工农群众”的作法。他们认为，与其这样，“不如扩大地方武装”。

第三，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他们不同意“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的口号，认为苏区地瘠民贫，加上连年作战，“群众负担太重”，反对大量推销公债的作法，并主张主力红军要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

第四，在土地问题上，他们坚决执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主张。

在一系列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也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力图减轻这一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这就成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严重障碍。

以上关于会昌中心县委抵制“左”倾政策的这一段的记载，说明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是如何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和斗争的。

如果说，在红七军的时候，父亲虽心存异议，但还被动地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话，那么，这一次，在中央苏区，他则是毫不犹豫地、旗帜鲜明地对“左”倾错误身先士卒地进行抵制和斗争。

红七军的遭遇，党的事业和革命事业所遭受到的损失，使得像父亲这样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对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王明的教条主义的大帽子和宗派主义的逼人气势，并没有吓倒他们，他们开始斗争了，自觉地进行斗争了。

在这场反对“左”倾政策的斗争中，站在前锋的，除了邓小平，还有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

毛泽覃，乃毛泽东的弟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长沙地团委、黄埔军校、中共广东区委工作，从1927年开始在赣西南井冈山、宁冈等地担任领导工作，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

谢唯俊，湖南耒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会和农会工作，参与领导耒阳的肥田暴动，1928年到井冈山后在红军工作，后曾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1932年时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长。

古柏，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后从事农运工作，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寻乌苏维埃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江西省党团书记等职。

他们三人都是坚决抵制“左”倾政策，因而，与邓小平一道，受到了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一场批判“邓、毛、谢、古”的斗争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的名，说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

在另一篇《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中，点名批判会昌中心县委犯

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指责“永吉泰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口”，提出要“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逃跑和纯粹防御的路线，反对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

“左”倾领导人，责成江西省委一再向这四人工作的地区和单位发出指示，反复发动基层干部和党员，开展对于邓、毛、谢、古进行直接的批判和斗争。

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又根据中央局的意图，向江西苏区全党公布了有关会寻安的指示文件，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仓惶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起来源”的“机会主义”。

3月下旬，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被派到万泰、公略、永丰解决有关问题。

3月底，在筠门岭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由中央局代表洛甫（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3月31日，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对邓小平实行了围攻，决定“加强和部分地改造中心县委和会寻安县委之常委”，“召集各级代表以及三县党各级领导保障三县工作的彻底转变，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开展这一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会后，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撤销其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3年4月，“左”倾宗派主义继续对邓、毛、谢、古四人不断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责令他们作出“申明”和“检查”。邓小平等四人并没有屈服，在原则问题上来作丝毫让步，旗帜鲜明地与“左”倾宗派主义者进行斗争。他们两次写出声明书，在声明书中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作法，并把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污蔑、攻击和不实之辞顶了回去。他们毫不妥协的立场，更加触怒了“左”的领导，他们以更加凶猛之势向邓、毛、谢、古发起了大规模的围攻。

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江西省委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地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还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作出新的检查，“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

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这次人为制造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不仅打击和斗争了邓、毛、谢、古四人，而且在“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口号下，从上到下，把坚持正确意见的省、县直至支部的各级干部打成“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不仅在会寻安、永吉泰搞得乌烟瘴气，而且中央苏区的其他地区也不得安宁，宜乐崇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宁广石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等都受到了打击。各地还撤换了大批干部，造成党内人心惶惶。在会寻安三县，宗派主义者们一边排挤掉反对“左”倾政策的人，一边轻率地提拔了一批新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这些人，由于只能执行“左”的政策而谨小慎微地工作，致使苏区南部形势日趋严重，敌人步步深入，直接威胁中央苏区的南大门，筠门岭，给根据地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邓、毛、谢、古虽然受到批判、斗争，乃至撤职与处分，但他们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都是久经锤炼的革命者，他们最终也没有屈服，而是始终坚持正确主张，始终坚持真理，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忍辱负重，继续坚定地履行他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所应尽的义务，继续在革命斗争崎岖而又艰难的道路上奋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有人会问，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向谬误低头？为什么他们没有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意气用事？为什么他们不因此而离开革命队伍？

这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他们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虽然有时会遇到曲折。他们相信，他们的党始终是伟大的，尽管有时会为谬误所误导。他们相信，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是前途光明的，虽然途中多有险阻。他们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真正的革命者。

毛泽覃，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向湘西转移并开始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初，率独立师一部前往福建长汀，任闽赣边界军区司令部领导成员。1935年4月率领游击队进军时，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英勇牺牲，时年三十岁。

谢唯俊，在受到“左”的打击后，曾任巡视员，做过筹粮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任劳任怨。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在率领部队向保安挺进时，途遇土匪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二十六岁。

古柏，受到“左”的批判后，曾作过筹粮工作，1934年长征开始后，留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春夏之交率部到达广东龙川，由于叛徒告密，被反动民团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九岁。

他们三人都是十几岁参加革命，二十多岁经历了“左”倾错误的打击，不到三十岁便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岁，都是多么好的青春时光啊！谁不珍惜青春，谁不热爱生命？而他们，为了革命，则义无反顾地全部奉献了。

现在的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岁的青年们，你们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是在校园内努力学习？是已走上工作岗位勤奋工作？还是终日闲散碌碌无为？遇见社会上和个人生活中的不如意事，你是意志坚定，信念明确，胸襟宽阔，勇于克服？还是是非不明，刚愎自用，或者意气消沉，牢骚满腹？

面对那些与你们有着同样的青春年华，而又经历过与你们大相径庭的生活道路的革命先烈们，你们是否应该悟出一点什么人生的哲理？是否更应该学习一点做人的准则和气概呢？

是啊，在任何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上，挫折和困难总是难免的。有的人在挫折面前畏惧了，有的人在困难面前怯步了。而对于革命者来说，对于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邓小平来说，在其漫长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中，困难和挫折，早已成为寻常之事，而每当他战胜和克服了这些挫折和困难之后，他便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二千多年前，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老子就曾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就是说，祸福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甚至是可以转化的。一件事情的发生，究竟是祸是福，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这是因人而异，也会因时

而异。

在中央苏区遭受“左”倾错误打击的这次事件，当时的确使父亲在政治上蒙受了相当沉重的负担，但是，在四十年后，这个在三十年代发生的事件，却成为决定父亲政治生命的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是好的因素，积极的因素。

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邓小平被当做“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1971年，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妄图早日篡权，阴谋谋害毛泽东未遂事泄，在逃跑时因飞机坠毁而自我灭亡。1972年，邓小平在他正在被软禁的江西听到了林彪罪行始末的传达。他十分激动，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对于林彪事件的自我看法。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

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时就是神圣的最高指示。

从这个批示开始，父亲遭受彻底批判的政治命运开始得到了转机，并终于于1973年3月回到了北京，重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1975年，父亲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他开始逆当时的“左”的疯狂的潮流而动、开始了对于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整顿。

父亲在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毛泽东的批示中所谈到的和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人材难得”等因素以外，三十年代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邓小平当时挨整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当时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作法，也就是“毛派的头子”。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三十年代的这一场斗争，把邓小平划进了毛泽东这一派里面。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记得的，而且记了整整四十年。

这，是当时挨整的邓小平连想也没有想到的。

（本章的内容参考了中共江西省会昌县党史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1984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

红星报的主编

1933年5月，父亲遭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宗派主义批判，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后，被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当巡视员。到了乐安不足十天，又令他回到省委，原因据说是，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

不久，父亲被调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

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王稼祥在战斗中负伤，身体不好，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上是贺昌负责。

贺昌在担任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时，曾和父亲一起去广西筹备百色起义，后来他们二人在上海时又常常在一起，父亲还在贺昌住的地方搭过铺，两人非常熟悉。父亲这次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打击，非但他本人不屈服，周围的同志们也对此很是看不惯。贺昌就对父亲的遭遇十分同情，于是把父亲要到总政来当秘书长，以解脱他的困境。

当时在总政治部工作的有一个女同志，就是朱月情。

朱月情的丈夫霍步青曾经在上海时期的中央军委工作，在上海时，霍步青夫妇、周恩来夫妇和父亲、张锡绥同在一个党小组过支部生活。后来霍步青到江西中央苏区后，和父亲也时常见面，他们是四川老乡，又都是县委书记，关系比较密切。

朱月情告诉我说：“霍步青是四川齐江县人，和你爸爸两个人是老乡。他们两个人在江西，都是背驳壳枪、穿草鞋、打绑腿。他们有时在瑞金见面，就一起去吃面条。在那个时候，肉丝面条就是好东西了，鸡呀、肉呀都吃不上。你父亲虽然年轻，但很开朗。当时王明路线，许多干部受迫害，小平同志提出意见，反对王明的极‘左’，王明就打击你父亲，给予最严重的党内警告处分。霍步青也受到了党内警告。可是你爸爸毫不在乎，还是又说又笑很开朗，从来没有愁眉苦脸。他们都是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1933年9月，霍步青得病去世了。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把我调到总政治部工作。你爸爸是总政的秘书长，什么事情都要管。那个时候，霍步青刚刚死了，我又怀着孩子，精神很不愉快，你爸爸常常劝我。由于有过张锡瑗的教训，你爸爸让我要生孩子时早点告诉他，好作准备。我临产时，你爸爸派了一个担架，三个人抬着，还把他的警卫员派了去送我。二十几里路送到医院。生下孩子后，我只有两套衣服替换，孩子连一件衣服、一块尿布都没有，只好用我自己的衣服包上。我写了一个条子给小平同志，说小孩没有衣服和尿布，请帮我代领我这一份红军公田，让我买几件衣物。那时候，红军有公田，每个红军都有一份收成。你爸爸回了我一个条子，说，月情同志，像我们这样的干部，不应该要红军公田这一份，应该让给战士。他给我领了十块钱的生产费，四块钱的保育费，叫警卫员送来，给我解决了问题。他既坚持原则，又关心下面的同志，而他对自己，却并没有什么照顾。你爸爸是一个很好的干部。”

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工作上兢兢业业，原则上绝不让步；对同志非常关心，为他们做实事但不溢于言表；对自己十分严格，无论遇喜遇悲都不轻率地形于颜色。

其实，在那个时候，父亲不仅仅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生活上也有波折。

在他遭受批判以后，1933年，阿金离开了他。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人这一辈子，真不知要经历多少悲欢离合，要经受多少事业和生活上的磨难，才算得“修成正果”，才能达到涅槃超俗的境地。

事业上的一沉一浮，生活上的一波一折，都让父亲赶上了。

生活上，他已是两度失妻（当然，原因不同），而政治上，其实这才是他遇到的第一次磨难，而且是最小的一次磨难。三十三年以后，他还将要遭受两次更大的政治上的打击。

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而且复出得一次比一次光荣，一次比一次震撼人心，这种经历，的确足以令人惊叹不已！

世人评论，这三起三落，使得邓小平的一生富有特别强烈的传奇色彩，

令人赞叹。一位撰写邓小平传记的德国作家乌利·弗朗茨（Uli Franz）写道：邓小平“用非凡的能力战胜了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和无数阴谋诡计，并且每次都向他生命的目标更接近一步。在我们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卓有成就的政治家。”

经受磨难挫折，绝不是一件令人轻松的事情，但是，一辈子没有经历过任何磨难挫折的人，他的一生，一定平淡无奇。

父亲在1933年经历政治和生活上的挫折时，已是年近三十的人了。

别人是三十而立，而年近三十春秋的邓小平，却早已经历得大多、大多。连政治上的大风大浪都不畏惧的他，当然更不会为个人生活中的不愉快而过分的在意。

阿金和父亲一起到中央苏区后，曾任过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领导两县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和支援前线，是一位有能力的红军女干部。和父亲分离以后，她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次年改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动员部副部长。1933年10月，阿金受命担任瑞金县扩红突击队总队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的好评。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阿金和红一方面军的二十几位女战士一起编入中央第二纵队，也就是“红章纵队”，在地方工作部工作，任务是沿途发动群众。后来，阿金被调到中央直属的一个干部休养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在这个休养连中，大都是身患疾病的女同志和年龄较大的老同志，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同志和老大姐。长征到达陕北后，阿金担任过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区队长、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长期的战争生活和艰苦环境，使许多长征过来的女同志身患疾病，阿金也是如此。因此，1938年，组织上决定送她去苏联治病。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燃烧到莫斯科，其时阿金正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家医院治病，不幸死于战乱之中，时年三十有七。

父亲在总政治部任秘书长的时间并不长。两三个月后，因为秘书长一职没什么事做，父亲要求另调工作，想多吃一些实际工作，于是总政治部分配他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父亲做这个工作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妈妈对我说：“1933年我从莫斯科学习回来，在中央苏区看到你的爸爸，那时候他犯了错误，被撤了职，在总政治部编红星报。我被分配在少共（青年团）中央当宣传部长。我们少共离总政治部非常近，中央局一座房子，总政治部一座房子，少共一座房子，都在一个村子里，没几步路，隔得很近。我们那时候是一帮子年轻人，在乡下也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吃完晚饭就串门子。我们这些人很喜欢到贺昌的屋里玩，很喜欢和你爸爸天南地北地吹牛，因为他知识多。他是很乐观的。他怎么挨整的，怎么离婚的，都是贺昌告诉我们的。贺昌在总政治部实际上负责工作，他非常同情小平同志，说小平同志非常能干，受了好多委屈。后来我当扩红队长，超额完成了任务，你爸爸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红星报还登了你呢！”

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中国

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

中央档案馆尽其可能，将现在所搜集到的红星报汇集成册。虽不完整，但已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1年12月11日的创刊号上，庄重地写着《红星》二字，下方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出版”，上方通栏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红星报头期头版头条的“见面话”说得明白：

“他是一面大镜子，凡是红军里一切工作和一切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他上面看得清清楚楚。

“他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各个红军的战斗消息，地方群众的战斗消息，全国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形，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

“他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可以告诉同志们一些群众工作，本身训练工作的方法，可以告诉哪些工作做得不对，应该怎样去作。

“他是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把各种军里党的工作经验告诉同志，指出来哪一些地方做错了，和纠正的方法。

“他要成为红军的政治工作的讨论会。无论哪一个同志对于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红军生活有意见，都可以提出在他上面来讨论，要有问题他也可以答复。

“他要是我们全体红军的俱乐部，他会讲故事，会变把戏，会作游戏给大家看。

“他是一个裁判员，红军里有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的分

子，都会受到他的处罚，并且使同志们能明白他们的罪恶。
“总之，他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

这份报纸面对的读者，是中央苏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这些从工农中来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文化大都很低，甚至还有许多的文盲。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的报纸、书刊，没有广播，当然更没有电视了，因此，这份红星报，自然地成为了中央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消息来源和学习材料，成为传播党的思想和文化知识的一个很好的阵地。

从1931年12月到1933年5月，是红星报的第一个阶段，共出版三十五期，其中第一到第十二期，是铅字排版；第十二至第三十期缺收；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五期改为手刻蜡板油印。

红星报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33年8月6日到1934年9月25日，期刊顺序号重新开始从一排起，共出版六十六期，现搜集的集册中，缺第六十六期，其中有十期还是从国外搜集回来的。这六十六期为铅字排版。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月，红星报又出版了七、八期。由于红军开始了长征，所以改为手刻蜡板油印。

这一个时期，也就是从1933年8月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这七十多期红星报，就是由父亲主持编印的。

红星报在遵义会议后又继续出版了十多期，到1935年8月3日后停止。停止的原因可想而知，红军已踏上了更加艰苦的长征道路，继续办报已经不可能了。

父亲并非文化中人，更非新闻报界人士，但是对于办报，特别是办革命

报刊，他并不陌生。遥想十年前在法国的巴黎，他就与周恩来等一起办过中共和青年团旅法组织的刊物《赤光》，还被美称为油印博士呢！

从那时起到现在，十年的时光过去了。在法国的那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共产党员，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红军干部。

这十年，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十年，多少事件，多少人物侧身而过；多少体验，多少思绪长驻心头。这些经历和经验，特别是政治水平的提高和理论水平的提高，使得他办起报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翻开红星报，你就会到处发现父亲的字迹。虽然是铅字排版，但常常会有父亲手写体的标题。手写标题，显然是为了醒目内容和活跃版面。父亲那时的笔体，相当隽秀有力。

父亲告诉过我们，他那时编红星报，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所以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都要他自己亲力亲为。那些手写的标题，是他写下后，由别的同志在木头上刻下字模，再印到报纸上去的。父亲说，红星报许许多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许许多多重要的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我曾经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册拿给他看，请他辨认哪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一挥手，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

的确是，一个“主编”，两个手下，八开的报纸，每期至少四个版面，平均五天就要出一期，工作量可不算小。

红星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喉舌，上面登载了许多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议和命令，周恩来、朱德、博古、洛甫（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罗荣桓、聂荣臻、陈云、陈毅、杨尚昆、贺昌、左权等党政军领导人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和社论，其中最多的当属周恩来，因为那时他是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社论，署名的和不署名的各占一半，不署名的据我分析大多为父亲所撰写。这些社论的题目有：《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向着游击赤卫军突击》、《五一劳动节的工作》、《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彻底消灭开小差与个别投敌的现象》、《把游击战争提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等等。

抛开数不清的各类文章、报道不算，仅就这些社论来说，可以说，比起当年在法国时，父亲无论在政治水平、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上来说，都大大地跨上了一个台阶。撰写这些文章的这枝笔，政治思想成熟，充满战斗性，法国时期的那些尚带幼稚之气，已一扫而光。

红星报除了报道各种消息、战况以外，还编写了许多知识性的和生活常识一类的内容，例如军事军械知识，卫生防病知识，甚至还有趣味问答和谜语，从这些不显眼的小的内容，可以看出，父亲在编辑这份报纸时，真是把全身心的力量都使上去了，他是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十分认真地，全心全意地做好这份工作。

有的老前辈告诉我，你的爸爸总是很乐观，能上能下。

我想，只要看看这些红星报，你就会明白了，像他们这样的共产党员，的确是忘我的，是把个人的荣辱利害全都置于不顾的。他们能够叱咤风云地指挥千军万马，也能在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岗位上做好一点一滴的工作。

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个人算得了

什么！”

现在听起来，有人会认为这可真是一句老话，一句套话了。但仔细想想，父亲他们那一代人，那二代的革命者，那一代的红军战士，真的就是这样的。

在当时，面对艰难困苦而未丧志的，又岂止是父亲一个人？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都是这样顽强而又乐观地战斗着和生活着的。

李维汉的一段回忆，可以使你更加详尽而又形象地了解这些革命战士。

“中央苏区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现在年轻人不大清楚。当时中央苏区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其实，前线战士的生活也不好，只比后方人员多给些盐，饭能吃饱，那时还下知道自己搞生产，粮食运到瑞金，是用肩膀挑来的。因为粮食不够，后方人员每天只能吃两餐饭还吃下饱。吃饭前，每人把分给自己的米放在蒲包内拿到厨房去蒸，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如果当时不是分饭吃，那么，吃得快的就多吃了，吃得慢的就少吃了，在饭不够吃的情况下，吃大锅饭是不行的。那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搞供给制。每餐的菜都很少，菜是没有油的，盛菜的容器是铁制的小盆，菜连盆底都盖不住。每天上午十时到十二时，我们就饿得发慌。晚上也是如此。心中发慌，就在床上躺一躺，休息一下又起来工作。……当年红军的生活与现在解放军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时盐运进苏区，就自己熬硝盐。由于敌人封锁，中央苏区不但吃饭困难，穿衣也困难。衣服是蓝色的，用白布染成，很易掉色。不管到哪里，晚上都不脱衣服，和衣而睡，随时准备行军打仗。子弹更困难，打仗要留弹壳，用旧弹壳再去装火药。那时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那样艰苦的条件，毫无怨言，一心为革命。老百姓分到革命胜利果实，得到了利益，也积极拥护革命，我亲眼看到扩大红军的情景，参加红军的人，大多数是基干民兵。到处出现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盛况。参加红军的人，背上还背着布单子和草鞋。那时党和红军与群众关系十分密切，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是的，那时的生活是难以想像的艰苦的，那时的对敌斗争是无以言状的残酷的，如果不是有着军为民，民拥军，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优秀作风和传统，那么红军早就会被强敌打垮了。如果不是由于拥有这么一批无比英勇、无比坚定的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始终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革命，忠诚于党的事业，那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红七军在崇义的活动

黄志勇

1931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红七军来到崇义山区，帮助地方恢复党的组织，培养干部，发展武装。

红七军来到崇义后，崇义党组织开始恢复，中共崇义县委在金坑公开成立，周大侃（又名周梦）任县委书记（不久调河西去工作了），县委委员有邝才钦等7人。县委办公地点经常流动，没有固定红七军政治部还在崇义长潭圩专为崇义、上犹两县地方党举办了一期“地方党团训练班”，参加学习的23人，大部分是党团员，也有一些进步青年。我也参加了学习。训练班一共学习了两个礼拜。红七军派了好几个干部到训练班讲课，许卓担任训练班的主任，主持训练班的工作。记得邓小平同志还给我们讲过课，主要讲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共产主义ABC等内容。我们在训练班除上政治课外、还进行军事训练。训练时，按部队的要求进行。不久，驻赣州的国民党军马昆旅向崇义苏区发起进攻，企图围攻红七军。红七军随即离开崇义，途经上犹营前，向湘赣根据地的中心转移，训练班的学员随部队到营前时，学员们迫切要求参加红七军。但红七军政治部要学员们回到地方开展活动，进行土地革命。同时，红七军还留下林村等一批干部帮助地方工作。后来，上崇苏区地方部队中的骨干力量都是红七军留下的干部，他们对崇义土地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我回列过埠。几天后，周泰侃书记派我到上堡进行革命活动，提任上堡暴动队的政治委员兼特支书记。

记得红七军到崇义时，崇义有一支小游击队，它是长潭、茶滩暴动失败后，剩下的4支枪，12个人。他们在崇犹边境的磨刀坑一带打游击。后来，游击队袭击过埠守望队，缴获30多支枪，并当场击毙了守望队长何少涛。接着，游击队开至上犹，攻打上犹县城又取得胜利。经过屡次战斗，游击队员日益增加，武装力量不断增强。红七军到崇义后，将这支游击队编为红色警卫营，周泰侃任营长兼政治委员，古达培为副营长。部队还打过三十五军独立营的番号，在崇犹边境开展游击活动，打过不少胜仗。参加这支地方武装的青年越来越多，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红色警卫营又改编为崇义独立团。独立团成立后，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游击根据地。崇义的扬眉寺、文英，汝城的集龙、桂东的沙田等都成了游击区域。

（选自《中央苏区风云录》，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1991年6月编）

邓小平在崇义 中共崇义县委党史办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命令工农红军第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执行“攻打柳州、桂林”计划。这一冒险行动，不仅丧失了正处发展中的右江革命根据地，而且使红七军遭受严重损失。1931年1月2日，红七军全州前委会议，取消了“攻打柳州、桂林”冒险计划。决定立足北江，然后靠拢江西。2月初，乳源梅花村血战失利，排除了立足北江的可能，于是决定北上江西，汇合中央红军。2月5日到达乐昌与韶关之间的杨溪长来渡被迫兵分两路，红七军55团及58团大部渡越武江，58团一部（二连）及军直属队，被敌强封江面，没能过江。于是，邓小平、李明瑞率红七军55团及58团大部绕过仁化县城，经长江、东岭、汝城的热水，11日抵达崇义县文英境内，在崇义休整活动31天，击敌惩恶，传播革命火种，领导农民武装暴动，有力促进了上崇苏区革命的发展。

邓小平拒坐担架，下关河痛击敌人

梅花村血战，长来渡分兵，邓小平、李明瑞率红七军55团及58团大部一路艰辛，2月12日中午时分来到了崇义具关隘境内。

冰天雪地，道路泥泞。迎面袭来的寒风夹杂着雨粒，部队艰难地行进着。邓小平眼睛布满血丝，拄着竹杖，清瘦的脸上，颧骨突出。部队走过长长一段河道后，来到了柯树岭。柯树岭，山高路险，荆棘丛生，一条乱石堆成的羊肠小道盘绕山间，道下是峭壁深渊。邓小平几天来犯胃病。疼痛不已，还没爬到半山腰，已是气喘嘘嘘。这时前面担架上躺着的警卫员小刘，说什么也不肯再躺在担架上，要把自己的担架让给邓政委。小刘脚伤了筋骨，怎能不躺上担架？邓小平走过去，看到小刘的脚肿得象水桶似的，很是心痛，亲切而风趣地说：“看你的脚肿成这样，不坐担架怎行？这担架是抬你的，抬我的担架还没有呢！来吧，躺上。”邓小平和战士们将小刘重新扶上担架，小刘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时，后面的部队赶了上来，在担架上躺着的战士都要将担架让给邓小平，邓小平很受感动。右江千里转战，历尽千辛万苦，这些战士都是好同志啊！他将竹杖深深插入雪地里大声他说：“同志们，我能走，谢谢大家。你们都受了重伤：不坐担架会掉队的，革命正需要你们。走吧，我们一起来克服这座大山！”邓小平说完，拔出竹杖，大步流星朝前走去。

翻过柯树岭，已接近黄昏，部队来到下关口，正欲渡下关河，这时侦察部队来报，前面发现敌情，约有一连敌武装正与红七军对开过来。邓小平、李明瑞迅速指挥部队占领了左右两侧高地。一会儿，只见一溜儿敌兵缩头缩腰拉了长长一条，慢慢进入红七军的伏击圈。红军战士一声喊打，机枪、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敌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已倒下一大片。敌人一看情形不妙，知是遇上劲敌，扭头就窜，“冲啊！”“缴枪不杀！”红军战士象猛虎下山冲向敌人，敌人乖乖举手当俘虏。战斗很快结束，毙敌40余。从俘虏口中得知，他们是崇义县边防大队周文山所部。

战斗结束不久，天下起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战士们渡越下关河，脚踏冰雪，继续向西挺进。

为了劳苦大众

2月14日清晨，红七军进到离县城五华里路的崇义城郊牛角河。驻守县

城的周文山所部闻风而逃，红七军开进县城。部队进城后，迅速开展群众工作。经理处找商会解决给养；政治工作人员走家串户宣传红军政策；小鬼队员则提桶沿街书写标语。因为县城居民听信谣言，大部离家上山。邓小平带了警卫员来到城北萝卜巷，敲了几处农舍的门都没人应。邓小平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我们应赶快把群众找回来，宣传红军政策。快过年了，要让群众过个安全的春节。”他们来到一丛茅舍间，这时，听见不远处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其间还伴有一个女人的凄哭。邓小平和警卫员沿着哭声寻过去，哭声是从一间快要崩塌的茅草棚里传出来的。门虚掩着，一推就开了，只见一中年妇女抱着个襁褓的婴儿，好象正要离开。邓小平和警卫员走了进去，“大嫂，小孩怎么了？”邓小平关心地问。大嫂用疑惑地眼光看着几位进来的人。邓小平用手试摸了一下婴儿的前额，“哎呀，是发烧，烧得可不轻哟！”转身吩咐警卫员道：“小李，快去叫卫生员来给小孩治病！”不一会儿，警卫员带来了卫生员。卫生员认真仔细地给小孩检查了身体，诊断是急性肠炎。卫生员犯难了，因为剩下治肠炎的药已是极有限，是专留着首长急用的，怎么舍得给小孩呢？卫生员迟疑着。邓小平明白了卫生员的心思，严厉地对卫生员说：“快给小孩用药吧，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不就是为了劳苦大众，不为群众着想，还算什么共产党人？！”卫生员听了小平同志的话，迅速给小孩打了针、吃了药。一会儿小孩就止住了啼哭。这时婴儿的母亲感动得双脚“咚”地跪在地上说：“大恩人，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呀！”邓小平忙将大嫂扶起说：“大嫂，别这样，我们是红军，红军是专为穷苦百姓的。”并告诉大嫂，要按时给小孩服

药。

邓小平离开大嫂家。这时，大街上到处是醒目的标语：“工农兵联合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倒国民党军阀！”“当兵就要当红军！”许多商店打开了店门做生意，还有三五成群的人们从山上回来。城西一队群众高举着“欢迎红军”横幅标语，敲锣打鼓，放鞭炮，游行欢迎红军，一会儿汇聚了上千人。红七军利用这个机会，在县城中心搭了一个临时会场。邓小平站在高高的桌子上，向群众说：“老乡们，我们让你们受惊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们是从千里外的广西面来。我们的革命目的在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肃清贪官污吏，解除民众痛苦……我们要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让贫苦大众翻身作主人！”邓小平的讲话象甘露滋润了群众的心田，乡亲们精神振奋，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会后，许多热血青年报名要求参加红军。

群众情绪高涨，红军率领群众打上豪，给黄世藻、乐德浩、黄以师、蒋荣忠等土豪戴着写有“打倒土豪劣绅×××”字样的高帽子游街示众，分了他们的浮财。黄世藻罪大极恶，对他进行了处决，昔日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土豪劣绅，今日威风扫地，群众拍手称快。

“我们也好盼你们哪！”

2月15日傍晚，三个商人模样的汉子进了县城，他们直奔南门南坛庙红七军指挥部。

来人在进入南坛庙时，被红军卫兵叫住了。来人解释是地方党组织派来汇报工作的。红军卫兵为防意外，搜查了来人，并下掉他们腰间的枪，然后带他们来到庙内。

庙内一盏油灯下，邓小平、李明瑞，还有许卓正围着一盘炭火在研究问

题。卫兵先进去，将地方党组织派入求见向邓小平等说了，邓小平高兴地站起来说：“好呀，赶快请进来！”一会儿，卫兵将三个人引了进去。邓小平、李明瑞、许卓向来人迎去，三位汉子更是激动地奔向前，“我们好盼你们哪！”原来三位是中共崇义县委书记周泰侃和上（犹）崇（义）南（康）游击大队大队长古达培及通讯员小吴。邓小平、李明瑞、许卓、周泰侃、古达培五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邓小平说：“我们也好盼你们哪！”周泰侃、古达培眸内含着激动的泪花……

原来，昨日红七军在县城处决劣绅黄世藻的消息传到长潭，周泰侃兴奋不已，忙通知游击金坑的古达培返回长潭，俩人匆匆带了几个蕃薯作午餐，叫了名通讯员就往县城赶来了。

几人坐在板凳上，呼啸的寒风吹进来，谁都没有一丝寒意。邓小平说：“你们来得正好，请你们将崇义的情况给我们谈谈。”周泰侃脸颊透着红光，他清了一下嗓子，将崇义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向邓小平、李明瑞等作了详细汇报。最后说：“我们的群众基础很好，目前，在离县城70华里的长潭、杰坝已成立苏维埃政府，有游击武装、赤卫队、儿童团等组织。”接着古达培汇报了崇南游击大队目前情况。在汇报县境周围敌人武装情况时说：“县境周围现在没有国民党正规武装，胡凤璋已退至赣湘边境上堡一带，周文山已退至赣粤边境聂都一带。”邓小平、李明瑞专心地听了周泰侃、古达培的汇报，非常高兴，赞许他说：“好啊，不错！你们搞得不错，要再接再厉，掀起更高的群众革命高潮。”

已是深夜，周泰侃、古达培没吃晚饭，卫兵做了两碗白菜条炒黄年米粿，周泰侃、古达培吃起来觉得非常香，十分有味。

人炭烧得通红，万籁俱静，火炭燃烧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大家心里暖洋洋。邓小平、李明瑞继续了解着崇义各方面的情况。根据崇义山高、林深，地处粤、赣、湘三省边界，有党组织和游击武装，目前敌情不严重的特点，一个共同的想法在邓小平、李明瑞心中产生。红七军千里转战，三十多月来的紧张行军和连续作战，部队都没有很好地休息过。战士颇感劳累，伤病员与日俱增。部队到达崇义时，军旗只剩个旗杆，战士们大部分还是从广西出发时穿的单衣薄裤，如今长袖成了短袖，长裤成了短裤，有的战士因为没有御寒衣服加上伤病折磨而冻死牺牲。邓小平与李明瑞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同时提出了部队在崇义休整的建议。经大家认真讨论，决定部队暂时在崇义休整，以崇义为中心创造巩固苏维埃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同时加强党的建设工作及整顿发展红军，发展方向是赣粤大道，实现扰敌后方的任务。

“喔、喔、喔——”，雄鸡报晓声在空中回荡，东方露出了晨曦。一夜没合眼的邓小平、李明瑞、许卓、周泰侃、古达培等仍然精神抖擞。邓小平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一阵清新带有寒意的空气吹进来，令人心旷神怡。“来，我们到外面走走。”邓小平招呼大家说。他们一行走出南坛庙，一轮红日跃上山顶，今日是个晴天。

这天是大年三十，霜雪覆盖的草木在阳光的照射下恢复生机。红军驻地，地方党组织送来了许多食品和大批御寒衣服。年夜饭是白菜条炒黄年米粿，还有几缸米酒。邓小平等亲自为战士们斟酒。邓小平端起酒碗，脸色沉重他说：同志们，我们从左右江千里转战来到崇义，几个月来，我们许多的战友倒下了，牺牲了，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碗酒，先敬长存地下的勇士们！说完将酒泼在脚下。邓小平加满第二碗酒，接着说：同志们，大家辛苦了，

为了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这碗酒，我敬大家！说完将酒一干二净。战士们淌着泪，泪珠滚进酒碗融进酒中……

创办长潭苏区干部训练班

2月17日，大年初一，红七军将伤病员送往长潭苏区，得到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苏区人民腾出最好的房子给红军住，把最好的食品送给红军吃，并且组织苏区民间中草药医师上山采药为红军治病。短期内，红军伤病员恢复很快。

红七军根据崇义地方苏维埃政府缺少干部和缺少枪支等情况，送80支枪给长潭区苏维埃政府，并将何畏、林材等军队干部选派到上崇南游击大队任职，同时决定在长潭举办一期地方干部训练班。

2月19日，长潭圩鞭炮齐鸣，热闹非凡，“热烈庆祝长潭苏区地方干部训练班开学”横幅标语悬挂圩中。经过推荐筛选的上犹、崇义两县20多名党团骨干和进步青年，穿戴整洁，面貌一新，整整齐齐地坐在厅堂里，听邓小平政委上第一课，同时来听讲的还有部分红军指战员。厅堂的前方摆了一张小方桌，桌面上放着邓小平熬了一夜写的讲稿。面对着全体学员，邓小平滔滔不绝地讲着，开始他还偶尔看一下讲稿，讲着讲着，完全离开了稿子。邓小平根据学员文化低的特点，一边提问一边结合历史故事讲述革命道理。从历史上的洪秀全、李自成讲到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目的任务和坚持农村斗争、坚持根据地斗争，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双手时而撑着腰，时而在空中比划着，越讲越激动，越讲越有力。

邓小平还结合红七军千里转战，遭受挫折的事实，指出：革命要建立自己的政权，要有自己的根据地，根据地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邓小平生动形象的比喻：一个人如果没有立足之地，到处东奔西走，是很快要倒下的。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是无法休养生息的，无法补充力量的，也无法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的，更无法继续战斗和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

邓小平喝了几口茶，清了清嗓子，针对目前的困难和形势，高声地对大家说：革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我们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有工农大众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要坚定革命信念，振奋精神，不断夺取胜利，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和煦春风，吹进厅堂，吹拂着全体学员和指战员们的脸庞。厅堂上异常寂静，只有邓小平铿锵有力的话语不时在学员和指战员们耳边回响。他们似乎看见了前面的曙光，胜利的红旗在高高飘扬。

训练班由红七军领导轮流上课，主讲马列主义基本常识，共产主义A、B、C，一般军事技术和红军游击作战中通常采用的战术等。3月上旬，国民党军驻赣州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马岂旅）纠集南康、上犹、崇义三县国民党警察队及其唐江商团，从扬眉、上犹中稍两路合围进袭崇义县城。训练班随红七军移至上犹营前，随即结业，学员回各地开展革命工作。这个训练班为发展上崇苏区培养了一批骨干革命力量。

告别崇义

红七军在崇义得到良好休整，在红七军的领导和帮助下，崇义农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成功地组织和发动了城区、内外西区农民武装暴动，崇义地方党组织空前壮大。2月底，红七军前委改称“团委”，又称“小前委”，邓小平担任团委书记。此时，团委从地方党组织中得知中央已开过六届四中

全会。红七军自离开左右江远征到现在与中央一直断绝联系。3月7日，红七军在县城召开的“团委”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派人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建议。“团委”成员经研究讨论，同意邓小平的建议，并决定邓小平前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还决定邓小平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团委”书记。

3月9日，中共赣南特委书记陈致中从信丰来到长潭。中午前后，邓小平、许卓代表“团委”赴长潭与赣南特委研究地方工作问题。

邓小平、许卓一路风尘仆仆，傍晚时分到达长潭。邓小平与陈致中见面分外高兴，互相问候。话语转入正题，陈致中说：蒋介石正调兵遣将，准备对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敌人可能很快要进攻崇义。并谈了赣南各县苏区的发展情况。崇义附近邻县革命武装薄弱，红七军目前力量也不雄厚，敌人来了红七军很难站稳脚根，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邓小平与陈致中具体商谈了红七军的去向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可以到信丰去。”信丰自红三十五军奉命调离后，苏区遭损失。邓小平认为在那里可以巩固当地红色政权，实现扰敌后方任务，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作用更大。经过大家认真商讨，决定红七军到信丰去，但必要时也可遂川一行。

3月10日，天下滂沱大雨，雷声隆隆，邓小平一早到长潭苏区医院看望了还在就医的伤病员们。邓小平亲自看了伤病员的伤口情况，问寒问暖，叮嘱他们要安心养伤，争取早日康复。

近中午，大雨仍下个不停，邓小平、许卓冒雨返回县城。黄昏时分，返回县城途中的邓小平、许卓听见县城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知敌人已进攻崇义县城。许卓这时对邓小平说：“部队或许会立即转移，过埠有条水路通上犹，我看你就此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我设法返回县城了解情况，然后带部队转移到信丰。”邓小平感到很为难，这个时候怎能离开部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邓小平认为，部队还没脱离险境，正处敌人进剿中，去上海应在部队脱离险境后再作打算。但许卓说去上海是组织所作决定，正因为部队还处困境中，为了红七军的前途和命运，更应尽快与党中央取得联系，部队有“团委”的同志，是没有问题的。为了顾全大局，邓小平同意了。邓小平最后叮嘱许卓，部队设法到信丰去，必要时也可遂川一行，向井冈山靠拢。邓小平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乘木船渡过埠江离开崇义。

（周杰、郭礼祥执笔）

“棉里藏针”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当邓小平一九三一年八月回到中央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时，他陷入了困境。该县正在搞“肃反”运动，这是定期在秘密革命运动中搞的清洗运动之一。肃反运动是因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事件引起的。

一九二六年，南昌的一些中国的民族主义右翼分子成立了一个亲国民党的组织，叫做 AB 团。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AB 团是个无足轻重的小组织，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但许多年青的中国爱国分子都曾加入过 AB 团。

一九三一年，当许多中国青年从苏联回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时，党的保卫人员就要他们交代过去曾参加过的组织。不少人说他们曾参加过 AB 团。一系列的主观推断和无端猜疑使得保卫人员相信 AB 团就是国民党企图渗入共产党队伍的特务组织，“AB”二字代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缩略语。这一危险的胡诌尚未全面传播开来，便发生了三四千名 AB 团嫌疑分子被逮捕，许多人被枪决的所谓富田事件。

由于国民党造话说它有地下组织（实际并不存在），更增加了人们对 AB 团的恐惧感。党的保卫人员采取逼供手段，使数百人无

中生有地“坦白”自己是 AB 团的成员。邓小平接管瑞金时，在瑞金监狱里究竟有多少人坐待处决，没有可靠的估计。但是大概不下数百人。

邓小平制止了这一政治迫害。他下令对所有被关押的人进行详细的审查。大部分人恢复了原职，如果发现他们滥用职权或犯了错误，则予以撤职。周恩来在一两个月后抵达苏区时，也支持采用同样的办法。在制止这种疯狂行动的过程中，邓小平得到了谢唯俊和瑞金其他党的干部的协助。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杀人的现象停止了。

那些被捕者被称为“隐藏在党内的敌人”。所有这一切同三十多年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统治时期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邓小平在这个时期成了一个著名的受害者。一九三一年在瑞金与一九七七年在北京一样，他最终制止了歇斯底里的发作，释放了无辜的人。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的时间不太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宣布成立“临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瑞金成为其“红色首都”。

几十月之后——邓已记不得确切日期——他被调离瑞金，去担任不太重要的职务——会昌县委书记，紧接着又兼任寻乌和安远县委的书记。这听起来相当不错，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三个县都是不久前才获得部分解放的新区。当时红军并没百占领这三十县的县城。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冬，邓小平的日子又不好过了。众所周知，他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此时，博古及其反毛派开始接管中央苏区，发起剥夺毛的剩余权力的运动。

邓在一九八四年回忆说，他担任三个县委书记之职约半年之久。尽管邓

胡华 1984 年 10 月 29 日采访。

细节来自阎景堂（1984 年 10 月 24 日）和胡华（1984 年 10 月 29 日）。洛甫曾告诉斯诺，在整个中央苏区被处决的“反革命分子”，即同一般“阶级敌人”有区别的政治犯，不超过一千人。他估计，在江西处决了四百到五百名地主和数百（不超过一千）名高利贷者，在长征过程中处决的地主和官吏不超过一百名（斯诺《中共杂记》88 页，哈你，1957 年）。

告诫他的同事们对于编写和研究历史必须精确，但他却拒绝写自己的回忆录，也反对别人为他写一部正式传记的建议，这也许是因为他厌恶以毛为中心的个人崇拜。

那时的反毛运动是由党内刊物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掀起的，这篇文章大概是由博古或洛甫写的。“布尔什维克”们不敢公开攻击毛，而是采用中国政治中指桑骂槐的方法批评福建省委书记、毛的坚定支持者罗明。文章没有提及邓小平，但是谁都知道，邓与罗明的观点相同，并且都拥护毛泽东。

罗明几乎立即被解除职务。邓小平被调至江西任省委宣传部长。

四月十五日，洛甫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一篇文章，由此，反邓的运动便公开了。洛甫公开点名，首先指责邓小平是“罗明路线”的追随者，被点名的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还有帮助邓反对清除 AB 团歇斯底里运动的谢唯俊和长期支持毛泽东的古柏。四人均被解除了职务。红军开始卜证时，其中毛、古两人被留下来，而且都丧了命。

此时，邓被送到了红军的总政治部接受“批斗”。有关这次“批斗”的报导是相互矛盾的。斗争绝不是温良恭谦让的。用暴力伤害肉体是司空见惯的事。挨斗的人被关押起来，显然，邓也不例外。五月六日党中央局杂志《斗争》上发表罗迈（李维汉）的一篇文章，文章号召对邓和“罗明路线”的其他追随者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

争”。罗迈是党的组织局书记。他激烈要求对邓进行处分。正是在这个时刻，邓的夫人阿金（金维映）和邓离婚，改嫁给高大英俊、深思熟虑的罗迈。这是否促使罗迈对邓采取严厉的态度，无法证明。

阿金是广东人，人们记得她是一位颇具天资的女人，和邓一样，她在瑞金时是党的一位书记，而且据说有点个人主义。阿金和罗迈一起完成了长征，但他们在延安离了婚。

邓小平被指责执行了一条“富农路线”，因为他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分给穷人，而不去触动中农。他还认为应当在各县保留地方武装力量，而不应象“布尔什维克们”所坚持的那样，把所有的武装都统一到中央指挥之下。他还支持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

邓小平在被批斗时写了两三份检查，承认他低估了“进攻路线”，但指控他的人对此还是不满意。他坚持说：“我再没有别的可说了。我说的都是实话。”说罢，他把腰板一挺，直直地站在那里，不愿为此再费口舌了。

杨尚昆：1984年11月8日采访。

毛泽覃的独立师政委职务虽然没有撤销，但他在这段时间里和在于都的毛泽东住在一起（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罗迈文章《为捍卫党的路线而斗争》批判邓的正式指控有，（1）在军事上执行单纯防御路线，反对党的进攻路线；（2）反对攻打大城市和把红军扩大到一百万员额的政策；（3）对四中全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不信任。

细节来自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罗明夫妇均参加了长征，但在贵州留了下来，因为罗明在1935年2月的娄山关战斗中中弹炸成重伤，其妻又患病（胡耀邦：1984年6月14日北京采访）。二人痊愈后，先是为地主干活（罗明当帮工，罗明的妻子当厨工），后来逃回广东梅县，从那里又去新加坡和马来亚当了教员。解放后他们返回祖国，罗明担任了华南大学的校长（张援远：1985年1月11日来信）。1985年，罗明仍健在，时年九十岁，担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杨尚昆将军回忆1950年在北京第一届全国人大

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陆定一是苏区宣传部长。“文化革命”期间，红卫兵曾把他打成重伤。

“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红军撤出苏区时，唐义贞被迫留在苏区。她的丈夫走完了长征，并幸存下来了。

邓小平在被“批斗”期间的表现同他在以后年代中的表现是一致的。他愿意承认错误，但当他相信自己正确时，他就不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在这一点上毫不动摇。

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大约有六七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杨尚昆将军说：“他被送到基层去了”。但不知道具体做什么。

最准确的一种说法是，他被派到离瑞金很远的乐安县南村区去当“巡视员”了。但似乎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巡视了些什么。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那是个很低的职位。他在那里呆的时间很短，可能不超过十天。那是个游击区，用军史研究员阎景堂的话来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在这片无人地带周旋，打得“难分难解”。瑞金有些人担心“会出事”，所以又把他调了回来。

他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受伤的王稼祥。他担任秘书长这一职务有两三个月时间，后来据说他主动请求解除了这个职务，成为一名普通的政工人员。另一种说法是，根据邓自己的请求，担任红军机关报《红星报》的编辑。但是，李一氓指出，长征期间，不可能发行《红星报》，所以在总政治部邓没有什么事可干，只是同李一氓一起徒步行军。李一氓后来又纠正自己的说法，说他们每人分到一匹马，实际上是骑马行军。

不论情况如何，在遵义会议，或在此之前不久，这些都发生了变化，邓小平以《红星报》编辑的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不过，据他回忆，在遵义会议前不久召开的黎平会议期间，他已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或按照刘英的说法，他担任“中央直属队”的秘书长。

（原载《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

会议上看见罗明的情景：一个人走上前同他握手说：“你不认识我啦？我就是罗明路线呀！”（杨尚昆：1984年10月28日采访）。

王愿坚：1984年3月5日采访。

王愿坚：同上。

杨尚昆：1984年10月3日。

阎景堂：1984年10月24日采访

关于邓主动要求调动的说法来自阎景堂。这一说法同其他说法有矛盾。一种说法形容邓像普通战士一样参加了长征；另一种是李一氓提供的，他说他同邓一道在干部团行军，每人都有一匹马。阎是从党的文件研究部门取得上述说法的，而该部门是通过访问长征期间的领导干部来了解情况的。由于邓不愿就其经历接受采访，所以他早期的许多活动情况仍多少有些模糊。胡华教授认为，邓虽然被指控追随罗明路线，但由于领导上意见分歧，所以处理得比较宽大。当时周恩来和洛甫都主张从宽处理，而罗迈主张严厉惩处（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邓小平和他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 中共会昌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1932年7月，中央苏区南部建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亦称“会寻安中心县委”）。会昌中心县委的建立，使中央苏区东南边境的会昌、寻乌、安远3县联成一个整体，加强了党对中央苏区边区的领导。

从1932年7月至1933年7月的一年时间里，会昌、寻乌、安远3县在中共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保卫苏维埃红色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会昌、寻乌、安远3县，位于赣南南部，与福建、广东接壤，东是武夷山、南是九连山，山峦重叠，地势险要，是江西通往广东、福建的重要门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寻乌、安远等县进行了马列主义传播，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两县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领导本县的工会、农民协会等组织，开展了工农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寻乌、安远两县的革命暂时转入低潮，但并没有停止党的活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开始，党又在寻乌、安远、会昌等县广泛发动群众，先后建立和恢复了党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寻乌、安远、会昌3县先后举行了农民武装暴动，成立了工农地方武装，并组建了红二十一、二十三纵队，为后来毛泽东、朱德等人率领红军开辟赣南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央苏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后，会昌、寻乌、安远等县的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积极配合红军开展土地革命，进行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到1931年11月，先后解放了寻乌、安远、会昌等县县城，建立了县、区、乡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同时还组建了地方武装，使3县成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县份。在中共江西省委的领导下，3县的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各县都先后召开了党员和党代表大会，进一步健全了各级党组织。

1930年8月至1931年冬，中央红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向中央苏区发动的一、二、三次“围剿”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已联成一片。到1932年春，已经发展到赣、闽两省29个县的广大地区，建立了25个县苏维埃政权，拥有人口300余万。

蒋介石在第三次“围剿”苏区遭到失败后，经过9个月的长期准备，1932年6月，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指导下，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这次敌人共纠集了81个师、29个旅又39个团共63万人的兵力，由蒋介石亲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他的策略和计划是：利用各苏区和红军之间联系不易，配合较差的弱点，采取逐次转移重点和兵力，实施各个击破，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得手后，再移兵南下，会同南方各省军阀部队夹攻中央苏区。

蒋介石开始部署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期间，为了达到其预定的军事目的，采取种种手段与粤军妥协，勾引粤军积极参与“剿共”战争。为此，蒋介石任命粤军首领陈济棠为赣粤闽边区“剿匪”副司令，余汉谋为粤军总指挥。受命后的粤军占领了广东兴梅地区和福建上杭、武平等地区，并不断向中央苏区进攻，因此，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寻乌、安远等县与粤军占领区

形成严重赤白对立。为了加强中央革命根据地边区工作，有效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向南方发展游击战争，1932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的精神和江西省委的指示，决定在会昌筠门岭建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3县的革命斗争。

筠门岭镇距会昌城56公里，距寻乌58公里，距安远50公里，系会昌、寻乌、安远3县交界点，水陆交通要道，通往福建、广东的咽喉重镇，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一首古诗说明筠门岭地势之险要：“长沙小密垒空空，各寨遗名指顾中，洋口峡收三县水，军门岭（筠门岭古代称‘军门岭’）纳百蛮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块红色区域中，筠门岭和红色首都瑞金只有100公里，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因此，会昌中心县委就设在这里，守卫着中央苏区南大门。

1932年7月，在筠门岭倒水湾召开了会、寻、安3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3县区以上的党员干部共100多人参加。邓小平、罗屏汉分别作了大会发言。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原会昌县委书记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罗屏汉任组织部长，廖省中任宣传部长，张瑾瑜任妇女部长。中心县委机关驻筠门岭坝下。通过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3县的党员干部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成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的目的和今后的任务。

会昌中心县委下辖会昌、寻乌、安远3个县委和28个区委、164个党支部。会昌中心县委的成立，使会昌、寻乌、安远3县的党和苏维埃建设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以邓小平为首的会昌中心县委朝气蓬勃地领导3县40多万人民投入到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保卫中央苏区南大门的革命斗争之中。

（二）

“一切为了战争”，粉碎国民党“围剿”是会昌中心县委的中心工作，中心县委成立时，3县的军事力量很薄弱，红军主力只有独立三师。正如邓小平41年后回忆当时现状所说：“3县都是中央苏区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枝很少”（中发[1973]第14号）。要取得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东南战线的胜利，必须大力发展3县的地方武装。为此，中心县委指示3县县委、县苏要以冲锋的精神迅速扩大地方武装，于是，会昌、寻乌、安远3县掀起了人人参军参战的热潮。1932年10月统计：寻乌有红色游击队721名、模范营1239名、模范小队635人；安远有赤卫军模范营17连，共2267人、模范小队共5连、520人，工人赤卫军35人，另有各区游击队整编成的游击队、下设3个支队，共262人；会昌具有脱离生产的两个游击支队，共390人，另有赤卫军4970人，模范师2529人。

地方武装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反革命，消灭地方残余团匪，巩固苏维埃政权，同时积极配合红军作战。

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中央苏区东南边区的游击战争有很大发展。安远县委1932年10月向中心县委报告：安远地方武装在七、八、九3个月，共打下反动土围炮楼12个，并作出了攻打其余土围子的作战计划。会昌地方武装在邓小平和罗屏汉的指挥下配合红军独立三师，解放了闽赣边的乌鸦泊、官丰、膳坑等地，消灭了细八哥、郭发贵、大头五（均力靖匪首领）等反动武装的大部分力量。在中心县委的指导下，迅速恢复和建立了乌鸦泊、官丰、招信政权。打通了会昌与武北的联系。

面临粤军的严重威胁，为了统一会昌、寻乌、安远、武平等县的军事指挥，根据中央和江西军区的指示，1932年7月，成立了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调会昌县军事部长钟亚庆任指挥（司令员），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兼任政委，吕赤水任参谋长。

1932年10月，根据驻武平东留的钟绍奎、钟文才部靖卫团匪，经常窜到苏区骚扰的情况，邓小平指示要三分区和会昌、西江、罗田游击队一起出击东留。三分区指挥钟亚庆、副参谋长游端轩率领部队于上午10时40分到达东留圩，战斗打响后，经过1小时的激战，钟绍奎就被击得大败，这次战斗不但沉重打击了钟绍奎、钟文才团匪，而且对上杭、武平一带的粤军也是一次打击。

1932年9月，在筠门岭芙蓉寨召开了军事会议，三分区和红军独立三师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县的区委书记、区苏主席、区军事部长等数百人。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兼三分区政委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他分析了战争形势，布置了各武装部队的作战任务。会议根据上级指示、红军独立三师编入三军团二十二军，研究了成立新独立三师的有关事宜。独立三师走后，会昌、寻乌的赤卫队和武西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合并在一起，在吉潭成立新独立二师，师长蒋信才，政委罗贵波。这支部队长期战斗在会昌、寻乌、安远之间，但由于新独立三师是地方武装临时组建的，又没有时间进行正规训练，武器装备又差，所以战斗力不如红军正规部队。粤军乘我武装力量刚刚削弱之机，集中优势兵力，于11月向寻乌发动大举进攻，我新独立三师和各县游击队与敌人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寻乌县城被粤军占领（后被“左”倾错误执行者称为“寻乌事件”）。寻乌县委、县苏机关撤至澄江。

寻乌失守后，中心县委立即在筠门岭召开了会、寻、安3县县委书记、县苏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议。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主持会议，根据寻乌县城失守情况，研究部署了新的军事行动和有关扩充地方武装等问题。会后，3县县委、县苏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参战，采取坚壁清野和灵活游击战术粉碎敌人进攻。

会寻安3县地方武装，自1932年12月至1933年7月，在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攻击靖卫团土围子数十次，并经常配合红军作战。仅据《红色中华》报道，14个月来，红军和地方武装并毙敌100多人，俘敌近200人，缴获枪支350多支，其它物品甚多，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狠狠打击了地方团匪和粤军对苏区的骚扰。在粉碎国民党向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阻击和钳制广东军阀陈济棠部向中央苏区的进攻，为保卫中央苏区东南边区作出了贡献。

（三）

扩大红军，壮大革命武装力量，是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会昌中心县委根据中央关于扩大红军的决定和江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精神，认真抓了扩大红军工作，对扩大红军工作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部署，扩红任务由各县苏落实到各区。为确保完成上级分配的扩红任务，中心县委多次召开了3县县委书记、县苏主席和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指示各级党政领导要使扩红的意义和优抚红军家属的条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坚决反对强迫命令和欺骗、购买；各级干部、党团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用冲锋的精神、竞赛的办法去完成扩红任务。根据中心县委的指示，各级干部深入到基层进行政治动员；少共县委、工会、妇女部等分别组织了游艺团、宣传队巡

回演唱，并利用大小会议和纪念活动，广泛地向群众宣传国内外形势、红军的胜利、国民党和土豪劣绅的残暴等。经过广泛的宣传动员，会、寻、安 3 县人民保知要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使自己彻底解放，只有英勇奋战、推翻反动统治。因此，纷纷奔赴前线，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郎、已弟相争当红军的动人事迹。1932 年 12 月，仅安远县安城区就有 11 个妇女鼓动丈夫参加了红军；会昌县下照乡曾八庆，年仅 13 岁要求当红军，未被批准，就坐在政府不回家，区干部只得送他去当了红军通讯员。由于县委、县苏激动人心的宣传鼓动，工会、妇女部和儿童团的扩红巡回演唱，大大激发了广大热血青年参军参战的革命激情。1933 年 2 月 7 日，会昌县在纪念“二·七”京汉工人大罢工的示威中，当场 28 人报名当红军；3 日内，“会昌动员了一团汗往前方”，“在开发前的一天晚上，中共、少共县委、县苏、工会、妇女部等部门代表都致词祝贺，城市工人和儿童表演新戏作了很热烈的政治鼓动，当场又有 11 个船业工人（门岭来的）报名加入红军”。安远县在红五月中，仅安城、车头、天心和上濂 4 个区就有 5 个连的模范少队在“广大群众的欢送声中英勇加入了红军”。为此，中共、少共县委发出《告全县赤少先队员书》，号召全县工农群众和少先队员向他们学习，积极加入到红军队伍中去。

为了配合扩红运动的顺利开展，会昌中心县委很重视拥军优属工作，各级都设立了拥护红军委员会，还组织了耕田队。邓小平书记亲自带领中共、少共中心县委机关干部，到乡村实行“共产主义礼拜六”制度，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插秧、收割等，从而使“共产主义礼拜六”制度成了 3 县各级党政干部务必遵守的制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多做半天工”。邓小平还经常带领干部走访红军家属，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3 县县委、县苏经常召开红军家属座谈会、茶话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在中心县委的重视下，使参军光荣，拥军优属在 3 县各地蔚然成风，大力地促进了扩红运动的深入开展。

在积极做好扩红运动的同时，3 县根据上级指示，开展了归队运动。安远县苏于 1933 年 3 月 25 日发出《关于归队运动的训令》，寻马县委要求各乡成立“归队运动委员会”，两个月内动员 70% 的回家战士归队。会昌县利用宣传队演唱自编的“十唱开小差”和“归队歌”来进行宣传鼓动，不少开小差回家的战士，在干部群众的宣传动员和家属的劝导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归到了部队。在这次扫队运动中，仅安远县的安城、上濂和天心 3 个区就动员了 50 名战士归队。

为了支援战争，会、寻、安 3 县人民积极响应会昌中心县委号召，组织了运输队、救护队、向导队、破坏队、慰劳队、洗衣队、交通人等 7 种参战组织。据 1932 年 10 月安远县委工作报告，安远县有上述 7 种参战组织共 5760 人。同期，会昌、寻乌 2 县也组织了近万人的参战队伍赴前线。3 县人民还经常筹集物品慰劳驻地红军和参战游击队，1933 年 3 月，仅会昌县就送了布鞋 5100 双，草鞋 1567 双、物品 26 担、大洋 160 元。3 县共送慰劳品：布草鞋 1 万多双，食品 200 多担，还有大量的毛巾、雨具等日用品，自愿参加的慰问代表数百人。

（四）

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团、工会和妇女等组织的作用，是最广泛地发动群众，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建设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重要保证。

会昌中心县委成立后，非常重视党的自身建设。首先，改组了部分县委、区委，健全了县、区、乡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构。1932年秋，邓小平同志根据上级改组寻乌县委的指示，步行到寻乌县城，经过深入调查、了解情况后，免去了当时积极推行“左”的错误政策，把部分苏区干部当“AB”团杀害的县委书记梁锡古的职务，任命胡荣佳为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要求各县抓好对区委、乡支部的改造工作，将少数阶级异己分子、动摇分子从党的领导机构中清除出去，同时吸收工人、雇农干部进入县、区、乡各级党的领导岗位。例如，安远县委改选时，引进工人干部5人。1932年10月，在会昌中心县委的指导下，会昌县召开了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共会昌县执行委员会，会昌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兼任会昌县县委书记。同年秋，安远县委在上角召开了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中心县委要求各县县委应经常检查和指导区委和乡支部的工作，把革命斗争中的优秀党员及时安排到领导岗位上。为了及时了解各县的情况，正确指导各县的革命斗争，会昌中心县委要求各县委定期总结工作，及时写出书面汇报材料。1932年10月，会昌、寻乌、安远3县县委总结了七、八、九3个月的工作，分别向会昌中心县委写了书面报告。11月，邓小平率中心县委干部到安远县视察工作，在听取了安远县的工作汇报后，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在县委组织的纪念十月革命的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3县28个区委164个乡党支部率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积极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工农业生产。在实际斗争中，各级党组织成为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真正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

在健全各级党组织领导的同时，会昌中心县委还认真抓了党组织的发展工作，要求各县党组织大力在工农群众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一大批斗争坚决，意志坚定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了党组织，给组织增添新鲜血液，使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仅据1932年7、8、9三个月统计：会昌县发展党员1638人，寻乌发展476人，安远县发展590人。3县发展的党员中，妇女占有一定的数量。对于新发展的党员，各县均有半数以上的支部举办了最少一次的党员训练班，以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

在加强党的建设中，会昌中心县委特别注意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共产党员冲锋在前，以模范的行动影响和带动3县人民进行各项活动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会昌县麻州区第六乡乡苏主席、共产党员刘定记，在扩红运动中，他带头报名，动员和带领10人参加了红军。会昌城市区委书记陈长林，动员并率领150名农民赤卫队员，攻打盘踞在乌鸦泊山区的地主武装靖卫团。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的模范事迹，更为3县人民称颂。他深入实际了解情况，经常亲自到边区检查路口岗哨，走进烈属家庭了解其疾苦，亲自带领干部帮助红军家属插秧，他在寻乌提倡“一杯清茶话送别”……由于加强了党的建设，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因此，会昌、寻乌、安远3县的革命斗争，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边界的红色苏维埃区域不断巩固和扩大。

成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的同时，也成立了少共会昌中心县委，刘传芳任书记，组织部长刘启豪，宣传部长王耀南、许学增，儿童局书记朱仲友。少共会昌中心县委机关与会昌中心县委机关合署办为了充分发挥共青团的助手作用，会昌中心县委于1932年9月，在会昌县城“西邹祠”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县、区少共干部训练班。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力训练班学员作了报告，

组织部长罗屏汉、宣传部长廖省中等分别为训练班讲课。

少共会昌中心县委发动了 3 县团员和青少年，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各项运动，朝气蓬勃地为完成党的各项任务而斗争。

少共会昌中心县委根据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关于加紧赤色戒严的指示”，认真部署了 3 县的赤色戒严工作。组织赤少队在党政机关驻地和主要交通路口，站岗放哨，检查路条等。1932 年 10 月统计：会昌有步哨岗 94 个，查路条岗 61 个。寻乌县委于 1933 年 4 月规定：坚决执行 5 里一哨，每个岗哨至少要 3 人，日夜坚守。由于加强了赤色戒严工作，使妄图混入苏区的国民党特务胆颤心惊。

1933 年 5 月 20 日，少共中央局作出《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为彻底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1933 年 7 月 10 日，少共会昌中心县委发出《为创立少共国际师告全县少先队员书》，号召会寻安 3 县少先队员整队加入“少共国际师”，武装上前线消灭敌人，并派出干部到 3 县做宣传发动工作，少共安远县委于 24 日召开了全县活动分子会议，专门讨论研究加入少共国际师工作。7 月中旬，门岭、罗田两区动员了 80 多人加入少共国际师，为 3 县作出了榜样，少共中心县委号召 3 县少先队员向这两区学习。在扩红突击运动中，会寻安 3 县千余名青少年踊跃报名参军。仅安远县 1933 年 5 月就有 5 个连的模范赤少队加入红军。

会昌中心县委建立后，便指示 3 县县委要进一步健全各级工会组织，指导各县工人运动。在县委的领导下，3 县先后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接着各区成立了工会，1932 年 12 月底统计：会昌、安远 2 县共有区工会 18 个，工会支部 119 个，会员 3000 多人。3 县工会主要开展的工作是：领导工人向老板作斗争、保护工人利益、协助党和政府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宣传动员工人参军参战。9 月，会昌县工会与瑞金、胜利两县订立了 3 县革命竞赛条约，条约规定了扩红数目和参加组织等 6 项条款。9 月 15 日，寻乌县工会发动工人捐款大洋 16.22 元，支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会昌县工会领导工人在推销公债、参军参战等项工作中成绩显著，多次受到中央通报表扬。12 月 11 日，会昌县工会在县城召开了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过去的工作，详细讨论和部署了今后的工作任务等。3 县县、区都设立了工人失业介绍所。春节前夕，会昌、安远两县工会领导工人与老板作年关斗争，使每个工人获得 6—15 元的年终补贴。3 县工会领导工人与老板签订集体劳动合同，保护工人利益，11 月统计：寻乌县签订了 100 份合同，安远县签订了 59 份合同。会昌县长兴号邓老板不肯与工人订劳动合同，会昌县工人举行罢工，捉拿邓老板游街，并罚了他 300 元款，结果各店老板都按期与工人订了劳动合同。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通过 3 县工会干部的努力工作，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得到了改善，革命热情不断高涨。

会昌中心县委的工作机构中设有妇女部，负责指导会寻安 3 县的妇女工作。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谋求妇女的彻底解放，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封建束缚，参加扩红运动，慰劳红军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

在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3 县的妇女工作有很大的起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32 年 10 月统计：会昌发展了妇女党员 93 人、妇女团员 320 人，寻乌县发展了 52 名妇女党员，妇女团员也有相当数量，同期，安远县发展的党团员中妇女比例占 10% 左右。3 县妇女部经常组织洗衣队并筹集物品到驻地红军和参战游击队去慰问。1933 年 4 月 30 日，安远县安城区、坪岗区和

东头区等组织了慰问队，带着很多猪肉、香烟、糕饼、鸡蛋和粉丝等物品，来到后方留守处慰问伤病战士，“慰劳队的同志向着战士慰问唱歌，亲亲爱爱，使伤病战士简直忘记了伤病，大家都高兴得很，喜气洋洋。恨不得马上病好就回前方杀敌人去”。

（五）

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寻安3县人民，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业生产和经济文化建设，积极推销公债，支援革命战争。

会昌中心县委成立不久，会寻安3县都不同程度的进行了查田运动。

1931年11月27日，红三军团三师攻下会昌城后，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分配土地运动。贫苦的会昌人民从而分得了土地。但是，也有的地方土地调查下深入，富农瞒田不报，田地分配不合理。1932年7月，中央政府派梁柏台到会昌巡视工作，并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政府根据汇报情况，于8月22日对会昌县苏主席团的工作作了指示，批评会昌“土地革命斗争未深入，土豪有分了土地的，富农有分了好田的，甚至有的地方土地还未分配”。会昌县苏主席团接到中央政府的指示信后，对工作作了布置，抓紧了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没收了土豪的家产，对全县的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并于10月25日，召开县苏扩大会，作出“要组织查田委员会，进行彻底的分配土地”，“要坚决的、迅速的没收豪绅地主反动富农的一切家产”等决议。中央政府派了20多人组成的工作团，来会昌帮助查田。在中央查田工作团和县、区查田运动委员会的努力下，会昌的查田工作进展很快，各乡都组织了调查土地委员会和分田委员会，重新分配土地。在这次查田中，查出土豪84家，查出被豪绅、地主、富农隐瞒的田共16824担零5升，还缴获了他们所埋藏的步枪44枝、手枪2枝、子弹数百发，以及其它军用品。对全县的土地、人口和阶级成份状况等基本摸清。全县居民45495家，人口206866人，其中：地主1077家，6914人；富农1663家，16914人；全县土地，上田144999担，中田417102担，下田752299担8斗半。

1932年，安远县通过七八九3个县的查田工作，查出全县有田共约274013担，但全县的土地未完全分好，尤其是边区和新发展区域未曾分田，有的区甚至没有成立查田委员会，10月，县委决定“调有分田经验的同志，组织分田工作团去帮助分田，并召开全区土地会议讨论，限10月底要分好”。

由于毛泽东在做“寻乌调查”时，直接指导寻乌县的土地分配工作，所以寻乌县除边区没有彻底分配好土地外，大部分地区分得较好，人均土地4石余。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寻乌县委遵照中心县委的指示于1933年4月作出决定：“（1）各区尚未分好田的乡村至迟在4月25日前分配好；（2）其它各区在4月15日前要组织一个10人以上的查田突击队受县苏土地部指挥，互调到各区进行查田，至迟4月25日查好，如有豪绅分了田、富农分好田及瞒没田的应即抽出，经过群众的意见来补助或讨论。（3）由县苏土地部征调20个以上的有分田工作经验的党员或群众组织两个突击队，到项山、寻南去分配土地，在4月底以前要完全彻底解决。（4）山林房屋鱼塘等，各区未分好的同样在4月底一概分完，特别（是）吉潭、项山更要做好工作。”

在中央和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会寻安3县的查田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受土明“左”倾土地政策的影响，也存在不少问题，对查田工作中的错误做法，在后来毛泽东指导下的粤赣省查田运动中得到了纠正。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极大地调动了会寻安3县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

3县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景象。

在工业生产方面。会昌中心县委根据3县的实际，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了手工业生产。例如刨烟、造纸、染布、造船、烧砖瓦、烧石灰、熬蔗糖、制农具等，店面和作坊增多，工人在各县职工联合会组织下，努力发展生产，尽量满足本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为了粉碎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3县人民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制药、织布、利用老壁土制作硝盐。各县还开办了小型兵工厂，修理枪支、翻造子弹、制造挨丝炮和马尾炸弹，以保障驻地红军和地方游击队的武器弹药的供给。农业生产方面，由于农村大部份青壮年已经参加红军，农村劳动力缺乏已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最大困难。为此，会昌中心县委号召农村妇女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冲破封建意识。学会犁田、耙田和蒔田等农活。为了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会昌县各乡村普遍成立了妇女劳动委员会。妇女们响应会昌中心县委的号召，挑起了发展农业生产的重担。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山歌：“春风吹来百花鲜，多少细妹学耕田，女人赛过男人头，亲哥看了笑连连。”由此可见，妇女成了苏区农业生产的生力军。为了抓好春耕生产，各县、区、乡还成立了春耕生产委员会，负责领导当地的春耕生产，各村都组织了生产突击队和耕田队，为红军家属和红军公田耕田等。3县都把好田划为红军公田，仅会昌、安远就划出了3251担。1932年夏收后，会昌县九部分区就集中了红军公田谷1560担。1933年春耕前，3县人民积极响应中心县委的号召，积极开荒造田，扩大种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会昌县茶样区一个区就开垦荒田千余担，受到中央的通报表扬。由于中心县委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1933年夏，会寻安3县呈现一派丰收景象。会昌中心县委宣传部发出《为保护秋收消灭进攻寻安苏区敌人——告会昌寻乌安远3县劳苦群众书》，号召3县人民在搞好秋收的同时，随时准备消灭敢于来犯之敌。

“发展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对红军作战经费经常供给和接济，是决定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为发行革命战争第一、二期公债券，中央执委分别于1932年6月、11月发布第13号和第17号训令。根据中央的命令，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寻安3县人民进行了推销公债运动，中心县委召集了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专门讨论研究推销公债问题，任务由县苏落实到基层单位。为了保证完成推销公债任务，各级干部分别深入到各区、乡、厂、店积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因此，会寻安3县迅速掀起了推销公债的热潮，提前超额完成了中央分配的任务，两期共推销近二十万元。尤其是会昌县，一、二期公债分别超额完成8000元，多次受到中央的通报表扬。完成了推销公债券任务后，3县工人又开展了退还认购公债票，无偿支援革命战争的经济动员工作。会昌县工人在经济动员中，共退还公债票216元。3县少共县委和儿童局，1933年初，发动少年儿童募捐购卖“儿童号飞机”送给红军打敌人，1月统计：3县共向国家银行捐了209.77元。

为了节省开支，保障红军给养，支援革命战争，会昌中心县委指示3县积极做好征收上地稅工作，同时进行了节省运动、借谷运动。3旦党政组织坚决贯彻“取消苛捐杂稅，实行统一累进稅”的政策，首先积极做好土地稅征收工作，会昌县在1932年12月，集中了59691元的土地稅上繳中央政府，安远县也集中上万元的土地稅。在节省运动中，3县从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做起，3县规定党政机关干部普遍实行每天一餐粥、二餐飯，各级党政机关还想方设法，尽可能压缩办公费用。寻乌县苏于1933年1月4日发出《重新规

定伙食费》的通令，对各类工作人员规定了较低的伙食标准，其中机关干部为每人每天一斤米、3 分钱菜金。会昌县还认真抓了消除贪污浪费现象，全县除茶梓、乱石两区外，党政军（包括三分区）的经费基本做到自给。同时，3 县开展了群众性的借谷运动。寻乌县委 1933 年 4 月 5 日工作计划中规定，各区乡预定的借谷任务应在 4 月 20 日前完成。5 月 30 日，寻乌县在区财政部长联席会议上又作出《关于借谷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区将向群众借的谷，尽快送给红军。安远县集中了群众节约的 950 担谷，以低价卖给红军，得到中央通报表扬。

为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会昌中心县委根据会寻安地处闽粤赣边的特点，发展了出入口贸易，3 县主要出产的大宗产品有：茶油、稻谷、大豆、烟叶、茶叶、杉木、纸和香菇等物品，而苏区需要进口食盐、煤油、布匹、药材等物资。为了闯过敌人的严密封锁线，会寻安人民经常采取伪装送葬、把货物藏在棺材里，面上放臭猪肉，或用夹层粪桶内放物品等办法“偷”运物资，有时也采取地方武装在边界地区接送的办法通过封锁线，使物资源源不断的在赤白区交流着，打破了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

根据当时的条件，会昌中心县委尽可能的发展了文化教育、卫生和体育等事业。首先在 3 县开办了列宁小学，1933 年 8 月统计：3 县共有 73 所，教师数百人，90% 的儿童都免费入学。教学课程设有：语文、算术、政治、劳动和音乐等。教师没有薪水，政府仅供每月一、二元的伙食补助，如果家里缺乏劳动力，耕田队给予帮工。同时，对扫盲工作也很重视，各地普遍设立了夜校识字班，约 70% 的青壮年人参加了学习。文艺宣传活动更是活跃，3 县都有俱乐部、剧社和儿童团宣传队等，他们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利用戏剧、歌曲、舞蹈和演讲等形式进行宣传。戏本多是自编自演。他们演唱的山歌、快板，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例如《送郎当红军》就是当时群众最喜爱、流行最广、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小戏。体育活动在 3 县也时有开展，1933 年 3 月底，少共安远儿童局在开展“四·一”儿童节活动时，举行了一天的体育比赛，项目有：跳高、跳远、跳圈、下操、做游戏等。比赛结束后，给优胜者颁发了奖品。根据中央内务部颁发的卫生运动纲要，会寻安 3 县的县、区、乡都建立了卫生运动委员会。城镇居民和乡村农户、按照居住远近，编成卫生小组，定期打扫公共卫生区，使城乡环境卫生发生了新的变化。

（六）

以邓小平力首的会昌中心县委，在实际工作中，坚决地抵制了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自觉地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1933 年 1 月，由于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与在瑞金的苏区中央局会合，为了全面贯彻王明“左”倾错误，随即在中央苏区发动了一场严重错误的党内斗争。首先在福建省苏区发动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撤销了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并改组了闽粤赣（福建）省委，以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接着，把反“罗明路线”斗争迅速地由福建扩展到江西苏区，开展了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是江西苏区党内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同志同王明“左”倾错误执行者长期斗争的继续。早在 1931 年 11 月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中共苏区江西省委即对这次在中央苏区贯彻

王明“左”倾错误的会议进行了抵制。1932年10月召开的苏区中央政治局宁都会议上，王明一伙排斥了毛泽东在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会昌中心县委仍然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抵制王明“左”倾错误。他们从边缘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各项工作。在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面对强大粤军的进攻，不硬拼，不搞“堡垒对堡垒”、“拼消耗”。仍然坚持过去几次反“围剿”的打法，采用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好的苏区来消灭。不同意向中心城市、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而主张向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发展。同时扫清地主“土围子”，巩固农村根据地，积蓄力量，和敌人长期斗争。在扩大革命武装的问题上，他们认为会寻安人民肩负着给红军补充兵员和钳制广东军阀的双重任务，所以，地方武装和中央红军都应不断发展，并应注意质量，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中央红军和不顾质量单求数量的要求“武装一切工农群众”的做法；在扩红运动中，中心县委主张通过广泛的宣传鼓动、细致的思想工作来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反对用欺骗、胁迫和购买等手段强拉硬扯老百姓去凑数；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中心县委在坚决没收地主豪绅和富农的财产、田地的前提下，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尽可能执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正确的土地分配原则解决土地问题。因而被“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指责为“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因为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以邓小平为首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王明“左”倾错误，这就成为王明“左”倾错误执行者在中央苏区完全贯彻“左”倾错误的严重障碍。他们便借助错误的党内斗争来改变这种状况。

1933年2月2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三期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点名批判江西苏区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所谓“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永吉泰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会寻安方面，则产生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使群众受到敌人的摧残”，提出要“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逃跑和纯粹防御路线，反对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2月28日，中共江西省委发出对会、寻、安3县县委指示信，认为“会寻安的党所犯的纯粹防御路线之来源，与罗明路线相同”，“防御路线的结果，必然走到罗明退却路线的前途”。但是，苏区中央局对江西省委的这种分析并不满足，认为省委给会寻安的“纯粹防御路线”所定的调子太低、没有直接指出“纯粹防御路线”就是“罗明路线”，“严厉批评”省委犯了“严重错误”，对省委表示不信任的态度。并决定由中央局直接开会、寻、安3县党的会议，开展所谓反对会寻安“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以反会寻安“纯粹防御路线”为起点，开展了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抓住所谓“寻乌事件”，作为打击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的口实。寻乌失守后，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寻安的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不断地袭扰敌人，终于迫使敌军撤出寻乌城，迅速恢复了被敌占领的苏区。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根据地特别是边缘苏区的这种流动性和不稳定状态，本来是正常情况。会昌中心县委所采取的以游击战争对付敌人的灵活策略，正体现了毛泽东的红军游击战争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但是，“左”倾错误的

执行者却把会昌中心县委有计划的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和以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诬为“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逃跑”，并开展了反对所谓“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斗争。

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撇开江西苏区省委，在会昌筠门岭倒水湾，直接召开了会、寻、安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中央局代表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在中央局的压力下，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火力”，对已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对会昌中心县委进行了无理的指责。3月31日，会议通过《会寻安3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诬蔑“会寻安3县过去在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会议还指责江西省委2月28日给会寻安3县指示信中“把这一防御路线看作是在进攻路线与罗明路线中间的东西”，因此，“这一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不深入，省委也应负一部分重大的责任”。根据中央局的旨意，会议决定改组会昌中心县委和会昌、寻乌、安远3县县委常委；并召开3县各级党代表会议，层层开展反对“会寻安罗明路线”的斗争，“在实际的工作中执行党的进攻路线”。

会寻安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揭开了在江西苏区反“罗明路线”的序幕。4月15日出版的《斗争》第八期，发表了《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和《罗明路线在江西》的署名文章，批评邓小平“仍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这就是说他根本上没有能揭发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实质”，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在江西”；江西苏区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还在江西其他地区”。江西苏区的“单纯防御路线，就是江西的罗明路线”。这些代表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意图的文章，公开指明了江西苏区也有一条所谓“江西罗明路线”，并要求江西苏区省委立即在江西苏区开展这一斗争，“彻底改造各县”，“执行党的进攻路线”。这样，就把所谓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从会寻安迅速扩展到整个江西苏区，对江西苏区内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根据中共中央局的决定，4月16至20日，在中央局的领导下，江西苏区省委召开了江西省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在博古的主持下，以总结江西省苏区全省工作为名，开展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根据临时中央“反右倾”的错误纲领和苏区中央局的旨意，把江西苏区党内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开展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会议决定把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扩展到全省的每一个支部，“彻底肃清在实际工作中的罗明路线”、“动员全党毫不动摇的为党的进攻路线斗争到底”。此后，会寻安的县、区、乡各级党组织，普遍开展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

面对“左”倾错误的打击和压力，邓、毛、谢、古等同志并没有放弃原则。他们在总结会上和所写的二次申明中，以共产党人坚定的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毛泽东的正确主

张。因此，他们受到“左”倾错误执行者的无理指责。5月5日，经苏区中央局的批准，作出了《江西省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的决议》，指责“邓毛谢古四同志第二次申请书与第一次申请书的内容没有任何不同”，“并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总结会后，“左”倾错误执行者对邓毛谢古等同志作了错误的组织处理，改变了他们所在地区的领导地位，使“左”倾错误在这些地区得到完全贯彻。邓毛谢古等同志从大局出发，在组织上服从了这个决定，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个人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优秀品质。

根据上级旨意，1933年6月8日召开了会昌、寻乌、安远3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会昌中心县委，罗屏汉当选为书记，并更换了一部分中心县委委员，7月上旬，根据会寻安3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安远县委进行了改组，谢玉昆任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陈侃被撤职、并被点名批判。不久，寻乌县委、县苏也进行了改组，县委和县苏主要负责人都受到了“无情的揭发和最激烈的斗争”。

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错误地打击和撤换了会寻安3县一批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优秀干部，使苏区干部群众一度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混乱之中，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为了使王明“左”倾错误在苏区得到完全贯彻，“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把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主力红军长征才自行收场。

在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批判邓、毛、谢、古四同志之后，会昌中心县委自觉和不自觉地执行了“左”倾错误方针、政策，“左”倾错误思潮在会寻安3县的党员干部中间泛滥，严重影响了边区的对敌斗争。因此，中央苏区南部边区的形势日趋严重，粤敌步步进逼苏区南大门——筠门岭。

1933年7月，在会昌和瑞金、于都的部分地区分设为会昌、西江、门岭3县。1933年8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48次会议。“为着开展南方战线上的战争，克服与驱逐粤桂敌人，向南方发展苏区、深入现有区域的阶级斗争”，第48次会议决定在中央苏区南方设立粤赣省（机关驻会昌）。领导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7县的斗争，在此之前，会昌中心县委已撤销，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罗屏汉调任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其他干部除留会昌工作外，分别调往西江、门岭等县工作。

（编写单位还有：中共会昌县委宣传部、会昌县教育局）

在中央苏区

李维汉

一九三二年底，我从莫斯科回国。翌年初，我到上海找党中央。李竹声、康生接见了，他们要我留在白区中央特科工作，不久，又要我到中央苏区去。为什么白区被破坏得很厉害，特科工作又缺人，却要我到苏区去？后来才知道，是对我不放心，认为我是靠不住的。四月，我奉命到达中央苏区。

当时，临时中央已于同年一月迁到瑞金。党中央书记是博古，中央组织部长任弼时，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参谋长刘伯承，李德是军事顾问，何凯丰后来是少共中央书记。

我一到中央苏区，很快就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沙洲坝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我说，你怎么叫罗迈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嘛。那时，我对毛泽东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在江西瑞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被撤销红军领导人的职务这些事，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人说毛泽东是搞“右倾机会主义”。任弼时没有对我说这件事。我在* 摘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

莫斯科学习时，也没有听王明等说过。

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寻（乌）、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二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三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当时罗明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邓小平任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经担任过江西省军区的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师长；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从实际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正确的意见，抵制“左”的做法。如主张在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应向农村发展，下赞成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诱敌深入”，然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不赞成硬挤；主张中央红军、地方部队、群众武装都应发展，互相配合，不赞成用削弱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界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下能采取同样的办法；主张健全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团体；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主张根据地的行政、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都由政府负责，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工作。结果，这些正确主张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被称为“罗明路线”。这时，张闻天已从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后回来，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作了反“罗明路线”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还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会、寻、安地区是苏区的边远地区，是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的游击区。但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却认为失掉了寻乌，是中心县委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是执行退却逃跑的防御路线的结果。毛泽东、朱德总结出来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红军最早的战略战术。后来红军和游击队的作战原则，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把它发展为十大军事原则。而反“罗明路

线”，实际上是批判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那时苏区的边远地区，完全是赤白交错对立，毛泽东曾经说过，困难的是有中间派反水的问题。因为赤白交错对立厉害，中间派中不少人反水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游击地区还有革命的“两面”政权，敌人来时可以应付一下。但当时在边区只有实行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才行。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我没有讲话，只是听反“罗明路线”的报告。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下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后几十年，我就再没有反对过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了。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批判 曹仲彬

1929年底至1930年初，邓小平在广西发动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了左右江苏区，后来，中共中央派他到中央苏区工作。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发动了反“罗明路线”斗争。邓小平因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而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撤销职务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邓小平在打击迫害面前，没有畏惧和屈服，而是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勇敢的抗争。对此，史学界尚无专论，有必要加以介绍。

一、纠正肃反中的“左”倾错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各苏区进行了镇反和肃反，这是必要的，但在执行中犯了严重扩大化的“左”倾错误，30年代初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就是错误肃反的一例。

1931年1月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为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三位革命领袖举行了大会。会上红十二军的吴拙哉等十几名指战员错喊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本来，对于这些没有文化而又缺乏国际共运知识的一般干部战士来说，是下足为奇的。但闽西党的“左”倾领导人以此为契机发动一场肃反运动，制造了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的冤案。这一运动很快波及并影响到邻近的赣西南瑞金县。当时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兼县肃反委员会主席李添富等人无中生有，断定瑞金县里存在着庞大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并要坚决肃清它，甚至下分青红皂白地把瑞金革命先行者、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原县苏维埃主席萧连彬等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当成“社会民主党”分子而加以逮捕和杀害，不少人受到株连。

邓小平到达中央苏区不久，就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先在闽西巡视，后被派往瑞金调查处理肃反问题。1931年8月邓小平来到瑞金时，县苏维埃工作停顿，干部情绪低落，群众存在不满情绪，全县笼罩着一派恐怖气氛。如邓小平所说，当年“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

不久，根据上级指示，重新组织中共瑞金县委，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此后，他深入基层和农村，听取干部和群众对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的反映和意见，调查研究那些肃反对象，特别是被杀害者的家庭、工作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情况。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果断地停止了错误的肃反运动，对那些在押人员作了细致的审查，很快把蒙受冤屈的干部和群众释放了出来。邓小平根据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经过调查，掌握了原县委书记李添富等人对这次错误肃反造成恶果的事实，果断下达命令，拘捕了制造冤假错案的李添富和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等人。

1931年9月，邓小平在瑞金锦江中学亲自主持召开了瑞金县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肃反工作、优抚工作、劳动法、组织消费合作社等议案，选举了新一届的县苏维埃领导人。公审并处决了民愤极大的李添富、谢在权。会后，又逐步建立县属以及王田、桃阳、武阳、安治、城关等单位的组织机构。特别是吸取这次肃反的教训，健全了各级司法裁判机构，对拘捕、审讯、审判等权限作了严格的规定。在县城和王田、武阳、安治等乡村召开群众大会，为肃错的干部平反。在瑞金县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推动下，“全县的局面大力改观”。

1932年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瑞金县的工作进行检查，4月4日作出《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其中指出，“革命秩序相当建立”，“在肃反问题上，一般说，对于过去的错误，如随意捕入偏信口供使用肉刑等，已有大的转变”，瑞金县“在某些工作上面有相当的进步”。这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邓小平在瑞金县纠正肃反错误的肯定和评价。

二、抵制土地革命中的“左”倾分田政策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一条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正确土地革命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土地分配政策。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推行一条错误的“左”倾土地革命路线，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对不同意见这条“左”倾土地路线的同志，便扣上“富农路线”的帽子，进行批判。

邓小平在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就曾以中央苏区为榜样，按人口为标准进行平分土地，实行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邓小平“在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作法，是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从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报告和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

为正确地开展土地革命，邓小平曾和韦拔群一起在东兰县一带，深入群众、实地考察农民土地情况。他还到韦拔群的家乡东兰县武篆镇东里屯，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研究土地革命等问题，并在此开办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亲自给大家讲述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接着，邓小平又同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等人开会讨论和研究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他向大家介绍了红四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情况和经验，阐述了土地革命对开创和建设右江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其中吸收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土地革命的经验，诸如“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以出产之多寡，平均分配之”，在分配土地时，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此后，右江的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这遭到了党的“左”倾领导者的反对。1930年8月，李立三“左”倾中央南方局，派邓拔奇等人到右江革命根据地检查工作，指责邓小平领导的土地革命是在执行“右倾富农路线”。

邓小平到中央苏区后，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和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仍坚持实行毛泽东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正确分配土地政策。他在瑞金开展土地革命期间，组织贫农团，发动农民起来没收地主土地，把没收土地分成甲、乙、丙三类，以原耕地力基础，实行好坏分匀，多少分匀的原则；并规定允许各区乡留一些好田为红军公田，收益归公，用于扶持红军和军属以及救灾等，据当时记载，邓小平在领导分田时使“雇农独立劳动者分上田，中农分中田，有的雇农分上田，贫农中农平分”，“有的地方，富农还分得好田，或三分之一的好田”。然后依“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再行调整，使土地的分配和使用趋于合理。邓小平

《红色中华》第16期，1932年4月6日。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页。

《红色中华》第16期、第30期。

还认为分配土地，往往“一次是分不好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要经过三四次以至好几次”。他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以劳力的强弱作为分配土地标准的“左”倾土地政策。

由于邓小平在瑞金等县实行了毛泽东的正确土地路线，抵制了“左”倾的错误分田政策，从而使瑞金等地土地革命顺利开展，取得了较大成就。

三、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抵制“左”倾的“城市中心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围绕着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毛泽东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不顾中国国情，生搬硬套俄国革命的经验，主张在中国走俄国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道路，结果使革命屡遭挫折。

1930年6月11日，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8月，“左”倾中央南方局派邓拔奇到右江革命根据地去贯彻其“左”倾路线与冒险计划。邓拔奇要求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中城市，配合中央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计划。9月，红七军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发生激烈争论。当时，邓小平根据红六军的实际情况，对攻打柳州等大中城市的计划，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几千人的红七军，在百色起义后，都未能守住百色，现在怎么有能力去攻打柳州等大中城市呢，这是没有把握的，也是困难的。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反对出去攻打大城市，主张坚守右江苏区。而邓拔奇及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则坚决主张贯彻中央攻打中心城市计划，并压制与打击持不同意见者，甚至以违背中央决议为名，撤销雷经天的职务，后又将其开除出党。

后来，红七军在向柳州进军途中受挫，全军上下对攻打大城市的计划产生怀疑，1931年1月3日，邓小平在全州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围绕“攻不攻打桂林”问题展开争论，邓小平提出立即放弃攻打桂林计划，遭到邓拔奇、陈豪人、龚鹤村等人的反对，却得到多数人支持。最后前委决定放弃攻打柳州、桂林，部队先在全州休整。会后邓拔奇、陈豪人等人借口向中央汇报工作，离开了部队。以后，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在桂、粤、湘三省进行艰苦转战，最后前委决定部队转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去“汇合朱毛红军”。

邓小平到达中央苏区后，对中国革命道路认识有了新的提高，更加坚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认为，在中国国情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不可能的，只有向着高山和穷乡僻壤，那里没有敌人或是敌人力量弱的地方”。他的这个思想同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一致的，同“左”倾的“城市中心论”是对立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反对当时“左”倾中央提出的攻打赣州、向中心城市发展的错误指示。认为红军应留在苏区清除威胁大的地主土围子，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以便粉碎敌人新的“围剿”。王明“左”倾中央因而指责邓小平等“打赣州的时候，他们袖手旁观的讥笑，对党的指示的工作，完

《斗争》第12期 1933年5月20日。

《斗争》第12期，1933年5月20日。

全总工”，是反对党的主张。打赣州，是当时“左”倾中央“城市中心论”的突出表现，邓小平等人能够公开大胆抵制这种错误主张，实属难能可贵。

四、反对“左”倾的“进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

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形势及其应采取的军事战略方针，“左”倾中央不顾客观实际，主观地认为是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强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然后夺取政权取得全国性胜利；在军事战略方针上，强调阵地战与正规战，主张“全面出击”、“御敌人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

邓小平由于反对和抵制这种“左”倾的进攻路线与军事战略方针，拥护与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因而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错误批判。

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邓小平认为，当时处于“革命斗争低落”时期，敌强我弱是事实，不具备“直接的革命形势”。党的任务是根据形势发展而确定的，革命“只能是土地革命”，这就否定了全国革命形势处于高潮的措误判断。邓小平进一步认为，“左”倾中央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对革命任务的规定为“进攻路线”，“是建立在群众革命斗争低落上面的理论”，是“不了解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性”。而建立在革命低落上面的所谓“进攻路线”，只能是脱离客观实际，没有坚实基础的，这必然是冒险主义的，会遭受失败的，实际上邓小平是否定了“左”倾的“进攻路线”。因此，党的“左”倾领导者指责邓小平这是“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计的悲观失望”，是“不相信群众力量”，是“对进攻路线的总工”。在军事战略方针上，邓小平主张“诱敌深入”，把敌军引到群众基础好的苏区举而歼灭之；反对把红军拉到白区去硬拼或者把敌军挡在苏区大门外进行“堡垒战”。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左”倾领导人主张打出苏区到白区作战，邓小平与毛泽覃等则主张应把红军部队调到兴国一带或河西（赣州以西）去集结。反对把队伍拉到白区硬拚。“左”倾领导者却指责邓小平等是“退却逃跑”，是“根本不相信红军有力量在白区消灭敌人”，是“单纯防御路线”。

邓小平被王明“左”倾中央扣上“右倾退却逃跑”的帽子，进行批判与打击，其主要借口就是“寻乌事件”，经过是这样的：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趁守卫在中央苏区南部红军独立三师开赴赣东北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发动建黎泰战役的机会，乘虚向中央苏区南部进犯。邓小平当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他立即召集三个县的党政军领导举行联席会议，研究对敌之策。会议经过分析讨论，决定“有计划的准备退却”，诱敌深入，以便乘机歼敌。会后邓小平便率领会寻安三县广大军民“坚壁清野”，“布置后方”，“有计划的准备退却”。结果，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寻乌县被陈济棠部所占领。这就是所谓“寻乌事件”。邓小平这些战略战术，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诱敌深入”和游击战作战原则具体体现。可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眼里，这是违背“进攻路线”的，是丢城失地的逃跑行为，罪不可赦。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后，发动反“罗明路

《斗争》第12期，1933年5月20日。

《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

《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

《斗争》第12期，1933年5月20日。

《斗争》第12期，1933年5月20日。

线”，抓住“寻乌事件”大作文章，批判邓小平在敌军大举进攻面前，“将整个寻乌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是“可耻的”“右倾退却逃跑”，后将他撤职调走，重新改组中心县委。历史证明这不是邓小平的过错，恰是他的功绩。

五、对批“江西罗明路线”的抗争

由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坚持贯彻执行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与抵制“左”倾错误领导，所以，临时中央发动反“罗明路线”运动刚开始，就被打成了“江西的罗明路线”。对此，邓小平没有屈服和畏惧，先后进行了三次英勇的抗争。

1933年2月22日，苏区《斗争》杂志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

的文亨，点名批评邓小平领导的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继之，在临时中央的压力下，中共江西省委先后发出《给会寻安三县的指示信》和《关于公布永公泰工作决议和给会寻安三县委指示信的决议》，其中也批评邓小平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这“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可是，临时中央竟然对于江西省委指示信和决议非常不满，指责省委“对于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严重的错误没有应有的批评”，是在帮助邓小平逃避责任。

接着，由苏区中央局出面在会昌筠门岭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议指责邓小平是“机会主义领导”，中心县委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并作出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认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领导下，执

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会间还对邓小平进行了批判，责令其向中央局写出《会寻安工作检查》。会后，邓小平被撤职调任省委宣传部长，改组了中心县委。

邓小平在长篇的《会寻安工作检查》中，同“左”倾路线进行了第一次抗争，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进攻路线建筑在群众革命斗争低落上面的理论”。“检查”对指责他的所谓“纯粹防御路线”解释说，“防御路线”中的“诱敌深入”等，是正确的军事原则和方针。它不是单纯地为了防御而防御，而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的积极防御。

对邓小平《会寻安工作检查》，临时中央领导大为恼火。《斗争》发表题为《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署名文章，逐条地对“检查”进行“批判”，指责它是“一大篇糊涂的哲学，用来掩盖问题的实质”，是“替自己的机会主义辩护”，这期《斗争》还发表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把邓小平等人由“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升级为“江西罗明路线”

与此同时，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也被指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毛谢古反党派别小组织”，而受到打击。为了把批“江西罗明路线”推向深入，中央局又于4月16日至22日在江西博生县，召开江西党的全省

《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

《关于公布永公泰工作决议和给会寻安三县委指示信的决议》，1933年3月12日。

《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

《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

《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

《罗明路线在江西》，《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

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名曰总结工作，实际是批判邓小平。会间，进一步把邓小平同所谓“毛谢古反党派别小组织”联系起来，指责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被统称为“邓毛谢古”，并对他们进行了更激烈的批判。诬蔑他们为“怪物”，“不相信党和群众力量，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悲观失望，对敌人大举进攻表示仓皇失措”，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是“完全与党的进攻路线相反”，等等。

在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上，邓小平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一起，进一步陈述了他们所坚持的正确路线和观点，对“左”倾路线进行了第二次抗争。

会间，“邓毛谢古”被责令先后两次提出申明书。他们在申明中，据理驳斥了对他们的一些指责。首先他们申明没有进行过“反党的小组织活动”，仅仅是私下交换过一些意见而已。邓小平说，我“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并且不承认自己“右倾”，说“反右派与他没有关系”；最后坚定地表示要“到实际工作中去”，在实践中检验谁对谁错。会议总结亦承认，“邓毛谢古”虽受到了“严重打击”，但他们并没有在思想上解除“武装”。

江西党的全省三十月工作总结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对没有屈服的“邓毛谢古”采取了新的措施，邓小平对“左”倾路线又进行了第三次抗争。5月4日，临时中央授意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声言“邓毛谢古”“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队伍”。5月5日，经中央局批准以中共江西省委的名义作出了《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说“邓毛谢古”的第二次申明书与第一次申明书的内容没有任何不同，指责“邓毛谢古”还没有根本放弃其小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等等。决议还给邓小平加上了新的“罪状”，责令要他交待所谓“在红七军所执行的立三路线，和擅自脱离红七军的行为”等问题，要“邓毛谢古”写出第三次申明书。同时对“邓毛谢古”分别作了组织处理。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此后临时中央对邓小平的所谓在红七军所执行的立三路线，和擅自脱离红七军的行为进行正式审查。对此，邓小平再次提交了书面报告，进行申辩和抗争。临时中央审查了一阵后，便不了了之地结束了审查。实际上邓小平的抗争取得了胜利。

通过以上的介绍，可见邓小平在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关键时候，能够挺身而出进行抵制和斗争，在一切压力和打击面前没有动摇和屈服，其精神难能可贵。50年后，毛泽东评价说：“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

《斗争》第12期，1933年5月20日。

《斗争》第12期，1933年5月20日。

《斗争》第12期，1933年5月20日。

《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斗争》第12期，1933年5月20日。

《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斗争》第12期，1933年5月20日。

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历史证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在苏区能勇敢地抵制王明“左”倾路线，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这正是他的功绩所在，他所表现出的可贵精神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四期）

回忆眼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的一段时光

钟亚庆

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同邓小平同志在江西中央苏区共事近一年时间。小平同志任会昌县委书记时，我担任会昌县政府军事部长。后来，我任江西省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小平同志兼任三分区政治委员。我经常向邓政委请示汇报工作。他对我亲切关怀、支持帮助的动人事迹，至今历历在目，感人至深。

1932年5月，邓小平同志从瑞金调会昌任县委书记。当时任会昌县委组织部长的罗屏汉同志告诉我，小平同志跟他在研究工作时，提出会昌是江西的重要门户，离“红都”瑞金只有四十多里，又是一个大县，有十四、五个区，没有军事部长，不能适应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他建议设立军事部，要挑选一个军事部长，便问屏汉同志：“老罗，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有无合适的人选？”屏汉同志答：“有一个，叫钟亚庆，以前在红十一军独立营当连长，后来任独立团副团长。这个人没有文化，但有作战经验，敢打敢拼。今年3月初，陈济棠部一个营进攻我寻乌车头，亚庆同志带领部队迎敌。双方激战一天，敌人死伤很多，败退了。他在战斗中左肩呷负了伤，仍然坚持不下火线，直到战斗结束后，住在寻乌西北医院，因伤口骨碎清理不净，写信给我，我才介绍他到澄江十二军后方医院去，最近来电说，他的伤势基本好了。”经屏汉同志这么一说，小平同志就把我定下来了。第二天，屏汉同志打电话给我，我不在（因为那天十二军政治部罗贵波主任派我去江城区工作，一早出发了），罗主任接了屏汉同志的电话，叫我明天十点钟不要走，他要再打电话来。果然，上午十点钟屏汉同志的电话来了，说调我到会昌县任军事部长。我回答说：“我没有文化，干不下了，我下去。”屏汉说：“小平同志已来会昌县委当书记，我在县委组织部，调你，是我们研究决定的，没有文化，有文书，不用怕”。当时，我还想在正规红军部队工作，总是不愿去。以后，小平同志又打电话批评罗贵波主任有本位思想，叫他催促我快去上任。他们先后又打了三次电话，拖至5月底，下去不行了，我只好背上背包步行到会昌夫。

碰巧，当我走到会昌杉塘区村时，突然遇到小平同志。他一见我就问：“你这个同志，从哪里来到那里去？姓什么？”声音很大。

“从澄江来，叫钟亚庆，到会昌去。”

“你叫钟亚庆，好啦，好啦！我是邓小平，走！到杉塘区府去坐坐。”

我向小平同志敬了礼，跟着他到了大河排顶上的杉塘区政府。小平同志带有批评的口吻对我说：“你好调皮，老罗（屏汉）打了好多电话给你，你还不来；我又打了电话批评罗主任（贵波），你现在才来。你看看”，他手指着墙壁上挂着的文件袋说，“你任会昌县军事部长，文件都发了。你还下来！”接着邓小平同志把话题一转，说：“你不要走了，今天我到罗塘区，你跟我去。”这里坐了大约半个钟头，我就跟着小平同志，一路步行，到了罗塘区政府。晚上，小平同志叫区委、区苏领导开会，布置了扩大红军等任务。第二天，恰逢罗塘圩日，早饭，区委领导款待我们吃猪肉。记得吃饭时，小平同志对区委书记说：“猪肉，好就好，就是少了一项。”区书问：“少什么？”小平同志直率他说：“辣子！”区书即起身去寻找，很快就抓了一把5月新番椒回来。饭后，告别了区委，出发上路。小平同志走在前，我跟

在后面，一同回到会昌县委（地点在大榕树背），小平同志又亲自派了一个同志，送我到会昌县政府（大街上的许家祠堂）。

在会昌，我在军事部经常要下到各区去组织赤卫队，凡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为基干赤卫队，其他是普通赤卫队，要分别造册向小平同志汇报；还有扩大红军等任务，都要同小平同志研究。小平同志平易近人，对我的工作总是热情指导。

7月，江西省军区指示会昌县委成立江西省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部设在箱门岭芙蓉寨。分区政委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兼任，分区政治部主任由罗屏汉兼任，分区指挥员由会昌县军事部长负责。7月中旬的一天，会昌军事部文书曾友松接了县委通讯员专程送来的委任令，对我说：“老钟，你当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的委任令送来了”，说着，给我读了委任令：命令钟亚庆同志到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任指挥员，仰即到差，努力工作，此令。江西军区司令部，我想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下去是不行的，我对老曾说：“我去，你也得跟我去。”曾友松说：“你不一定说得准。”我说，我会向小平、屏汉同志奏！第二天，我去到县委，找了屏汉同志，提出了我的要求，屏汉说：“我没有意见；但要同小平同志讲一讲，看他同意么？”我听后连即到了小平同志房间里，屏汉同志也跟着进来，我说：“小平同志，我是真的没有文化，要我去当指挥员，就要曾友松跟我去。”小平同志说：“我知道你没有文化，你要老曾跟你去，就给你，还有什么意见？”我知道他有一支曲尺手枪、一支驳壳枪，便说：“没有意见，又有点意见，我想要你一条枪。”小平同志停了一下，屏汉同志插话说：“亚庆跟着我，一向都是用惯驳壳的。”小平同志接着爽快他说：“你要，就给你，你晓得用么？”我说：“晓得慨！”小平同志转身取下壁上挂着的驳壳枪，连同枪套、近百发子弹都交给我，最后说：“现在就没有意见了吧！”我应了一声“唔”，兴奋地告别了小平同志。

第三作战分区指挥部成立后，接着组建三分区边区游击队，部队从会昌红色警卫连一百二十多人，逐步扩大，原独立团的伤兵出院后有二十多人，也参加了边区游击队，共一百四十多人，驻在会昌与福建交界的东留。不久，省军区派来参谋长吕赤水、副参谋长游瑞轩，参谋刘××（瑞金人）。吕、游二人都是从正规红军调来的，我怕领导丁了，就去找邓小平、罗屏汉同志。他们两人都鼓励我，小平同志说：“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不用怕，不要自轻，要有信心，有问题就同我讲。”小平同志给我壮了胆，便试着干了。半个多月后，福建钟少奎部一百多敌人进攻太阳桥，我接到情报后，立即叫参谋长开会，研究作战部署，参谋长的意见，当面同敌人接头打；我的意见是，部队分开两路，引诱敌人进来，然后集中人力把它消灭。但吕、游不同意。于是，我详细地分析了敌我情况和特点，敌人装备好，经过正规训练，来得凶；我们装备差，地形熟，采取诱敌深入、两路包抄的打法，比较有把握。吕、游最后同意我的意见。部队分为两路，参谋长指挥一路，我带一路，事先交代好部队，敌人不过桥，不汗火，战斗一打响，我指挥赤卫队先同敌人接上火，等敌人冲过桥来了，我们两路部队一齐开人，敌人死伤八、九个人，狼狈逃回去了。这一仗，我们缴了敌人十二支枪，自己没有伤亡。那时，我把战斗情况书面报告了小平同志，后来还亲自主找小平同志当面汇报了战况。小平同志听后鼓励我说：“你的部署、打法都对，你是从那里学来的？”我说，是屏汉同志带的。屏汉同志接着说：“亚庆打仗是有计谋的。”

同年9月，我们在福建东留又同钟少奎部几百人打了一仗。在战斗中，我又负了重伤，部队由参谋长带。我被抬到桂坑，由于出血过多。连夜又抬到会昌罗塘区，又转到粤赣军区筠门岭收容所。邓小平同志接了战报，知道我受了重伤，亲自打电话询问，再三叮嘱，要我第二天坐船到会昌去医治。我叫罗所长回电话说：由于我伤势重，一动就流血，暂时不能去，要听候几天。那时，小平同志天天都打电话来询问我的伤情。9月天气炎热，我搭了一条小船到了杉塘区，傍晚抵达会昌六祖寺医院。次日下午，邓小平、罗屏汉两同志就来医院看我，小平同志亲切地安慰我：“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毕，拿给我五十元，作营养费。

我在会昌医院一直住到1933年3月，一出医院，我就去会昌县委，见到了罗屏汉同志，却没有见到邓小平同志，心里十分失望。一转眼，五十年过去了。五十年的变化真大啊！罗屏汉同志早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邓小平同志幸还健在，正带领我们搞四化建设。每当我想起往事，想起邓小平同志对革命鞠躬尽瘁，对同志体贴入微的言行举止，心里就非常感怀。

（原载《党史文苑》1990年第6期）

邓小平在中央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余伯流

邓小平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在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长征过程中，执行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建树了卓著的历史功勋，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阐发和弘扬。

邓小平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2月到达崇义至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共战斗、工作了四年零八个月，先后担任过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红星》报主编等职务。其间，他既出色地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创造红色政权、支援革命战争的艰苦斗争，又曾遭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批判和打击；他既有非凡的政绩，出类拔革，又历尽坎坷，大起大落。这种不平凡的历史轨迹，昭现了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的一段奇特历史的光辉。

率领红七军转战江西，帮助地方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

邓小平进入江西苏区时，年仅27岁。1931年2月，他同李明瑞等率领红七军从广西艰苦转战。经桂黔湘粤边境，到达江西崇义县。

红七军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有着光荣的战斗历史。1929年6月党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代表赴南宁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同年12月11日由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起义爆发，随即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经党中央批准，红七军组织了前委，“指定小平、昭孔、云逸、龙光、伯群、云甫、世昌七人组织之，小平为书记。”红七军组建后，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开创了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秋，红六军奉命北上。此后，主力转战于桂黔湘粤边境。1931年1月红七军缩编为两个大团。在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截断，军长张云逸率领军部和五十八团转经坪石进入湖南酃县游击区，同王震等率领的湘赣独立师会合，协同作战，后抵江西永新天河休整。红七军五十五团则在邓小平、李明瑞率领下，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从乐昌河畔渡河后转经仁化，于2月抵达江西崇义。红七军历尽艰辛，转战五省，战斗百余次，终于从广西来到了江西。

邓小平等到达崇义后，一面将伤病员安置到杰坝游击区休整，一面在崇义“做了二十多天的群众工作”。主要是帮助地方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培养地方干部，发展地方武装。

“红七军来到崇义后，崇义党的组织开始恢复”。早在大革命时期，崇义党的创始人陈赞雍就和邓子恢等于1926年12月建立了崇义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陈为书记。1927年11月初，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来刊崇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1989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 99—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和七军前委的信》（1930年3月2日）。

黄雨山《红七军远征江西片断》。

袁任远《从百色到湘赣》。

黄志勇《红七军在崇义的活动》。

参见邓子恢《崇义初朗革命斗争的回忆》。

义进行游击活动，在其影响和鼓舞下，成立了中共崇义县长潭特支，隶属赣南特委。1928年2月赣南特委遭破坏，一些共产党员被迫转移到崇义山区发展党的组织。5月建立了中共崇义县委，后又遭敌人破坏。1929年11月在赣南特委代表的帮助下，重建中共崇义县委，周泰侃任书记。1930年5月县委领导茶滩、长潭暴动失败，因胡凤漳土匪武装残酷搜剿，县委遂处于分散隐蔽状态。

邓小平等率部在崇义开展群众工作后，很快拓开了新的局面，崇义党的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3月，县委即从长潭迁至金坑圩，成立了崇义县革命委员会，陈文盛为委员长。5月，在过埠召开了中共崇义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公开成立了中共崇义县委，黄维汉任书记，隶属中共上犹中心县委，下属组织有长潭、过埠、思顺三个区委和二十多个支部。在县委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崇义县苏维埃政府，朱以农为主席，领导崇义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在帮助地方恢复和重建党政机构的同时，红七军政治部还为崇义、上犹两县地方党培养干部。在崇义长潭举办了一期“地方党团训练班”，参加训练的有二三十人，大都为党团员，也有一些进步青年。训练班共举办两个星期。红七军政治部选派干部到训练班工作，许卓担任训练班主任，据有的老同志回忆，“邓小平同志还给我们讲过课，主要讲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共产主义ABC等内容”。训练班除了上政治课外，还进行军事训练。训练班结束后，学员回到地方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成为崇义县土地革命时期的一批骨干力量。红七军离开崇义时，还留下林材等一些军队干部继续帮助地方开展工作。

红七军在崇义时，还积极帮助地方发展武装力量。3月间就将原在崇义上犹边境活动的一支小游击队改编为红色独立营，周泰侃任营长兼政治指导员，古达培为副营长。6月独立营扩编为游击大队，翌年5月又扩编为崇义独立团，李从为团长，欧阳兴为政委。独立团成立后，大力开展游击活动，崇义的扬眉寺、文英以及汝城的集尤、桂东的沙田等地都成了独立团出没的红色游击区域。

在红七军广泛开展革命活动的时候，邓小平根据红七军前委的决定，取得李明瑞、许卓的赞同，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邓小平把在崇义的工作安排好后，向许卓作了交待，“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临走前，“他带几个同志到杰坝与赣南特委开会，研究开展地方工作的问题，同时慰劳红七军的伤病员，随后，即去中央。”“小平同志走后，由余惠同志任书记，成员有许卓、李明瑞、袁任远、张翼，我们把它叫作小前委。”小平同志从崇义到达上海后，“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1931年3月下旬，红七军的五十五团与五十八团在江西水新天河会合。

参见邓子恢《崇义初期革命斗争的回忆》。

参见中共崇义县委组织史办公室编《崇义县组织史资料》。

参见《崇义县组织史资料》。

参见《崇义县组织史资料》。

邓小平《我的自述》。

邓小平《我的自述》。

邓小平《我的自述》。

后根据中央决定，调往中央根据地，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中的一支劲旅。

纠正瑞金肃“社会民主党”错误，开展地方政权建设

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后，于1931年8月间回到江西瑞金，同邓小平一起到达瑞金的，还有金维映、余泽鸿等同志。抵瑞金后，邓小平一行与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会台，当时大家商议一致推选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邓小平刚一上任，就“碰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瑞金当时正在进行‘肃反’运动，这是一种定期折磨着秘密革命运动的清洗”。瑞金的“肃反”不是肃“AB团”，而是肃“社会民主党”。这是从闽西苏区刮过来的一股黑风。由于党内长期存在的浓厚的“左”倾错误的影响，一些把持肃反大权的“左”倾分子，在闽西开展了一场无中生有的肃“社会民主党”的运动，数千名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中的领导干部以及群众被无辜抓捕、杀害，酿成了一场完全错误的肃反悲剧，给闽西苏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1931年5月，这场“肃反”运动波及瑞金。瑞金“肃反”的领导者，是瑞金县委书记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添富。

“瑞金肃反首先从县、区两级开始。开始时规模很大，也很严格。县委首先召开了一次全县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党小组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会后，就将县苏维埃政府和县总工会两个单位80%的干部抓起来了。这些被抓的干部，下到10天的时间内，绝大部分都作为‘社会民主党’分子而处决了。”连瑞金革命先行者、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主席萧连彬等重要领导干部亦被杀害。接着，宣布解散这两个单位，重新选举产生县苏维埃和县总工会。“新成立的县苏维埃政府不到半个月，大部分工作干部又被肃反委员会抓了起来”。“以后，肃反就转移到区一级，以桃阳区、城关区为重点，结果这两个区全体干部被抓了起来，乡苏主席、区委书记也被扣留了”。“这样一来，几乎大无都有人被枪决，有时一天枪决五六十人，少也有一二十人。”“枪决人时宣布的罪状很简单，只写个姓名、年龄、哪里人，没有什么事实，审讯时完全是用肉刑、逼供。”总之，“邓小平接任瑞金县委书记时，到底有多少人等待枪决，尚无可靠的估计数字。不过，极可能有数百名之多。”

邓小平“让这场政治迫害停了下来”。当时正值红军反击蒋介石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所致，瑞金全县处于一片惊惶恐怖之中，“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邓小平于8月就任后，以果敢的气魄和敏锐的洞察力，一面深入实际了解于群被杀真相，一面采取措施稳定事态。他除了自己亲自调查、巡视外，还派了五六名得力干部组成调查组，“由阿金（即金维映）带队”，“深入到各区。乡去

邓小平《我的自述》。

《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

杨世珠《瑞金纠正肃反和查田运动的回忆》。

《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

《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

《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

邓小平《我的自述》。

调查了解情况，问群众对肃反有什么意见，现在这样搞肃反对不对”，接着，召开全县活动分子和县区乡主要干部会议，“讨论过去肃反中的偏差”。

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在掌握了李添富等人的大量错误事实后，邓小平始下决心，下令拘捕了民愤极大的李添富等人，释放了大批在押的干部群众，制止了乱捕滥杀的错误行为。随即于9月底在锦江中学主持召开了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内容是选举苏维埃主席，健全县苏维埃机构，组织支援革命战争，纠正肃反偏差，公审李添富。”这次大会是瑞金全县形势从人心惶恐、动荡不安的危局转向秩序井然、稳定发展的枢纽。大会选举了黄正为县苏维埃主席，并选出了出席全苏“一大”的代表，公审并严厉处置了李添富等人，为蒙受冤屈的一大批干部群众平了反。广大于群喜逐颜开，“全旦局面大力改观”（小平同志语）。苏区干部群众纷纷称赞：“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如果不是他来了，瑞金还不知要杀害多少革命同志！”

邓小平主持纠正瑞金“肃反”错误的做法，得到了谢唯俊和瑞金党内领导人的支持，同年12月“来到苏区的周恩来也支持这种做法”。1932年3月，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在检查瑞金工作时，充分肯定了邓小平主政后纠正肃反“社会民主党”错误的工作成绩，并在《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中认为：“在肃反问题上，一般说，对于过去的错误，如随意捕人偏信口供使用肉刑等，已有大的转变，……革命秩序相当建立。”

邓小平在果断、迅速地纠正瑞金肃反“社会民主党”错误的同时，又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地方政权建设工作。一是深入开展土地革命。邓小平就任时，正值瑞金第二次分田。他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发现有的村采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做法，把该村的20多户地主、富农的地全部没收了。针对这种“左”倾土地政策，邓小平向广大干群耐心地做工作，讲述“要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道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左”的分田做法，但后来却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瑞金各地苏维埃对于土地政纲执行得不坚决”等等。二是发展农业生产。他和县苏干部一道，大力组织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队，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恢复和发展土特产品生产，开展对外贸易，建立消费、粮食合作社，组织生产竞赛等。三是大力培训干部。为了解决“肃反”后干部奇缺的问题，邓小平于9、10月间在县城同善社举办了一期干部培训班，有60多人参加学习，小平同志亲自讲课。通过培训，造就了如胡荣佳等一批优秀干部，为苏维埃的政权建设输送了人才。四是严于律己，带头节粮。当时正处于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期，粮食极度紧张，邓小平领导全县人民开展群众性节省运动，号召苏维埃干部节衣缩食，支援前方，并带头身体力行，每月最少节省8斤口粮。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从不搞特殊化，与群众同甘共苦。有一次，金维映因病吃

杨世珠《瑞金纠正肃反和查田运动的回忆》。

杨世珠《瑞金纠正肃反和查田运动的回忆》。

中共瑞金县委组织史办公室编《瑞金县组织史资料》。

邹书春《邓小平在苏区瑞金》。

《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

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载《红色中华》第16期，1932年4月6日。

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载《红色中华》第16期，1932年4月6日。

不下饭，到南门岗买了点粉干来吃，邓小平知道后，严厉地将她批评了一顿，责成她做书面检查。他说：你不能因为我是县委书记，就可以搞特殊化，不行啊，同志！在邓小平的影响下，瑞金苏区的干部自觉地保持了清正廉洁的好作风。

1932年5月15日至19日，在中央政府直接指导下，邓小平等领导召开了瑞金县苏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政治报告和县苏的工作报告，检阅了扩红问题、财经问题、整顿赤卫军问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学习问题等。这次大会“大受群众的拥护”，“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大会之后，“瑞金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将进一步的巩固，将成为强有力的苏维埃政府”。——

开拓会、寻、安三县边区，建立巩固的红色区域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不到一年。1932年5月下旬，因原会昌县委书记古柏调江西省苏裁判部工作，邓小平调任会昌县委书记，任职一个多月。

1932年6月，根据苏区中央局关于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党的紧急任务决议的精神，中共江西省委决定建立会昌中心县委（亦称会寻安中心县委），以加强对中央苏区南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领导。7月，在会昌筠门岭倒水湾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兼任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县委机关设在会昌筠门岭笃下。会昌中心县委上属江西省委（省委书记李富春）领导，下辖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委。

会、寻、安的工作环境比较艰苦、险恶，正如后来小平同志回忆所说的：“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枝很少，由于‘左’倾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也很困难。”面对这种困境，年仅28岁的三县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肩负重任，意志坚定地开拓和创造三县边区的新局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政绩。

——迅速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会、寻、安地外边陲，没有一定力量的地方武装，是很难立足和巩固三县红色政权的。邓小平一上任就狠抓地方武装建设，仅7、8、9三个月内，会、寻、安三县地方武装就发展到13568人。其中，会昌游击支队390人，赤卫军4970人，模范师2529人；寻乌游击队721人，模范营1239人；模范小队635人；安远赤卫军2267人，模范小队520人，工人赤卫军35人，游击队262人。在发展武装力量的同时，邓小平和中心县委还率领地方武装攻击三县靖卫团匪、土围数十次，毙敌100余人，俘敌200余人，缴枪350余支。1931年11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县委书记、县苏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议，根据“寻乌失守”的情况，部署新的军事行动和扩大武装等问题，是年冬，邓小平、罗屏汉（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亲率地方武装配合红军独立三师，攻打闽赣边的乌鸦泊、官丰、膳坑等地，消灭了细八哥、郭发贵、大头五等反动靖匪武装大部，恢复和建立了当地的革命政权，打通了会昌与武北的联系。

邹书春《邓小平在苏区瑞金》。

中共会昌县委组织史办公室编《会昌县组织史资料》。

中共会昌县委组织史办公室编《会昌县组织史资料》。

邓小平《我的自述》。

《中央苏区会昌县两个月冲锋工作报告》，1932年12月21日。

——狠抓党的建设，纠正党包办苏维埃的倾向。在发展党的组织方面，针对过去“拉夫式的拉老头子老实人”入党，以至“党内充满老年暮气”的状况，“注意发展工人雇农苦力”入党。据1932年7、8、9三十月统计，会昌发展党员1638人，寻乌发展476人，安远发展590人；在党的生活方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和《新党员训练大纲》，教育和改造党的基层组织，“全县的支部和区委都改造了”，取得“相当的成绩”，尤其是“相当的发展了党内的思想斗争、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党的作风方面，开始注意到“党对苏维埃领导很少建立正确的党回作用的领导”，“党包办苏维埃的现象，虽有了不少的纠正，但仍然在许多区乡苏维埃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和思索，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予以纠正。——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自邓小平主持会、寻、安三县工作后，“土地斗争较前深入了。许多的贫苦农民能起来参加分田与打土豪，现全县的土地正在进行重新分配”。发动群众的工作，“有相当发展和深入”，“各乡都组织了调查土地委员会与分田委员会”。在分田过程中，曾出现“拿富农也乱打，甚至打到中农贫农身上去”的现象，邓小平和中心县委都及时地进行教育和防范，使三县的土地斗争得以健康地进行，大都在1932年底顺利完成。

——扩红，优抚军属，推销公债。在扩红突击运动中，邓小平坚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强调党团员、干部带头。反对强迫命令和欺骗、贿赂等行为。为此，会、寻、安三县的工会、少共和妇女等群众团体组织了宣传队、游艺团、“提灯”大会等，动员青壮男子参军参战。仅会昌一县，1932年7—12月就扩大红军784人。邓小平还亲自带领县委干部走访红军家属，解决实际困难，各区乡普遍组织了耕田队，帮助军属发展生产。会、寻、安三县还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掀起了推销革命战争公质的热潮，并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第一、二期公债共推销20万元，仅会昌县就超额8000元。在完成推销公债任务后，三县工人又开展了退还认购公债票活动，自愿无偿支援革命战争。

——健全群众组织，实行赤色戒严，邓小平时边区三县的群众团体工作也很重视，“改进和健全”了工会组织，指导订立劳动合同，维护工人的经济权益；“重新整理”了反帝拥苏同盟；发动妇女“争取特殊利益的斗争”；组织赤少队站岗放哨，实行赤色戒严，会昌一县当时就有39个步哨，49个查路票站。

——推行干部礼拜六义务劳动制度。“邓小平带领大家到桥东劳动，大家唱着歌：‘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各做半天工。……’”

由于邓小平的倡导，三县苏区干部体察民情，密切联系群众，蔚然成风。

正当邓小平领导会、寻、安中心县委沿着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放手大干的时候，“左”倾阴霾再次笼罩中央苏区上空。1933年1月党中央“左”倾领导者博古等人进入瑞金首府，立足刚稳，就大张旗鼓地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2月开始反福建的“罗明路线”，3月就反江西的“罗明路线”。于是，邓小平等人始遭厄运。

《中央苏区各县革命竞赛工作报告之七——会昌县委七八九三个月报告》（1933年2月8日）。

《中央苏区各县革命竞赛工作报告之七——会昌县委七八九三个月报告》（1933年2月8日）。

《中央苏区——会昌县委十月十一月两月的工作报告》，1933年12月3日。

刘质彬《回忆会寻安中心县委和粤赣军区的一些情况》。

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抵制王明“左”倾错误

从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邓小平在会昌担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九个月后，被调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长。在这段任职期间内，邓小平始终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致被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同遭厄运的还有担任江西省苏、地方和军队重要领导工作的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同志。

毛泽东同志在1972年曾说过：“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实践证明，中央苏区开展的反对邓、毛、谢、古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是一场由“左”倾领导者发动、矛头直指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错误的党内斗争。

邓小平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就对王明等人上台感到“震动”，表示“不信任”；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则针对“左”倾领导者攻击毛泽东领导的苏区“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大声疾呼：“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讥讽“左”倾教条主义者只是一伙“洋房子先生”，根本不懂得苏区的实际斗争。邓小平等人同“左”倾领导者之间的原则分歧主要是，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左”倾领导者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大道”，邓小平等人则主张向“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发展苏维埃，肃清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左”倾领导者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邓小平等人则坚持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按人口均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解决土地问题；在作战原则上，“左”倾领导青大反“游击主义”，主张脱离根据地到白区作战，邓小平等人则坚持毛泽东倡导的“诱敌深入”的方针，伺机歼灭敌人；在扩红、征粮、推销公债等工作中，“左”倾领导者无视苏区的人力、物力状况，提出了“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等许多不切实际的指令性要求，邓小平等人则认为应考虑边区的实际，不宜提出过高指标，党也不要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等等。

邓、毛、谢、古的上述正确意见，都与党中央某些“左”倾领导人的主张大为相悖。这种分歧的实质，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尖锐对立。但由于“左”倾领导人慑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不敢轻举妄动，便“指桑骂槐”，大反所谓“罗明路线”。这其中的底蕴，正如李维汉（罗迈）后来回忆所言：“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李维汉的评论，非常清楚他说明了“左”倾领导人反“罗明路线”的用心所在。

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大体经历了三十回合：第一个回合。苏区中央局于1933年3月下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批判“纯粹防御路线”，揭开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会前，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三期就发表了《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同时“严厉批评”了江西省委。3月31日，在中央局代表的直接控制下，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

《为党的进攻路线而斗争》，载《斗争》第12期。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

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会议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会后，邓小平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

第二个回合。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江西省委于4月16日至20日召开了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会议指责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厉要求将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面对中央局“左”倾领导人的淫威，邓小平等人正气凛然，毫不妥协，以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磊落态度，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当“左”倾领导人胁迫邓小平作“深刻检查”时，邓小平坚定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写的都是真话”，说完“把腰一挺，不再作进一步的检查”，“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于是，“左”倾领导人便采取组织手段，对邓小平等人实行了错误的处置。5月5日，经苏区中央局批准，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责他们“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强行撤销了邓、毛、谢、古的领导职务，将他们调往县区基层担任巡视员和突击队的工作。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令“回到省委”，说乐安是白区，“怕出问题”。下久，又调到总政治部“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又降为总政治部宣传干事，兼主编总政《红星》报。

第三十回合。9月27日至10月3日召开的江西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把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从党内扩展到苏维埃机关。会议要求党的火力“要向着两面派和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肃清罗明路线残余”。此后，在中央局的督促下，江西苏维埃政权系统深入开展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红色中华》、《斗争》等报刊也发表文章鼓动，直到1934年4、5月间敌人大举进攻根据地中心区域时，才被迫停止。

历时一年有余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给江西苏区的党和苏维埃政权造成严重的危害，以邓小平为首的一大批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优秀干部遭到错误的打击，江西省委、省苏亦受到错误的指责，会、寻、安等许多中心县委，县委被“改造”撤换，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是令人痛心和难以挽回的。

邓小平在这场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他虽然遭受到错误的打击和不公正的处分，但仍然对党襟怀坦荡，忠心耿耿，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在政治原则问题上，他不惧“左”倾领导的淫威，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从分配，党叫于什么就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在实际工作中，他依然实事求是，忠于职守，从不敷衍塞责。从1934年6月到10月，身处逆境的邓小平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在总政主编《红星》报，采编、选稿、校对、刻印

《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1933年3月31日）。

《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的总结》，载《斗争》第12期。

《五次“围剿”决战前面江西省的代表大会》，载《斗争》第31期。

等工作，大都一人承担，费尽心血。《红星》报办得丰富多采，生动活泼，发行量达 17300 份，深受广大红军战士的喜爱，被红军战士称之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支有力喇叭”，对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一十共产党人的坚毅顽强的性格和豁达博大的胸怀，体现了把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崇高品质。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邓小平是在乌云压顶的情况下开始长征的”，时年 30 岁，仍为《红星》报主编。到 1934 年 12 月中旬，在党中央召开的黎平会议上，邓小平接替邓颖超，担任党中央秘书长，随后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坚决拥护毛泽东出山主政。

历史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四年多的政治生涯，是一篇光辉而曲折的诗章。中央苏区时期的邓小平，不愧为中国共产党人为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夺取政权道路集体奋斗中的坚强领导，不愧为党内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杰出代表，不愧为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优秀典范。

（原载《争鸣》1990 年第一期）

1961—1992：邓小平在江西

邓小平在庐山

尹超海

俊伟诡奇、峰峦迤迤的庐山，不仅是驰名中外的旅游、疗养、避暑的天都，也是中国五光十色的政治舞台。

1961年的金色秋天，在中国经济形势严峻的危难时刻，邓小平在这里留下了世人瞩目的闪光足迹……

毛泽东、周恩来三顾茅庐请“诸葛”邓小平临危受命赴庐山

三年自然灾害和“反右倾”所带来的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使毛泽东主席深为忧虑，终于深有感触他说：“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在1961年的8月23日至9月16日召开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

会前，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曾“三顾茅庐”，决定把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这位棉里藏针的智多星请上庐山。

8月底的一天，两辆伏尔加牌轿车徐徐驶进庐疗总院267号小别墅的庭院。车门打开，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走了出来。他的夫人兼机要秘书卓琳和女儿邓楠从后一辆小轿车里走了出来。

当时担任庐山管理局局长的楼绍明带领会议第七接待服务组的同志，早已等候在这里。

楼局长上前紧握着邓小平的手，欢迎他说：“首长一路风尘仆仆，辛苦了。”

“哪里哪里，我们给同志们添麻烦来了。”

楼局长向卓琳介绍了工作人员的姓名、职务。卓琳同志与他们一一亲切握手。

邓小平询问“这房子原来是谁的，现在作什么用？”

楼绍明答道：“这房子原来是外国人的别墅，解放后都收归政府所有。现在作者干部休养的别墅。”

邓小平爽朗地笑了一下，风趣他说：“那好嘛，我们既来开会，也在这里休养休养。”

邓小平停了一下，又问：“这山上与九江相差多少温度？”

“相差10来度。”杨基友回答。

“怪不得，这里是驰名中外避暑的好地方。工作忙，我晚来了四五天。”小平赞扬说。

楼绍明说：“听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北京三顾茅庐请你这位‘诸葛亮’，来晚了几天，就晚回去几天吧。”

邓小平谦逊他说：“那是毛主席、周总理过奖了。我这段时间一直忙着主持审查、修改三个文件，来晚了……”

楼绍明向邓小平、卓琳介绍庐山的气候和周围的景点、建筑，当介绍到对面是牯牛峰，南边是掷笔峰，八届八中庐山会议会址就在那里时，卓琳这位文静、和善、常露笑容的夫人，蓦然感到有股习习的凉风吹来，脸上失去了刚才怡然的神色和笑容。她仿佛感到两年前那次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硝烟辽多少有点在空中飘弋。那次庐山会议，邓小平留在北京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没有卷入这场历史性的悲剧中。

杨基友以为卓琳累了，招呼说：“首长路上辛苦了，进屋先洗洗吧，马

上用餐。”

楼绍明和女服务员把邓小平、卓琳、邓楠让进小别墅。

毛泽东授意小平抓经济总书记语重心长为补台

邓小平、卓琳、邓楠三人吃完饭，走进卧室，女服务员为他们泡好了庐山云雾茶。不一会，会议秘书处送来了中央工作会议日程表和有关文件。

卓琳收好文件后，叫邓楠到外间和服务员去玩，然后轻轻关上门，在邓小平旁边沙发上坐下来，若有所思地问：“老邓，我有些心里话，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

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卓琳的内心思想，直率他说：“你不问，我也知道你要对我讲什么，你是心有余悸，怕我这个邓老总走彭老总的老路，戴帽子挨批，是不是？”

卓琳关切他说：“前车可鉴。五九年那次庐山会议，张闻天没有听夫人刘英的劝告，他搞外交工作却在会上大谈经济工作，讲了真话，结果挨了批判。彭老总等人也戴上了右倾的帽子。这一次，你讲话也不要太直率了，别也戴上帽子回北京。”

邓小平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一口地道的四川口音，风趣盎然他说：“那一次，听说有的人口袋里装着两篇讲话稿来庐山，一篇准备在彭德怀得势时用，一篇准备在毛主席得胜时用。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的人。共产党人就是要讲真话，我该说的还要说，大跃进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

卓琳心怔了一下，扶正一下眼镜：“情况虽然完全是这样的，但你在会上不要说得那么重嘛。”

邓小平认真其事他说，“正因为问题严重，所以说重一些，好引起全党的重视。不过，我是真诚地为毛主席补台，而下是拆台。”

卓琳知道邓小平直率，真诚，刚中有柔，毛主席是相信他的，也就没有多劝了，只是不无担忧他说：“你看着行事吧。”

庐山会议会址原称庐山大礼堂，建于1934年，是庐山解放前三大建筑之一，解放后更名为庐山人民剧院。1959年，党中央在这里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因而得名庐山会议会址。这座宏伟的建筑，室内富丽堂皇，外观充分体现出中西合璧的特色，背倚葱葱青峰，旁临潺潺溪流，前面是一块开阔的停车场。

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就定在这里举行，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场设在会址二楼的大厅里，桌子是从山上的中小学借来的课桌，铺上白布，坐席是从各单位借来的藤椅，整个会场显得朴素、庄重。

会议的前排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坐，毛泽东主席坐在中间的高靠背藤椅上，左边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右边是陈云、邓小平，后面的几排分别坐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

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问题，重点是讨论研究了工业问题。9月5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他既实事求是摆问题，又切实地、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9月15日，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讨论，中共中央批准和通过了由邓小平等主持修改定稿的《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9月16日，中共中央又批准和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修改定稿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这三个纲领性文件是我党在工业方面开始调整的重要转折和使建国后高教工作的经验得到初步规范化、条理化的标志，对于当时全党战

胜自然灾害，迅速扭转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指导今后的工业、高教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邓小平对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

受灾害三年减产，民以食为天困扰中央领导总书记当机立断，粮食指标不能退过黄河

会议期间的一天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间，邓小平忙着开会还未回来，生活管理员杨基友趁这个时机征求卓琳的意见，打听邓小平喜欢吃什么菜，准备第二天早晨派人去拿。卓琳满脸笑容地报了豆角、茄子、葫子、青菜、辣椒和一点瘦肉之类的菜名。

杨基友有点不高兴他说：“卓大姐，首长工作很忙，你报的多数是素菜名单，营养跟不上，我们当生活管理员的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厨师在一旁也附和说：“是呀，那白菜叶子有点发黄了，首长也不让我们扔掉，用开水泡泡，放一点盐、辣椒和味精，就咽稀饭，我也快成了做斋饭斋菜的厨师了。”

卓琳笑着耐心解释说，“你们爱护首长的心意我很理解，我比你们更了解首长，这些菜都是首长最喜欢吃的菜，而且是很有营养的菜。”

伏尔加轿车在踪陇的月色下驶进庭院，已经夜晚八点钟了，邓小平从会场回来了。邓楠已经为父母盛好饭。邓小平端起碗就吃，打趣他说：“会开晚了，肚子里闹革命了，这饭菜吃起来好香。”

卓琳给小平碗里夹菜，微嗔他说：“你说好香，刚才管理员和厨师还提我的意见，说素菜多了，营养跟不上，弄坏了首长的身体，他们负不起责任。”

邓小平感激他说：“群众真好啊，他们吃不饱肚子，还惦记着我们。”

这时窗外浓荫复盖的松林里，秋蝉在噪鸣，连受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卓琳忧虑不安地问：“老邓，会议还没有讨论粮食问题吗？”

小平回答：“快啦，讨论完工业问题就讨论粮自问题……”

卓琳关切地望着邓小平，意味深长他说：“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你作为党的总书记，要多为党和毛主席分忧，为六亿五千万人民作主，把粮食问题解决好。”

邓小平推心置腹他说：“毛泽东主席在我们未来庐山前，就同周总理、陈云同志和我谈到粮食问题，明确肯定了陈云同志提出先安排好市场的意见，要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大问题。吃完饭，我就起草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提纲。”

邓小平草草地吃完了晚餐，立即走进办公室，挑灯伏案，用铅笔在纸上疾书一份“粮食指标只能退到长江，不能退过黄河”的发言提纲。还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一系列措施。

手表的时针指到深夜一点钟，邓小平写完了发言提纲，感到有一点疲倦，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便走到洗澡间美美地洗了一个热水澡。

卓琳已经为邓小平准备了速可眠。他吞服了两片。不到半个小时，经过一天紧张工作的邓小平，进入了酣畅的梦乡。

能工作会休息“四不三爱”传为美谈打麻将吃夜宵李、陶、罗、柯互不相让

邓小平在庐山工作会议期间，生活上有“四不”和“三爱”的显著特点。“四不”，即：不喝酒，不跳舞，不吃甜食，不抽烟。有一次，会议分配给他两条内部供应的熊猫牌香烟，他说他不抽烟，让卓琳把香烟原封不动地退

了回去。“三爱”，即：爱看书，看一些马克思、列宁著作，中国历史经典书籍和中外文学名著；爱吃辣椒，连汤里也不错过放辣椒；爱打麻将。

这是9月15日的夜晚，会议主要议程都基本完成，接近尾声，参加工作会议的中央及各省领导都挤出时间娱乐。邓小平酷爱打麻将、玩桥牌，早就派卓琳和邓楠通知李富春、陶铸、罗瑞卿、柯庆施四个老朋友，晚饭后到267号别墅“摸砖”。

刚吃完饭，住在250号别墅的李富春就早早地来到267号别墅。接着，陶铸、罗瑞卿紧随而来，柯庆施住在110号别墅，比较远，就来晚了一点。卓琳乐得招前呼后：“李大哥、陶大哥、罗大哥、柯大哥，请进，请进。”——被请进会客室。

邓小平早已端坐在麻将桌的席位上，幽默他说：“打麻将，我可不讲啥子客气罗。麻将能使人思想敏锐。你们四个人，富春、陶铸、瑞卿先到有奖，先上桌打，庆施晚来一点，要罚，坐在旁边看。”

几句话引得大家哈哈直笑。

为人厚道的李富春，与邓小平结有厚谊，便说：“这次工作会议时间好紧张，也开得很成功，小平作了不少努力，三个文件一致通过，该奖该奖。”

邓小平谦虚他说：“你和薄一波也出了很大的力嘛，怎么光说我老邓一人呢。”

陶铸也评价说：“这次会的确安排很紧，解决了不少重大问题，现在该放松放松一下。”

颇有大将风度的罗瑞卿马上接上说：“要说紧张，台湾的蒋介石比我们更紧张。我们开会的第二天，他们就知道了，说中共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首脑会议，准备解放台湾，要捣掉他的老窝。你们说蒋介石紧张不紧张？”

柯庆施会抓辫子，说：“我们在这里开会，台湾怎么知道的，一定泄了密。你这个公安部长有责任啊，所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经常抓……”

邓小平不以为然他说，“我看现在不要抓那么多，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蒋介石让他紧张紧张一下也有好处嘛，其实，他并不知道我们会议的内容。现在开始打麻将！”

后来查实，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工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张国华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没有按时报到，会议打长途电话催他来庐山参加会议，下不慎泄漏了消息，后来，这次工作会议保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未作任何公开报道。台湾当局如惊弓之鸟，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

打了几圈以后，李富春打输了，柯庆施接上去打。牌桌上，邓小平常常是稳坐“钓鱼台”，稳操胜券不下“疆场”。

卓琳不爱打牌，却爱观看，为胜者助威称快，为输者鼓励打气，使得整个牌桌气氛非常活跃，卓琳总是笑容满面，和女儿邓楠热情为小平的老朋友沏茶、削水果，提供后勤服务。

夜深人静，猫头鹰在窗外的树林里啼叫，卓琳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深夜11点钟了。他征求意见他说：“我到厨房叫厨师给你们准备点夜宵。”

罗瑞卿直爽说：“我肚子是有点饿了，卓琳，你给我们准备什么好吃的？”卓琳笑着回答：“每人一碗简单的面条，你和柯大哥，个子大，食量大，另烧一小碗红烧肉。”

何庆施爱吃甜食，便提出：“我和罗大哥得到你的优惠，太好了，不过，红烧肉里加点糖。”

邓小平一边仔细观看桌面上打出的牌，一边开玩笑他说：“你们看，我的夫人讨好起公安部长和上海市长来了，把我这个四川人和两个湖南人（李宫春和陶铸）抛在一边，我面里什么也不要，但要放辣椒。”小平幽默的话语，又引起一阵爽朗笑声。

庐山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生活作风上，廉洁奉公。他睡的床上用品，如枕巾、毛巾毯等，都是要卓琳从北京自家带来的，从不动用会议的公用品。三人吃的水果，或请人洗衣服，卓琳均如数付钱，尽量减轻会议的开支负担。9月17日，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就要警卫人员向第七接待服务组按标准实缴了三人的全部伙食费，然后与服务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后才离开。

（原载《涉世之初》1992年第5期）

在江西的日子里

毛毛

十年动乱的历史，不会再重复了。回想往事，使人辛酸，使人激奋，也从思考中得到力量。

人们不会忘记林彪反革命集团那罪恶的“一号通令”。我的父亲，自从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这时他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当时我们这一家人已被“文革”的狂流冲得漂零四散。哥哥被迫害致残，其余的兄弟姐妹都已下乡接受“改造”，只有我的祖母（父亲的继母）一人留在北京。所以我的父母仅带上祖母，三人于1969年10月20日乘一架专门押送他们的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越被“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冲击得遍体鳞伤的半个中国，直到江西。由于长期关押，他们对外面的政治形势发展所知无几，对这“一号通令”究竟是怎么回事尚不清楚。但能脱离在北京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能重新与家人相见，无疑是令人高兴的。

到了江西省会南昌之后，三位老人先被带到一个招待所。一位省军区的“负责人”对他们训了一次话，叫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之类。几天后，他们就被送到了以后一直居住了三年多的地方。那是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里面，从南昌坐二十分钟汽车到望城岗，从步校大门进去，是一条梧桐夹道的沙石马路，绕过原步校办公大楼，沿着一条红壤夹杂着石子的小路走上一个小丘，即可看到一围比人还高的绿色冬青环绕而成的院墙。冬青之内还有一圈竹篱。圆形院子的正中是一座两层红砖小楼，原为步校校长所住。楼前四株月桂，楼后有一小小的柴房。楼上是两间卧房和一间起居室，楼下有厨房、饭厅。另外几间则由派来监管的人员居住。这个步校在“文革”中早已解散，现在偌大一个校园空无人用，十分冷落。原来的校舍、课室都已残损不全，风雨来时，常可听到门窗撞击的响声。每当夜阑人寂之时，远远望去，空旷的校园内只有小丘顶上老人居住的小楼灯光闪烁。

三位老人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他们互相体贴、照料，争着做家务活。三人中的壮劳力是时年六十五岁的父亲，所以那些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工作，自然由他来做。母亲身体不好，血压的高压常在二百左右，但她下顾头晕病痛，抢着做最累最脏的活。母亲时常犯病，卧床不起。每当此时，父亲总是力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三位老人年龄相加已有二百余岁，他们相互之间体贴、爱护、患难与共的情景，令人感动。我的祖母是四川嘉陵江上一个船工的女儿。解放前兵荒马乱的生活，磨练了她那坚强的性格。解放后，她一个接一个地带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操劳。“文革”以后，她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起被扫地出门，从家里撵了出来。她毅然担起全家在逆境中求生存的重担。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她受尽了屈辱、歧视，但她坚强镇定，不畏艰难，成为我们几个孩子生活的中心。到江西之后，她更是做饭、洗衣，努力替我父母分担忧愁。她一字不识，但一辈子生活际遇的坎坷，使她养成了深明大义、明理豁达的性格。在那几年中，她能和父母一样地保持那种平和远视的乐观气质，使这个新家格外得到了镇定与生气。

生活刚刚安顿下来，冬天已然来临。南方的冬季，又无防寒设备，冷起来室内常常结冰。母亲的体身体愈加不好了，甚至整日卧床不起。这是一个多

么难过的寒冷阴暗的冬天！但三位老人齐心努力，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为了对付寒冷，父亲居然每日用冷水擦身。我想，只有精神上不畏寒冷的人，才能战胜严寒。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严冬已过。一阵绵绵不断、下得人心烦意乱的春雨过后，南方的春天一下子就来了！青草从红土中刚刚钻出，瞬间便连成了一片。那满山的山桃花也都蕾绽花开。从窗中望去，在起伏的山丘上，一团团、一片片，如云如烟。梧桐新叶初发，很快便浓荫遮路。雪白的桅子花沿路皆是，馨香四溢。政治的风暴可以扫荡人们的生活，可以冲击人们的心灵，但挡不住自然界这一片盎然春意。春光不可负，春时不能误。在我们的小院子里，三位老人乘着春雨浸润的土地，拓出了一片下小的菜地，种上了白菜、胡豆、辣椒、丝瓜、苦瓜等各色菜蔬。自有了这一片菜地，父亲每日总要抓紧时间入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常常干得大汗淋漓。随之而来的是江西素有火炉之称的盛夏，真是烈日炎炎，酷热难当，但在三位老人的精心耕耘下，在砂石地上开出的菜园竟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使人采之不尽。在楼房后面，祖母还养了几只鸡。这几只小小的生灵似乎特别招人喜爱、善解人意。父亲在院中散步时，它们常常结队而行，跟在人后咕咕作声，使小院里增加了不少的生机。那时因“走资派”的罪名，父母的工资早被扣发，每月仅给他们发一点生活费。他们自己省吃俭用，还要节省一些钱以供当时插队的我和弟弟作为探家路费之用。在经济拮据的时候，养鸡种菜，也的确补充了一些生活所需。

按监管规定，他们三人平时不得随便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在这个不大的活动天地里，他们的生活倒也很规律。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三人在园中耕作。晚饭后，清扫完毕、三人便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广播，然后父母亲读书看报，祖母就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父亲和母亲非常喜爱看书。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他们带来了几乎全部的藏书。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之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江西探亲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母亲也时常给我们讲述、议论一些书中精辟之处。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收益不浅。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下感到空虚与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1971年在父母的申请下，我的哥哥被批准到江西与他们同住。我哥哥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文革”中因父亲问题的株连，于1968年被聂元梓等开除党籍，迫害致残。几经辗转，被送到北京清河社会救济院。在那种拿人下当人的日子里，象他这样戴着反革命帽子的残疾人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那时他身体十分衰弱，胸以下肢体瘫痪，时常高烧。他无权享受大学生的待遇，自然没有工资。在救济院里，他每日只能躺在床上，用铁丝编字纸篓一类的东西挣点零用钱，处境异常悲惨。父母在得知哥哥的情形后，十分悲痛，不得不写信给中央，申请大哥到江西同住。在历尽劫难之后，哥哥总算回到了父母身边。三位老人对哥哥的照料十分精心。母亲把全副的爱倾注到儿子身上。她不顾自己身体不好，每日为哥哥端饭送水，日常料理

都由她来做。父亲则给儿子擦澡翻身，做最重的活。祖母也总是努力做可口的饭菜给他补养身体。哥哥自己也克服身体障碍，尽量锻炼自理能力。虽然多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份辛苦，但大家同甘共苦，互敬互爱，竟使生活热闹丰富了起来。

在我哥哥坎坷的境遇中，我要特别提起一个人，一个与我哥哥素昧平生，但因路见不平而奋力相助的人。这就是北京外文印刷厂的王凤梧师傅。1969年，王师傅随他们工厂的工宣队进驻北大，被分配负责我哥哥那个班的工作。当时我哥哥已经致残。王师傅曾到校医室看望过他。凭着一股朴质的正义感，王师傅对我哥哥十分同情，认为应给予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治疗。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王师傅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但以后几年之中，无论我哥哥辗转何处，王师傅都坚持去看望，问寒问暖。哥哥去江西后，王师傅便不断地向上写信、申诉。到北大，到市委，四处奔走，呼吁给我哥哥治病。在那黑白颠倒的非常时期，能这样不顾政治压力，甚至不顾危险地为象我哥哥这样处境的人说话，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知道，这需要怎样一种正义感，需要怎样一种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胆量呀！从那时起，王师傅和我哥哥就结成了患难之交。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父亲恢复工作以后，王师傅一家人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一个要求。我们全家人都十分感激王师傅在困难之时给我哥哥的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敬佩王师傅及他一家人那种中国工人阶级正直、勇敢、纯朴的可贵品质。“文化大革命”的狂涛中，沉浮着各种各样的卑劣小人，他们就象浪花边上肮脏的泡沫。但无论是巨浪，无论是泡沫，都永远吞蚀不了、淹没不掉大海岸边黄金一样的沙粒。千千万万象王师傅这样正直的普通的中国人，正是我们国家、民族于危难中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我的父母到江西后不久，在他们自己的申请下，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参加劳动，这个工厂离我们的住处仅二十分钟的路。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厂劳动半天。父亲作的是钳工。他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就做过钳工，虽然时隔多年，他干起活来还是那样的认真、熟练。母亲则是做拆洗线圈的工作。父亲当时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所以每日上工都由人持枪押送，在工厂也是被实行“不许乱说乱动”的监督劳动。尽管如此，对他们来说，这总是长期与世隔绝以后得到与外界、与社会、与群众接触的机会。开始的时候，厂里的工人是怀着好奇的心理来观察他们二人的。时间一久，两位老人的言行举止、劳动态度以及他们的为人，深深感动了工人们。工人们对这个“大走资派”的隔阂逐渐消除了。共同的劳动生活使他们对他产生了同情。随着时日的增加，工人们与我父母之间的情谊愈加亲密起来。工人们在劳动中、在生活上时常关心和帮助两位老人。我记得，工人师傅常常送给我们一些做米酒的酒药等生活用品，还帮我们磨米粉。父母上工的路上有一段十分泥泞。父亲已是年近七十的人，难免步履不稳，有一次滑倒摔了一跤。工人们知道了，立即悄悄地连夜把那段路修好了。还有一次，那是我弟弟第一次从插队的山西回来探亲，一家人团聚真是高兴了一场，不久假期已满，那天早上下小雨，送走了弟弟之后，父母亲照常上工。弟弟的走，无疑使父亲十分难受。上工后不久，父亲突然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了，工人们看到后，立即扶他躺下，拿自己的糖冲水给他喝，又照料着用拖拉机把父亲送回家中。三年之中，我父母虽是在这个工厂里劳动改造，但工人同志们却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关心和爱护。在工厂劳动期间，劳动的本身锻炼了父母的体魄；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接触，更使他们了解人民群众和当时的社

会状况，并从工人同志中得到了最好的精神安慰和支持。在这几年之中，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冬，他们去工厂上工从不间断。

值得记忆的是，就是在这个工厂里，父亲自被打倒以来，首次享受了一次“政治待遇”——和工人一起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在江西那种被软禁的环境里，政治消息极其闭塞，1971年10月1日，身为“副统帅”的林彪竟然没有出席国庆活动，当时我们就感到十分诧异。11月5日，突然通知我父母去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我们在家中等待父母时，因不知是福是祸，真是急得坐立不安。好不容易等到中午时分，父母二人回来了。因监视的人在场，他们什么也没说。母亲把我拉到厨房，用手指在我手心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但又无法发问。直等监视的人吃饭去了，我们全家才聚到一起，听母亲讲述文件内容。父亲显得兴奋和激动，他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不容！”随后，父亲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林彪的自我灭亡，在历尽劫难的“文革”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件，对我父亲的政治命运，无疑也具有深刻的影响。

自此以后，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林彪在江西的爪牙程世清倒台后，新省委白栋材、黄真同志探望了父亲，撤换了态度恶劣的原监管人员。于是我们的生活气氛变得轻松了一些。不久，中央根据我父亲的请求，同意我哥哥回京治病。我送哥哥回京之时，适逢1972年“五一”节前。一天，有个朋友告诉我，王震同志叫我去。在此以前，我虽从未有幸见过王老，但久仰“胡子叔叔”的大名。当我到北太平庄他的住地时，只见一位削瘦的老人急步迎了出来，一把握住我的手，十分热情地问：“爸爸好吗？”当时我忍不住热泪盈眶。胡子叔叔详细地问了我父亲及全家人的情况，他让我回江西转告我父亲，毛主席对我父亲是有区别的，并说他自己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我父亲出来工作。胡子叔叔还留我在他家吃饭住宿。自“文革”以来，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但此时此刻，在胡子叔叔这里竟然受到如此的关怀、如此的厚待，实是令我感动万分。胡子叔叔在那种时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而出为我父亲说话，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没齿难忘呢！胡子叔叔的这种以正义勇敢、豪情侠胆著称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这些告诉父亲后，父亲也是十分感动的。

1972年底，我的父母被安排到江西井冈山等地参观，父亲的老秘书，从二十岁起便追随我父亲、“文革”中受尽了磨难、当时正在江西干校劳动的王瑞林同志获准随行同往。父亲一行游历了井冈山，凭吊了革命遗迹，重访了瑞金等地，在赣东北的行程中，还参观了闻名中外的瓷艺之都——景德镇。可惜，景德镇瓷厂竟为林彪、程世情一伙改成了制造什么“水陆两用车”的工厂！车未造出，精美的瓷艺却几乎破坏殆尽。他们参观的时候，瓷厂的工人们正在努力恢复瓷器生产。工人们热情地欢迎父亲一行，并送给他四个特制的花瓶。我的父母十分珍爱这凝结了工人同志们心意的礼品。这四十美丽的瓷瓶，随着我父亲经历了第三次政治起落之后，现在还摆在父亲的办公室内。

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

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

1973年2月，中央通知我父亲回北京。在江西度过了整整三年多的时光后，父母亲带领我们全家人于2月20日乘火车启程，踏上了返回北京的路程。去江西之时，只有孤零零三位老人。离开江西时，竟有祖孙四代近十口人了。我们全家人对这曾经羁旅三年之地，对那红砖楼房的小院，对江西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充满怀恋之情。

车速飞快，汽笛长鸣，北来的寒风已然拂面。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那更加激烈的、震撼每一个中国人心灵的政治动荡，就要揭幕了，（转自1984年8月23日《江西日报》）

回忆邓小平在江西新建的一段日子——访问罗朋谈话录

熊敏

梅飏 1969年10月，邓小平彼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流放”到了江西。或许是历史的巧合，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头”，竟然是他20多年前太行山下的老部下——罗朋。

笔者幸得机会采访了这位当时的见证人，听到了他真实动人的回忆。

1938年，我从广东家乡北上延安参加了革命。1945年，曾在晋冀鲁豫军区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从那时起，常聆听刘伯承、邓小平的教诲，对刘、邓首长十分爱戴。解放后50年代，我在公安部武装民警局任副局长。1959年反“右倾”，被下放到青海省劳动。1962年调到江西，任江西蚕桑垦殖场党委书记。“文革”时，江西蚕桑场改为人民公社，我再次彼作为“走资派”打倒。“解放”出来后，调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任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可万万没有想到，历史再一次地把我和邓小平联系起来。

一天，当时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昌奉突然来到新建我吃、住、办公三位一体的小屋，通知我：邓小平要到这里来。

我很早就认识陈昌奉。我在公安部工作时他任武警山东总队队长，他因曾是毛泽东的警卫员而闻名。在北京的时候，我曾问他：“你常去看主席吗？”陈说：“主席很忙，我不好经常去打扰，只是他过生日时才去。”一晃10多年过去。自从我离开公安部去青海，与陈昌奉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如今两人地位、身份已不能同日而语。很有意思，当我在新建见到他时，陈昌奉似乎完全下认识我，一句寒暄的话也没有，他的谈话是指令式的。这可以理解，他是省革委会副主任，我是小厂长，互相“不认识”，心里反倒能平衡。地位摆正了，谈话方式也就自然了。

谈论就两人在场，警卫员没让进来。他说：邓小平要下放到江西，就安排在你们厂劳动。你要做好保卫工作，不能出一点问题。出了事，唯你是问。外面的人不准接触邓小平，有情况打电话给省革委保卫部。邓小平的问题还未定性，不要称同志，也不要叫邓小平，就叫‘老邓’……

这么大一件事，谈话前后不到10分钟。这大概是“老公安”的脾气，干脆、利索，剩余的，你自己去领会。

我久久不能平静，短短10分钟的谈话，足够我紧张的了。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的事，太突然了。我很激动，那天晚上一宿都不能入睡。这一生中所面临的事很多，但恐怕不会再比这件事更重大了。我想了很多，回想起20多年前在太行山区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时的情景，他那铿锵有力的川腔仿佛还在耳际萦绕。人间沧桑，没想到干革命几十年，自己昔日的老领导今日竟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千头万绪，不管怎么说，我只想尽力去做，最重要的是把邓小平保护好。

第二天一上班，我们就开始布置“防范”措施。保密，是安全的最大前提。“邓小平要来”，消息只能限于本厂，切不可向外泄露，否则就容易出麻烦。全厂百余名职工，要做到保密，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召开了职工大会，宣布了“邓小平要来”的消息。规定全厂职工谁也不能泄露，对老婆孩子也不能说，谁传出去就要严肃处理。还决定成立一个党员保卫小组，做好防范保护工作。

说来也巧，邓小平来厂劳动的前天，出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将厂里

谁也惹不起的一个“造反派”处理了。一次开会，那个“造反派”带头呼口号，把“打倒刘”喊成了“打倒毛”。事出后，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将他调离了新建县。这有利于邓小平来厂劳动保持厂区的平静。

几天后，新建县一个有些身份的人跑到我们厂召开大会，作了长时间的报告，大批特批“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并要工人提高警惕。还向我们指示，要严厉监管邓小平。

我自然不能正面与这位头头顶着干。心想，你说你的，我有我的打算。邓小平没有开除党籍，还是党内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这种时候。自己必须有主见，否则就难办了。

当时厂里贴了许多标语和大字报，都是“打倒刘邓”的。邓小平要来，应该给他一个平静的环境，于是，我们把标语和大字报全部清洗了。还组织全厂来了一次卫生大扫除，整理厂容，并专门腾出了一间房子，供邓小平劳动休息时用。

说来有意思，我们这么搞“欢迎”，并没有惹出什么麻烦。也许因为邓小平的问题尚未定论，所以上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时我也并没有往“欢迎”这方面想，但却偏偏又这么做了，只不过是一种潜意识罢了。

1969年10月下旬的一个上午，邓小平和卓琳第一次来到工多少年没见过面，今日相见感慨良多。我激动地握住了老首长的手。当然，邓小平并不知道我曾经是“二野”的，在太行山时就是他的部下。

陪同邓小平和卓琳一起到厂里来的、是省军区派来的一位干部老黄。

厂里有4个车间，当时，安排邓小平和卓琳在修理车间劳动。

邓小平的主要工作是用挫刀把零件磨平。邓小平说，这个我行。40年前，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干过这活。虽然几十年过去，但如今做起来，仍像个老把式。周围的老工人见了邓小平做出来的活，都点头称好。

作为一厂之长，我时常走动于各车间。而这段时间去的最多的当然是修理车间了，因为邓小平在那里。开始，我担心老黄干涉，所以在邓小平工作处只是观看操作，偶尔说上两句。

我与老黄接触，刚开始有所“提防”。我当时想，不能与老黄弄僵了，否则他可能让上面把我调走，那样，谁将来接替我呢？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在那种年代和情况下，不容易找到第二个与邓小平有特殊关系和感情的人来。

一天劳动，卓琳与一位女工谈话，说到开心时笑出声来。老黄不高兴。我打圆场说：“算了吧，老太婆了嘛。”

开始时，我和老黄互有戒心，后来相处得不错。正是由于这样，老黄逐渐不防备我与邓小平的接触。久而久之，我还能够带儿子一块去邓家居住的“将军楼”。

1971年元旦，邓小平一家在新建县团圆。邓朴方此时行动不方便，我们为他请了一位阿姨照料生活。

这些年来，邓小平难得心境这么舒坦。这时的他完全是一个普通的父亲。我们到他家时，邓小平正系着围裙在厨房烧饭。见我们来了，他说，我现在从车间到家里，都是一个劳动力啰。

我们给邓朴方特制了一个床架，让他可以在床上运动。我问“这床架可不可以？”邓小平说，好，这床架好。

在那段日子里，邓小平把与工人一块劳动当成一种乐趣，作为生活的支

撑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春雨绵绵季节，工作人员劝他不要去车间劳动，但他却说：要去，我一定要去！

1973年，邓小平就要离开工厂去北京。我也接到调令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作。我与妻子年丰到邓小平住处告别。卓琳高兴地拿出桔子、糖果招待我们，我说：“厂里照顾不周，请原谅。”邓小平摆摆手说：很好，我们在这里几年，麻烦你们了。他还站起身打趣地扯了扯衣服，说：在这里劳动，我心情愉快。这几年，人也胖了，看，衣服都穿得紧了。我说：“我也要离开工厂去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作。”邓小平说道：办学很好嘛。

我调走后，原副厂长熊延禄接替了厂长职位。

1975年，熊延禄等人出差到北京。邓小平知道后，立即派秘书代表他去看望大家。秘书热情地向熊延禄等人说：“小平同志很忙，脱不开身，委托我来看你们。你们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有什么困难，说一声，我给你们办。”

熊延禄感动他说，“小平同志那么忙，还这么关心我们。请您代我们向小平、卓琳同志和他们全家问好。我们全厂工人、干部也都很想念小平同志。大家祝愿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邓小平没有忘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工人群众，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期间，他找到江西省委书记黄知真，向他嘱咐：你回去后，应该扶持一下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

1977年夏，熊延禄又出差到北京。邓小平立即委托卓琳去看望。卓琳到他们住处时，他们已回南昌了，邓小平叫卓琳直接写信给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代表他向全厂工人问候。卓琳在信中写道：“在你们厂三年劳动、学习中，同广大工人和干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你们“对我们的关心，使我们感到难忘，每当提到那时情形，对你们总是十分惦念。”

初访井冈 史爱

1972年11月12日，初冬的一个星期天，天刚蒙蒙亮，一辆灰色的“伏尔加”驶出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大院，奔驰在赣中大地上。车上坐着“文化大革命”中被贬居新建县望城岗的邓小平。这是他下放三年多以来第一次外出参观。

“这次出来什么都新鲜”

1969年10月18日，在战备的名义下，一大批老干部被“疏散”出北京。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被软禁在中南海自己住处的邓小平也是其中之一。10月20日，邓小平偕夫人卓琳到达南昌，几天后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由一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改行”为一位早过了退休年龄的老钳工。

1971年秋，“九·一三事件”后，笼罩在中华大地上那“文化大革命”特有的紧张政治空气略有缓和，邓小平先后两次给中央写信揭批林彪集团，并提出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的要求。几天前，江西省委负责人黄知真来到望城岗，传达了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安排邓小平去井冈山等地参观并顺便到泰和县考察农业机械化。邓小平欣然同意这一安排。

1972年11月12日上午，邓小平乘车途经素有“药都”之称的樟树镇，参观了江西盐矿和四特酒厂，实地了解工业生产的真实状况。

下午，邓小平一行到达吉安交际处，下榻于毛泽东1965年曾经居住过的“一号房”。交际处位于赣江江畔，门口是一条幽静的小街，吉安市名胜之一、南宋淳佑年间建成的“白鹭书院”便在邻近。

客厅里，邓小平与吉安地委（当时称井冈山地委）的同志交谈起来。听到主人那纯正的山西口音，他感到格外亲近，仿佛又回到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太行山区。

他询问遂川、万安、泰和等具备有多少人口及其它乡情；他回忆起宛希先烈士，建国后第一任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和他在二野时的老部下张国华将军；

他不时表露出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

地委负责人向他介绍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邓小平听着、思索着，感慨地说：“好多年没有出来了，这次出来什么都新鲜。”

当听到林彪企图篡改井冈山的历史时，邓小平两眼凝视着客厅门外的两棵大枫树，平静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历史还是历史，历史不能篡改，那是‘左’的路线。”

11月12日，吉安交际处一号房的灯光，直到深夜还未熄灭。

“我原先认为邓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倒了霉，又在望城岗劳动了几年，身体会垮掉，见到他后还真吃了一惊，没有想到他的身体这么好，走路很快。”“他话不多，偶尔开个小玩笑。”在吉安军分区干休所的一栋小楼里，白云旺老人这样回忆22年前接待邓小平的情形。

“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

11月13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永新县三湾村。

在枫树坪，三湾的群众惊讶地看着正在参观的“东南亚外宾”。这位“外宾”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旧黑皮鞋，身材不高，却很精神，偶尔流露

出四川口音。他们越看越觉得面熟。

“邓小平来三湾了。”“昨天通知要来参观的‘东南亚外宾’，原来是邓小平。”人们奔走相告，从家中，从地头，群众自发地聚集到三湾招待所的大门附近。用期望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几年来已销声匿迹的邓小平。

邓小平也看到了这群纯厚朴实的“老表”们。虽然还只是初冬时节，但山区已经相当冷了。可是这里的群众仅仅穿着一条单裤，衣衫褴褛且大部分是自织的上布。在望城岗，邓小平从平日与拖拉机配件厂的工友们交往中，已经了解到老区的条件仍很艰苦，那里群众的生活仍很贫困。今天亲眼见到，邓小平的眼眶湿润了。他对曾经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至今还这样穷、这样苦，十分难过，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

“伏尔加”车在永新至宁冈的公路上奔驰。邓小平坐在车里，吸着烟，默默无语地望着窗外。阴沉沉的天，夹杂着小雨，使人感到格外压抑。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即将燃尽的香烟，摇下车窗，把烟蒂扔出窗外，一阵冷风带着新鲜空气进入车内。邓小平看到沿途的村庄，处处仍是当年的旧土屋，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更添一层陈旧。

虽然，1972年邓小平头上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紧箍咒”，一路上又是少说多看，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面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他很难再保持沉默。在宁冈县茅坪，邓小平参观了湘赣边“一大”会议、八角楼等旧址旧居。这些旧址旧居分布在与三湾相似的穷困的村庄中。在八角楼，讲解员讲起林彪篡改“朱毛会师”的历史为“毛林会师”。邓小平插言：“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

参观毛泽东旧居后，邓小平又说：“当时蛮艰苦，革命真不容易。”

看到农舍墙上保存的革命标语时，宁冈县的干部忙向邓小平介绍茅坪有多少人家，有多少旧址旧居，这些革命标语是怎样保存的……

“老表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卓琳突然问了一句。

宁冈县的干部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们早已知道邓小平的认真是闻名于世的，也不愿对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说违心的话。

邓小平看到当地干部有难言之隐，平静地对他们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

他还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的党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

临上车时，邓小平又语重心长地对宁冈县的干部说：“你们在这里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于革命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

望着盘山公路上远去的小轿车，宁冈县的干部们久久地站在原地，心里回想着“以后会好的”话语。

黄洋界，毛泽东的一阕《西江月·井冈山》使其闻名遐迩。

11月14日，邓小平来到这里。

邓小平站在黄洋界，眺望远方。人说庐山的云海会使人在身临其境时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井冈山那气势磅礴的云瀑同样壮观、雄伟，一会儿似铺天盖地的大潮，一会儿似涓涓的细流，变幻莫测，千姿百态。

井冈山，革命的摇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谭震林、黄克诚、谭政、滕代远、何长工、萧克、宋任穷、陈正人等等，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功臣、邓小平的老战友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而今有的已经谢世，有的独处一方，有的仍在禁锢之中。到井冈山是邓小平多年的夙愿。

1931年2月，邓小平率红七军转战粤桂进入江西，到达距井冈山百余公里的崇义县，这里已是湘赣根据地的外围地带。因江西的敌情尚不严重，他在此告别红七军的战友，转道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与井冈山失之交臂。此后，邓小平又在中央苏区工作，却一直没能上井冈山。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到过江西，但因公务繁忙，仍未了却上井冈山的心愿，今天总算如愿以偿了。他忘情于这个初访的浮想中。

“首长，这碑文上毛主席的手迹《西江月·井冈山》，不是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写的，而是郭老来井冈山后，在武汉东湖请毛主席手书，立碑时按主席手迹临摹的。”讲解员的话打断了邓小平的思绪。

“哦。”邓小平将目光转向纪念碑。

“首长，1969年林彪到井冈山时，他也题过词。叶群跟着也题词。”

听说叶群居然也为黄洋界题词，邓小平以一种不屑的口吻说：“她不在！”八面山，井冈山党委书记程世茂和几个井冈山外事办的年轻人簇拥着邓小平在爬坡。一位细心的工作人员看到邓小平的腿有些不便，就机灵地砍了一根小竹棍给他。邓小平高兴地接过小竹棍，敲敲腿，风趣地对大家说：“我这一身零件除了这条腿，其他都是好的。”

在去双马石的小路上，一位年轻人听说邓小平是第一次上井冈山，便在路旁拔了一棵桔梗，介绍说红军当年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邓小平接过这棵桔梗，递到自己的鼻子前闻了一会。仿佛想起了过草地，整整七天七夜，大草地上面野草无际，下面黑水弥漫，渺无人烟，气候变化无常，许多红军战士倒下了，他们死于饥饿，死于疾病，死于误食毒草，死于沼泽之中。邓小平面对对往事的追溯，严肃地说：“是的，这种草全国都有，红军长征时也是吃这个，有些麻口，这个既可以充饥，又可以解渴。”年轻人用敬佩的目光注视着这位革命前辈，有的还情不自禁地把桔梗放进嘴里细嚼，品味其中的甘苦。

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砗砂冲、桐木岭；大小井、黄坳、茨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工艺美术厂；井冈山的许多历史遗迹和景点留下了邓小平的足印。

井冈山的群众得知邓小平来了，都很兴奋，想方设法要见见他。井冈山党委也尽可能为邓小平在山上的活动提供方便，在参观、食宿方面作了认真安排。

直至今日，许多井冈山人都能如数家珍般地叙述邓小平当年寻访井冈山的珍闻轶事：“说草”、“吃鸡”、“评戏”、“诊脚”等等。

富有革命传统的井冈山人民与革命领袖心心相映。

“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

池龙，泰和籍的老红军，空军通讯部原副部长。因得罪过吴法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一人囚居山东。他只得把三个孩子送回泰和，托付给乡亲们和当地政府。“九·一三事件”后，他龙回到北京。1972年秋，他回到故乡，一来感谢乡亲们和当地政府，二来看看分别数载的骨肉。他住在泰和县革委会院内的小客房里。

11月17日，池龙那军人特有的敏锐，使他感觉到今天来的，住在小客房另一端的客人，决不是一般的人物，因为当晚泰和县革委会保卫部派出了两层岗哨。究竟是谁呢？池龙几乎一夜未眠。18日一清早，他急匆匆地找县委书记刘步山打听。当得知是邓小平后，他激动地对刘步山说：“我要见他，

我熟悉他。”

刘步山也是一位老同志，“文革”前夕，他任泰和县委书记。在“文革”中受过冲击，很理解池龙这样老同志的心情。他先与卓琳商议了一会，随后又设法说服了随行人员，便去告诉邓小平：“首长，有一位老同志想要见你。”邓小平一听，很爽快地说：“好！来，来，来。”

池龙见到邓小平，十分激动。立正敬礼后，上前紧紧握住邓小平的双手，大声说：“首长，我是红一方面军的，在长征时经常看到你，当时我是通讯兵。”邓小平仔细地端详着池龙，“哦，记起来了，是有这样一位小伙子。”

两人坐下来回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往事。刘步山也一声不吭地端起一张椅子，在门口坐下，不让别人来打断他们的谈话。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两个多小时，邓小平和池龙还在交谈。当池龙悲愤地诉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痛苦折磨后，邓小平冷静地对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

“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邓小平见池龙有怨气，要他正确对待个人遭遇，不要纠缠于个人的恩怨，要振作精神，把眼光看远点。

“老首长……”池龙被邓小平的广阔胸怀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所感动，这位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汉子流泪了。

“主要看看农业”

考察农业机械化是周恩来总理交给邓小平此行的任务之一。邓小平深知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昼夜操劳，真是鞠躬尽瘁，他希望能为这位多年的战友加兄长分担点忧劳，作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1月17日，邓小平利用这次初访井冈山之便，来到泰和县。当时全国农业机械化南方片现场会在泰和刚刚结束不久。

邓小平首先去了泰和县拖拉机厂，与厂里的干部交谈，询问小型拖拉机的生产情况。他从木模、翻砂、刨、钳、金工、装配等一个个车间、一道道工序都仔细地看了一遍。随后，他又去泰和县上田观看农用水田插秧机操作表演。连日来邓小平在吉安地区走了几个县，相当劳累。可他不顾疲乏，踩着泥泞的乡间小道，特意走上田埂，就近看插秧机表演，邓小平一边观看一边说：“插秧机这个问题，世界都没有解决，连日本都没有解决好，关键的问题是分秧不均。”

回到招待所后，刘步山询问邓小平看了农田插秧机操作后有什么意见。邓小平说：“农业机械化是个方向，你们还要研究农业机械化。”当听说大规模难，邓小平又说：“一件事总是由难到易。”

在泰和了解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之后，邓小平又决定再到农村去看看。像从前那样，他要和普通农民、农村基层干部摆摆“龙门阵”。

11月19日清晨，邓小平乘车离开泰和县城，直奔吉安市禾埠公社军民大队。

在禾埠，市、社负责人问：“首长，你了解什么？”“主要看看农业。”邓小平简练地回答。

小会议室里，邓小平饶有兴趣地听着市、社、大队的介绍，当听到军民大队军民二队的粮食亩产是780斤，副业有养猪和作粉丝，邓小平用称赞的口气说：“这个小队不错，副业搞得不错，农业也不错。”

听完介绍后，邓小平又提议到田里、养猪场去看看。

邓小平在市、社负责人的陪同下，步行 2 华里来到军民村。

邓小平径直走到村旁尚未收割的稻田旁，拈起稻穗仔细看看，点点头。

在大队猪场，邓小平问饲养员：“有多少头猪？”饲养员回答说共有 109 头。邓小平不顾气味重，一个栏一个栏，一头猪一头猪地数着过去。邓小平的认真劲又“倔”了起来。

“怎么差了 9 头？”邓小平发现只有 100 头。饲养员忙说有 1 头母猪带着 8 只小猪在外面晒场上。听到饲养员这样解释，邓小平满意地笑了起来。

当地干部看到邓小平蛮高兴，临走时，向邓小平提出：“首长，以后请再来。”

“有机会再来。”邓小平摇了摇手，告别了闻讯而来的群众，乘车而去。

1972 年 11 月，邓小平历时一周先后走访了吉安、永新、宁冈、井冈山、泰和等县市。不久，他又去了赣南、景德镇等地。在江西老根据地这块革命热土上，老表们很快地流传开“邓小平又出来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人们急切地盼望着、期待着这一消息得到证实。

情归中央苏区 高继民

历时一周的井冈山之行，终于了却了邓小平积存胸中数十年的心愿。回到“将军楼”，一路风尘未洗，他的心又飞到战争年代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赣南中央苏区。

从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到1972年羁旅南昌郊外，38年过去了。光阴在荐，岁月蹉跎，赣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令他魂牵梦绕。回京工作已成定局，邓小平意识到自己在江西逗留的日子屈指可数，必须抓紧时间重游故地，探望乡亲父老。

1972年12月5日，一辆浅灰色“伏尔加”轿车载着邓小平及其夫人卓琳穿过南昌市区后，驶入105国道，朝着邓小平经常思念的那块红土地飞驰而去。

当天晚上，邓小平一行停宿赣州。

次日，阴沉的天空仍未显现笑脸。伏尔加驶离赣州，沿东北方向行进，上午10时许，停在兴国县委第二招待所院内。

邓小平没到过兴国，但对兴国是熟悉的。兴国是中央苏区时代主要县份之一，当年在毛泽东、朱德等关怀下，“兴国的同志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县”。邓小平在瑞金、会昌任县委书记时曾多次号召本县人民学兴国、赶兴国。后来他主编《红星报》，也曾亲笔撰文介绍兴国人民的先进事迹。

如今，他一踏上兴国的土地，就兴奋地对兴国的同志说：“来兴国是我多年的愿望，可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今天终于来了。”

吃中饭时，邓小平望着地道的兴国饭菜，深有感触地说：“吃到兴国饭菜，就让我回想起当年兴国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厚意，他们总是拿最好吃的东西来招待红军指战员，凡是到兴国来的同志都有这个印象。”

下午，邓小平参观了“苏区兴国模范县纪念馆”、“毛泽东作兴国调查纪念馆”以及“鸡心岭革命烈士纪念馆”。参观时，他是那么专注，那么情深，每一件文物、每一张历史照片都激起他无限的遐想。他来到“鸡心岭革命烈士纪念馆”时，停住脚步，久久地凝视着纪念馆的大门，然后缓缓地摘下帽子，向烈士致哀。每位烈士的照片及其简介他都看得异常仔细，有时在一位烈士的遗像前驻足5分钟之久。参观“毛主席作兴国调查纪念馆”时，他指着解说词中“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珊”说：“是大山的‘山’，不是珊瑚的‘珊’。曾山同志很有名气，不要把他的名字搞错了。”

参观结束后，邓小平对兴国的同志说：“苏区时你们兴国人口是23万，我记得你们县参军、参战的人很多，出了很多将军。当年苏区，你们兴国人在各县都有干部，是不是这样？”兴国的同志十分钦佩邓小平的记忆力，又一次感受到了他对兴国人民的深情厚意。

返回途中，他还登上了长冈水库大坝，参观了长冈水电站，详细询问了水库容量、发电量以及灌溉、防洪、养鱼等情况。

7日早饭后离开兴国时，他对送行的兴国同志说：“总算了了心愿。”

上午10时左右，邓小平来到了毗邻兴国的于都。

于都，邓小平自有一番别情萦绕心头。

1931年8月，他与夫人金维映从上海来中央苏区不久，就各奔东西，邓

小平在瑞金、会昌开展工作，金维映则在于都任县委书记，尽管后来的一场残酷的党内斗争导致了他们夫妻离异，但丝毫未影响他们为事业奋斗的坚定信念。故地重游，故人难忘。在逗留于都的几小时中，邓小平就几次提起金维映。他对于都县委负责人说：“苏区时你们的县委书记是女的，你们知道不知道？”时光流逝，但抹不去他对战友的怀念。

当年，他曾三次到于都，最后一次离开干部让他好不伤感，就是在这里，他告别了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38年后来到这里，邓小平自然想到当年红军那次悲壮的大撤退。

他伫立在于都河畔，眼望缓缓东流的河水，仿佛又看到了当年人叫马嘶，万人渡江的壮烈场面。

抚今追昔，邓小平感慨万千。他说：“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4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今天我还在用。”这是邓小平珍视革命历史的真实感情的流露啊！

邓小平的革命生涯，多姿多彩，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蔚为壮观的画幅，而他在会昌的一段经历则是其中浓重的一笔。

8日一大早，他就来到任过县委书记的会昌县委旧址。岁月流逝，斗转星移，县委旧址及其周围景观早已面目全非，唯有当年院内那棵千年大榕树还傲然挺立。“这棵大榕树还在呀！”邓小平一见这历史的见证，禁不住发出惊叹。他不会忘记当年在会昌工作的一幕幕情景……

1932年5月，中共江西省委将在瑞金任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调到会昌。不久，省委又根据形势的需要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联为一体，成立中心县委，任命邓小平为中心县委书记。

会昌，地处闽粤赣三省中心，又是中央苏区南大门。年仅28岁的邓小平不畏艰难，大刀阔斧，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使他所领导的地区成为中央苏区南面的坚固堡垒，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反对国民党军“围剿”苏区的战争。

正当邓小平意气风发，创造辉煌业绩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厄运降临到他头上。

1933年2月，苏区中央机关报《斗争》点名批判邓小平，指责会昌中心县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3月12日，江西省委根据王明“左”倾路线的意图，向全党公布了指责邓小平的文件。3月底，在会昌中心县委所在地筠门岭召开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对邓小平进行围攻、批判，会后邓小平被撤销了中心县委书记职务。

这时，邓小平没向当地同志吐露这段辛酸往事，而是把它埋在自己心底。

在会昌，邓小平还作了两次计划外的参观。他先驱车50公里，来到会昌南面的周田盐矿。

1970年3月30日，江西909地质大队在周田探明了一个大型地下盐矿。9月2日，正在庐山主持九届二中全会的毛泽东听说后兴奋不已，欣然写道：“在江西找到盐矿是件大好事！”

凡是经历过苏区时代的人，对苏区缺盐的苦处都有切身的体验。所以这次来会昌，邓小平执意要到周田看一看，他说：“苏区时我们吃没有盐的亏太大了，找到盐矿，是件很好的事。”一到盐矿，他双眼放出兴奋的光芒，从这个盐场走到另一个盐场，不时询问盐矿生产情况。临走时，他对盐矿负责人说：“要把盐矿办好，不仅要满足江西人民的需要，也要满足其它兄弟

省市的需要，眼光还可以放远点。”

从周田乘车返回县城，路经县体育场时，邓小平透过车窗，看见体育场周围张灯结彩，红旗招展，万头攒动，就好奇地问：“这是在干什么？”当他得知是开物资交易会时，立即提出要下车看看。警卫人员怕那里人多杂乱，事先又没准备，很不安全，不敢贸然同意，无奈邓小平态度坚决，只好依从。

邓小平下车走进交易场所，兴致勃勃地一个摊点一个货架看过去，还不时地停下来与卖主交谈几句。邓小平和蔼、亲切的容貌再一次留在老区人民的心间。

8日下午，天空仍然布满乌云。迎着寒冷的北风，邓小平抵达瑞金，来到他苏区时代战斗、生活时间最长的故地。

1931年7月，邓小平离开上海，辗转广东、福建，于8月抵达瑞金。一到瑞金，就被推为县委书记，直至次年5月。邓小平凭着他干练、果断、务实的工作作风，很快赢得了瑞金人民的信任，成为闪烁在中央苏区的一颗新星。1933年3月他在会昌被贬后，又回到瑞金，主编《红星报》，直至长征。在瑞金工作期间，他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足迹遍及全县。那时，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分地。邓小平就对他们讲：我们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后来，大家都接受了他的意见。

40年后重游故地，邓小平心情格外激动。

沙洲坝毛泽东旧居，叶坪红军广场，云石山中央政府驻地，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址，《红星》报社旧址……这里的一个个历史遗迹，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对邓小平来说都是那么熟悉、亲切，使他流连忘返。当时，他还戴着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但江西老区的干部和群众给予了他热情的接待。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使他感动不已。在瑞金的三天，他无时不沉浸在艰苦又难忘的苏区斗争岁月的追思之中。

当他听说瑞金还没有一个革命博物馆时，他说：“瑞金对中国革命作过重大贡献，应该有一个革命博物馆。”

邓小平留恋过去的斗争岁月，更关心瑞金的现在和将来。在他往来穿梭于各个革命旧居、旧址时，还见缝插针地参观了几家工厂。

他来到瑞金电线厂。当他了解到电线从原料到成品，中间要经过几道搬运环节，劳动强度大，又影响生产效率时，就问厂长：为什么不可以搞条流水线，从这个车间进原料，那个车间出产品？

在瑞金红都制糖厂，邓小平发现厂陪同人员领他走的不是近路，就问：“为什么不走近路？”一陪同人员说：“近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他满脸认真地说：“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不少坎坷，从来不平坦。”到了澄清车间，邓小平非要上澄清设备顶部平台看看，上楼梯时，一陪同人员上前搀扶，他摆摆手说：“不用，我今年68岁，还可以干20年。”一旁的卓琳笑着说：“又吹牛。”邓小平认真地说：“不是吹牛，干20年没什么问题。”

他来到包装车间，发现包糖果有手工包装和机械包装，就问：“手工和机械每天各包装多少斤？”人们告诉他手工包装大约80斤，机械包装400多斤。

“那为什么不全部用机械包装呢？”邓小平又问。

陪同人员一下子被问住了，只得吱吱唔唔地说：“那样的话，很多工人就没活干了。”

邓小平认真地说：“多出来的工人可以先送去培训，部分工人先上班，然后轮换，这样工人的素质就会提高。”

11日下午，邓小平离开了瑞金。

12日，位于宁都北面50公里处的黄陂被一片乌云笼罩着。40年前，这里曾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在此弹丸之地，毛泽东、朱德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统率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军事进攻，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40年后，邓小平风尘仆仆来到这里，凭吊昔日战场。这时他徜徉在黄陂大地，置身于昔日战场中，体会毛泽东、朱德的大智大勇，领略“天兵怒气冲霄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壮观景象。

从“战场”归来，邓小平来到黄陂公社会议室，与当地负责人座谈。他一边喝着清茶，品尝着金桔子，一边问县委副书记：“你们宁都共管辖多少公社？”

“25个。”县委副书记一一列举每个公社的名字。当说到赖村时，邓小平插话说：“赖村过去是于都的，苏区时我在赖村石街蹲过点，于都的柿子干不错。”紧接着，他又详细询问了黄陂公社的人口、耕地面积、农民收入、机械化程度等等，态度十分认真，他对苏区人民生活的关心溢于言表。

在回县城的路上，邓小平顺道参观了中共江西省委旧址，在参观中他说：“当时我在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时，曾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还没到职就被免掉了。”对于1933年遭王明“左”倾路线的残酷斗争，他仅仅是淡淡地一语带过。

12日午饭后，邓小平离开宁都，乘车北上。一路上，他透过车窗，扫视着身旁一掠而过的大地，望着远处缓缓移动的群山。他知道，宁都以北数百公里范围内，都是当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激烈拼杀、拉锯的战场。最使他难忘的，是第五次反“围剿”中英勇的广昌保卫战。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1934年4月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与国民党军队首先在此遭遇。由于“左”倾领导者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与强敌正面交锋，结果，尽管红军将士英勇作战，广昌最终还是失守，红军伤亡惨重，国民党军队长驱直入。当时邓小平任《红星报》主编，对北大门的战况了如指掌。几十年后，他对此还记忆犹新。

第二天，邓小平来到广昌保卫战主战场之一沙子岭，这里也是中央苏区与白区的分界线。他站在岭上，北望绵延起伏的群山，又转过身来望着身后的中央苏区，感慨地对广昌同志说：“苏区时几次想进广昌都没来成，今天总算进来了。”

13日上午，连日阴沉沉的天空突然放晴，浅灰色的伏尔加在阳光照射下，驶离广昌，邓小平出了中央苏区北大门。

15日，邓小平回到了“将军楼”。

邓小平这次赣南之行，历时10天，行程两千多华里，把他几十年来对赣南老区人民的思念洒播在当年自己战斗、工作的红土地上，了却了一桩心愿。尽管他当时的身分不明朗，但赣南老区人民还是通过各种方式向这位老战士

表示敬重之意。今天，赣南老区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时候，怎能情不自禁地想起邓小平，想起他老人家 22 年前的赣南之行。

邓小平樟树之行 皮端森

悬着颗心，翻箱倒柜，找了半天，哦，终于，眼睛一亮，发现它了！……霎时，屋里沸腾起来。

在场的人们，边争相观看着这张弥足珍贵的发票存根，欢呼着，慨叹着，感情之潮，奔涌不息……

1972年11月12日，樟树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一天。“下放”在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邓小平，被获准到樟树等地搞点调查研究。

12日上午10时左右，两辆半旧的上海轿车驶进原清江县（现樟树市）革委会招待所小院。

车门打开，第二辆车上下来穿淡色中山装的小平同志和夫人卓琳。

走进二楼接待室，邓小平选了个朝东的位置落坐。

负责接待邓小平的原清江县委副书记陈祉川，“文革”一开始，即被以“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的罪名而打倒，前不久，才结合进县革委当名管生产的副主任。

陈祉川介绍县里情况时，有意三言两语地略述了“文革”以来思想政治领域内的“大好”形势，只具体说了些工农业生产上的事。

陈祉川的心意，很快为睿智的邓小平所理解，他莞尔一笑，静静地注视着陈祉川。

听到偌大的清江县当年工业产值仅有2600多万元，小平同志眉头微微一蹙，轻叹一声，意味深长地对陈祉川说，看来，你们县的潜力，还大得很啰！简单谈完县里的情况，陈祉川随即陪邓小平去参观县城南郊的江西盐矿。

在江盐，邓小平受到了出乎他意料的欢迎。

这天，恰逢星期日，矿里五、六百名轮休的职工，从清晨起，自动汇聚于通往矿办公楼的十分洁净的道路两边，等候着小平同志的到来。

原来，头天傍晚，矿党委书记齐志亭、矿长王海清接到省里关于邓小平次日要来盐矿看看的电话通知后，这两位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一时兴奋之下，居然忘了上面有关保密指示，马上将邓小平来矿的喜讯，告诉了矿里职工，并亲自拿起扫帚，带领大家，奋战半夜，把整个矿区打扫得干干净净。

上午11时许，小平同志来了。

看见矿里这么多人来迎接他，邓小平深为感动。他赶紧下车，向簇拥在他周围的神情激动的男女老少不断点头，微笑，打招呼，表示真诚的感谢。

邓小平先后观看了江盐的卤水库、平锅熬盐、盐仓和真空制盐车间。

江盐建矿于1970年，条件很简陋，邓小平看到矿上工人在简易工棚中，挥汗如雨，艰苦劳作，努力生产的感人场面，禁不住上前紧握着一双双工人的手，动情地说，你们的精神太值得学习！大家现在的工作很辛苦，以后实现了机械化，就好了！又说，江西过去缺盐，红军在井冈山时，就没有盐吃，如今有盐了，老表有盐吃了，这非常好！

邓小平离开江盐时，齐志亭代表全矿职工送给他数小包精制食盐。

礼轻情意重。邓小平心头一热，郑重收下了这份凝聚着全体江盐工人特

殊情意的珍贵礼物。

从江盐回到县招待所后、邓小平的心情比刚来时好了许多。

午饭前，在招待所接待室，陈祉川问邓小平喝点什么酒。

望着眼前这名质朴的基层干部，当时情境下很少喝酒的邓小平，立即朗声笑道，到了樟树，当然是喝你们自己的四特！

两瓶冰清玉洁的四特摆上了桌面。

席上的话题，主要是谈四特酒。

邓小平一边细细品尝杯中的四特，一边饶有兴趣地向陈祉川等询问着四特酒的历史渊源、酿造工艺及其四个特点等等，在座者因无一酿酒内行，均答不完整，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凑着答案，有时都觉得自己的答案正确无误，竟还争执不休。每逢这时，小平同志就显示一种他所独具的宽厚长者的慈祥笑容。

陈祉川望着邓小平喝四特时那有滋有味的神色，忍不住问：“小平同志，您觉得我们这四特的味道怎样？”

邓小平端起酒杯，深喝了一口，打着手势，满意地回答，很好，很合我的口味，名副其实，是酒中佳品！

边喝边谈，边谈边笑。不知不觉间，邓小平已喝下三杯四特，卓琳也喝了大半杯。

邓小平喝酒时，只吃一点用面粉裹的油炸小鱼和两三样蔬菜下酒。邓小平不但自己喝，还多次向陈祉川劝酒，他慈眉笑眼，高兴地说，这酒好，这四特好，你们年轻人要多喝几杯，多喝几杯！

吃饭过程中，邓小平还提到了樟树的药。他说，樟树的药材很有名。30年代，我在苏区时，便听说过“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这句话，老祖宗传下来的宝物，可不能失传啊！

饭后，邓小平不顾陈祉川等人的再三劝阻，执意按规定交了伙食费和粮票，表现了一位老革命家的廉洁风貌和高尚情怀。

邓小平 22 年前的樟树之行，已成为樟树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当时既不能给邓小平拍照，也不能让他留下任何可作纪念的物品。对此，樟树人民抱憾不已。

今年春末，笔者偶尔听说在樟树市政府招待所，还可能存有当年小平同志交缴伙食费的发票存根，不觉一喜，按照约定的时间，笔者再次前往该所。

于是，有了本文开头那欢畅的一幕。

这张虽已年深月久，字迹却依然清晰如新的发票存根上写着：邓小平等 2 人，交来伙食费 0.64 元，粮 6 两。

发票存根编号， 0005776 发票存根上的时间：1972 年 11 月 12 日

邓小平对陶瓷工人的关怀 凌至葆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一九七三年年初，邓小平在回北京复职之前，偕夫人卓琳和女儿邓榕来瓷都景德镇参观。

二月七日下午，邓小平一行到达景德镇，在景德镇宾馆（现一部）下榻。邓小平对接待他们的市委领导说，毛主席要他回北京前在江西看看。景德镇很有名气，小学念书时就知道景德镇。卓琳说，邓小平是第一次来景德镇，想看看大一点的、生产恢复快一点的工厂。可见小平同志对陶瓷工业生产给予了极大关注。

自二月七日至十日，邓小平在景德镇期间，参观了景德镇陶瓷馆和艺术、雕塑、为民、宇宙、光明、红旗、人民、建国等瓷厂。

八日上午，在市委领导陪同下，邓小平和夫人、女儿一起参观了景德镇陶瓷馆，认真、详细地看了各展厅的陈列瓷。当讲解员讲到“三阳开泰”颜色釉花瓶是“吉利”的意思时，邓小平很欣赏，对卓琳说：“这窑变是国宝。”

同日午二时许，一辆蓝色的“吉姆”轿车缓缓驶入雕塑瓷厂，厂负责生产的领导早就在门口等候。邓小平在听取厂领导汇报工厂概貌和生产情况以后，首先参观了陶瓷成型车间。当邓小平看到“游水鸭”坯时，就问：“这东西有人要吗？”陪同参观的厂领导回答：“是外国人订货。”邓小平满意地“啊”了一句。又问：“它能浮起来吗？”答：“烧成了瓷器可以浮起来。”接着到彩绘车间参观，在下台阶时，陪同参观的同志准备用手扶邓小平，卓琳说：“不要扶，他能走。”后来，工人们议论说，小平同志年近七十，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磨，还有这么健康的身体这是党和国家的荣幸。邓小平看到“帝王将相”的产品问：“这个又可以搞了？”厂领导随即汇报了周总理指示：不能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外国人，只要外国人需要，我们可以适当生产一些。并向邓小平说明恢复一部分传统产品是经文化部审查批准的。邓小平听后用肯定语气说：“是可以嘛。”在该厂美研室参观时，卓琳对新产品“玉兰花”台灯给予很好的评价。厂领导为表示对小平同志夫妇的敬意，特意选了两个色彩鲜艳的“玉兰花”台灯赠送给他们，在拿上车时被小平同志发现了，坚持不要。后来卓琳同志出面付了钱。

九日，邓小平在光明瓷厂参观时，不仅问了生产情况，还直接问生产工人每月工资多少？十分关心陶瓷生产和工人生活。在小平同志离厂时，厂内的工人从四面八方拥来，几百人挤满通道，车子不能开了，邓小平走下车来，向工人们招手，工人群众热烈鼓掌，并主动让开道路。

邓小平复职后，一九七五年出访泰国，指名要景德镇雕塑瓷厂生产的“六鹤同春”瓷雕，作为礼品送给泰国国王，再次体现了邓小平对景德镇陶瓷艺术精品的欣赏和对瓷都工人的关怀！

复出前夕过鹰潭

万诗平

1973年2月19日清晨，曙光初照，大地生辉。在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旁，两辆小轿车正缓缓地驶离送行的人群、向南昌市区飞驰而去。在穿过一片闹市之后，直奔鹰潭方向。

车上坐着的是被贬谪江西已达三年多的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及其家人，内有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邓楠，女婿张勤和一个出世不久的小外孙。还有秘书王瑞林。

在这之前，江西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通知：中央已作出邓小平回京的决定并再三说明邓小平这次回北京，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汪东兴指示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他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等在江西最后一站的绝对安全。

“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之后，渴望重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邓小平，于1972年8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由汪东兴转达。毛泽东对来信迅速作出批示。其中写道：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评价，为邓小平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新的转机，从而有了这次鹰潭之行。

鹰潭，地处赣东、信江中游。相传鹰潭是因境内龙头山上几株千年石樟常有雄鹰栖息，山下信江中又有一泓碧潭而得名。人云：“急流漩其中，雄鹰舞其上”。此时的鹰潭已为县级镇建制，隶属上饶地区。

江西省委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非常重视，决定由省委书记黄知真直接通知上饶地委，让地委派人负责做好接待工作。

18日上午10时许，上饶地委办公室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黄知真打来的，指名道姓要找王瑞清。

王瑞清，上饶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一身戎装。此时正在会议室里主持地委委员会议。听说省里来电话找他，便悄声离开会场，快步走进办公室，拿起了话筒。

黄知真将邓小平由鹰潭返京的消息和有关接待事项一五一十地作了交待。并再三叮嘱王瑞清：要绝对保密，百分之百地保证邓小平在江西最后一站的安全。

王瑞清放下电话，考虑到地委委员会议尚未结束，一时难以脱身。遂决定由正在参加会议的地委委员、鹰潭镇委书记霍凤翠赶回鹰潭，和正在鹰潭的地区革委会秘书长林振福一起，全权负责这次接待工作。

霍凤翠爽快地接受任务，并问还有什么要求？王瑞清郑重告诉他：“有三点要求：一要安全，绝对安全；二要保密，严格保密；三要热情周到。”霍表示一定照办。

重任在身的霍凤翠一路兼程，天黑时分赶到鹰潭。

回到家里，霍凤翠顾不上休息整容，草草扒了几口饭，便匆匆来到镇委副书记、镇武装部政委汪光标家，共商接待事宜，一直忙到深夜，初步理出了个头绪。

第二天一大早，霍凤翠、汪光标双双来到镇委办公室，召集镇委常委开了一个简短的碰头会，决定安排邓小平住镇委招待所。这样既便于保密，又利于安全保卫。

招待所位于镇区东面的信江边，一堵用青砖砌成的围墙与市井相隔。院内绿树成荫，环境幽静。主楼为一座两层楼的宫殿式建筑，建于50年代中期，各种设备比较齐全，安全舒适，曾接待过许多党政军领导。

与招待所相对的人民公园，原为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家的花园和屯兵藏宝的库房，园内有几株千年古樟，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下午4点50分钟，两辆轿车驶入鹰潭街道，在镇委招待所内停下，身着雪花呢大衣的邓小平稳健地下了车。这位年近70高龄、经受数小时旅途颠簸之苦的老人，看上去依旧精神饱满，目光炯炯，全身焕发出旺盛的活力。

见邓小平下车，等候多时的霍凤翠、林振福连忙上前，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诚挚地问候：“首长，一路上辛苦啦！”

当听到“首长”的称呼时，邓小平平静地说：“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亲切些。”老人的和蔼可亲，令霍凤翠、林振福由衷地敬佩。

在服务人员的引导下，邓小平与家人向二楼卧室走去。邓小平下榻的219号客房，是主楼最东头的一个大套间。这里凭窗眺望，能清楚地看到对面公园里那几株千年古樟，只不过再也见不到昔日雄鹰翱翔、栖息的景象了。

晚饭后，霍凤翠简要介绍了鹰潭地名的由来和地方工业、驻军等情况，省慰问团上饶分团负责人朱开铨、莫循等人参加了交谈。交谈中，邓小平听说朱开铨是瑞金人，感到很亲切，话也多了些。他讲起了在瑞金当县委书记时，遇到的一些人和事。

当问知莫循曾在中原局工作，参加过创办《中原日报》，任过副总编时，邓小平话锋一转，谈起淮海战役。他说：淮海战役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不曾有，世界上也未有过。大家称赞道：“这是首长指挥有方。”

邓小平谦虚他说：“不，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我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短短两句话，让人感受到这位前委书记不居功自傲的高贵品德。

10点多了，大家起身告辞，请邓小平早点休息。

室外，一轮皓月拨开乌云，光照大地。

倚窗沉思良久的邓小平，吸着烟在屋内来回踱步。这已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一个习惯。在望城岗居住的日子里，每当黄昏日落之时，他总是绕着“将军楼”，在院内一圈又一圈地走着，直到身体微微发汗为止。

作为曾在中央工作多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明白，此次重返北京，意味着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的机会即将来临，从毛泽东对他原信的批示，“胡子叔叔”（王震）托邓楠捎回的口信，新任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黄知真探望时的言谈中，都能揣测出毛泽东、党中央以及不少老同志都希望他能出来工作，协助周恩来励精图治、大兴百业，重振国民经济。

夜已经根深了，楼上楼下一片寂静。邓小平思绪万千，忘却了一天的疲劳，轻轻推开房门，迈步朝楼下走去。

正在楼上值班的服务员郑非凤，听到门响，连忙从值班室出来，迎着邓小平问道：“首长，您需要点什么？”

邓小平摆了摆手：“什么都不要，只想随便走走。”

郑非凤一时感到很为难，因为上级已作交待：为保密、安全起见，不要让首长随便外出。于是，郑非凤委婉地劝道：“首长，天气很冷，外边又有

霜露，出去容易着凉。”

邓小平微笑着说：“不怕，已经是春天了。冷不到哪里去。”

郑非凤不好再坚持了，只是远远地跟在邓小平身后，护卫着他朝楼下走去。

邓小平刚走下阶梯，负责内保的上饶地区公安处警卫科长刘树兴快步上前，准备搀扶。邓小平摇摇头说：“我看得清路，不用扶。”

刘树兴陪伴邓小平一齐出了主楼大门，在院内散起步来。

冷风扑面，寒意甚浓。皎月下倒映着邓小平稳健的身影，沉寂的四周不时回响起邓小平轻微的脚步声。

忽然间，一片乌云笼罩着明月，院内骤然暗淡下来，刘树兴赶紧劝道：“首长，月亮已经被云遮住了，还是早点回房休息吧！”

邓小平扬起头，望了望变幻莫测的天宇，十分自信地说道：“不要紧，月亮马上就会出来的。”乌云终究遮没不了月亮，这是大自然的真谛。

半个小时之后，邓小平上楼休息，院内又回到先前的寂静中。

2月20日上午11点多钟，邓小平一家在林振福、霍凤翠的护送下，在鹰潭站登上了福州至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在车厢内，霍凤翠十分歉意地对邓小平说：“首长，真对不起，我们的接待工作没有做好，请您多批评。”

邓小平笑着连声回答：“不错，待如上宾，谢谢你们。”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列车缓缓地驶出鹰潭站，朝着北方飞驰而去。

一个多月后的4月12日晚，在北京举行的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盛大宴会上，出现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身影。翌日，在《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报纸上，赫然醒目地印有邓小平的名原来，邓小平回北京后，周恩来于3月1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重要批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这便有了邓小平出席欢迎晚宴的一幕。

1975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项工作展开了全面整顿。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又走了新的一程。

播下春风万里——邓小平 1992 年 1 月 30 日在鹰潭谈话纪实 危仁最

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关键时期的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是在中华民族振兴和腾飞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

在这 35 个日日夜夜里，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各族人民敬爱的邓小平，一路风尘仆仆，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作了重要谈话。他携春同至，播下春风万里，使神州大地又一次春潮涌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

1992 年 1 月 30 日，江西吹来了春风。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之后乘火车去上海，这一天沿浙赣线从湖南进入江西境内。

火车一路风驰电掣。先是经过萍乡。1922 年震撼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就发生在这里。邓小平 1984 年 8 月曾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亲笔题写馆名。当年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如今沐浴着改革开放的阳光，已是江西边境一个欣欣向荣的工业重镇。火车经过之处，只见工厂遍布，新房幢幢，集市贸易一片繁荣。

火车从西向东穿过富饶的赣中盆地，穿过宽阔的袁河流域，经宜春到达新余，邓小平在新余车站下车，亲切地会见了在此迎候的江西省委副书记刘方仁。新余是一个有 1700 多年历史的新兴钢铁城市。今天，它以崭新的面貌迎接邓小平。邓小平在月台上稍事休息后，列车又继续向前方奔驰。

“春风得意马蹄疾”。车轮以欢快、轻松的节奏，穿过南昌市区附近的向塘西站，穿过广袤的鄱阳湖平原，于当天下午 3 时 40 分，徐徐进入鹰潭车站，停靠在月台旁边。

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吴官正正在这里迎候邓小平。

一节车门打开，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走下车来，满面笑容地和毛致用、吴官正等一一握手。

88 岁高龄的邓小平，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步履稳健、轻松。他一边沿着月台缓步，一边亲切地和毛致用、吴官正谈话。

毛致用在湖南工作期间，曾先后两次接待过赴湘视察的邓小平，并陪同至韶山等地参观，所以很熟悉。邓小平一见面就关心地问毛致用，你来江西几年了？

毛致用说：“快四年了。”

邓小平与吴官正也熟悉，他对吴官正说，你是从武汉来的。又问，来几年了？

吴官正答：“五年多了。”

江西是农业大省，邓小平十分关注着江西的农业发展。他关切地问，江西去年的年景怎么样？

毛致用说，“年景还好。1991 年农业全面丰收，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5.5%，工业总产值增长 14%，财政收入增长 10.3%，实现收支平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702 元。改革的步子是这些年来迈得最大的一年。”

邓小平听了很满意，连声赞许说，那好。他对农民增收感到欣慰，说，农民收入 702 元，那不简单。

接着邓小平又问，去年遭灾了没有？

毛致用回答：“遭受到比较严重的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所以仍是一个丰收年。”

吴官正说：“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压库严重，库存有 140 亿斤，其中在库外露天堆放的有 40 亿斤。”

邓小平说，在粮食问题上，江西是作了贡献的。你们有困难可以向中央反映，你们有这个权利。对江西，中央要照顾一点。

邓小平的记忆力很强，念念不忘江西人民以粮食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在三年困难时期，江西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无私地调出大批粮食支援全国。1958—1959 年度外调了 9.5 亿斤大米，1959—1960 年度又调出 14 亿多斤大米，同时还补上库存 1.18 亿斤，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个增加库存的省份之一。全国人民对此有口皆碑，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表扬。这次邓小平又旧事重提，说明党对作出了贡献的地区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把农民引上了富裕之路，江西广大农民从邓小平倡导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得到了实惠，看到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巨大威力，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快速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市场经济大潮迅猛涌进封闭沉寂的土地。江西农业连年丰收，每年仍是全国调出粮食最多的省份之一，但是粮食库存也相应增加了。邓小平对江西解决粮食库存压力的关心和支持，使在场的省委、省政府领导深受教育和鼓舞。

邓小平对江西的情况很了解，他指出，水旱灾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水土保持不好。要坚持把植树造林搞好，否则没希望。他问，你们植树造林怎么样？

吴官正说：“这几年我们每年造林 600 万亩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 40.3%。”

邓小平听了连连点头，说，那好。

虽经长途乘车的劳顿，邓小平却毫无倦意。他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毛致用关于江西在治理整顿期间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情况汇报，高兴地说，治理整顿这几年，改革开放做了不少事。他指出，没有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就不会有这么顺利。

邓小平思路清晰，谈兴甚浓。他说，改革从农村起步，刚开始时有些同志想不通，存有疑虑，有的人还害怕是搞资本主义。但我们等待，既不给他们戴帽子，也不搞批判，做出成绩让他们看。后来认识逐步统一了，几年就都执行了。那时安徽有一个搞“傻子瓜子”的，收入上百万元；许多人反应强烈，主张动他。我说动不得。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涉及到一个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改革开放政策要稳定，不能变。84 年以来的几年经济上得快，是一个跳跃。农民收入多了，电器也进了农户，农村盖了许多新房。要看到这个作用，没有这个跳跃，治理整顿不会这么顺利。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强调指出，稳定发展我赞成。但是，只要能快一点还是要争取快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不能胆子没有了，雄心壮志也没有了。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

这时邓楠插话说：“这个观点，老人家鼓吹了一路。”

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邓小平对江西和对全国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接过邓楠的

话，问毛致用、吴官正，我讲得对不对？

毛致用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搞快一点。”邓楠又插话说：“老人家对江西很有感情，在车上不停他讲到江西。”

邓楠的话引起邓小平对峥嵘岁月的回忆。他深情地说，我对江西是有感情。邓小平指着毛致用、吴官正说，我在江西呆的时间比你们长。当初，我在瑞金当过县委书记，那是几个人推举的，后来中央认可了。那时苏区的工作，兴国是第一，瑞金是第二。

可不是么？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生活了四个年头。关于这段经历，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已经作了详细的叙述。邓小平也曾在一个文件中讲到这段历史，他写道：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力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

关于在瑞金工作以后的情况，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1932年5月，父亲奉江西省委之命，调往会昌担任县委书记。会昌，和它南面的寻乌、安远两县，是我中央苏区的边沿地带，三县毗邻，地势险要，是江西的重要南边门户，也是我中央苏区的重要边区。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加强中央苏区的边区工作，更有效地粉碎敌人的南面进攻，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联成一个整体，在会昌的筠门岭建立了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革命斗争。1932年7月，在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毛毛说：“父亲是一个实干的人，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凡是在他主持工作的地方，他都能迅速地打开局面，创造局面。在广西左、右江，在江西的瑞金和会昌，他都是这样，果断、坚定、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从1932年到1933年，父亲在会昌这一区域的工作，不但彻底改变了会昌这一红区边沿地带的面貌，而且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也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力图减轻这一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这就成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严重障碍。”毛毛正确叙说了党的这段历史，叙说了“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以及对抵制“左”的错误政策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等同志的种种打击。

在前面提到的那个文件中，邓小平接着写道：“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指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后，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

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沧桑几十载，弹指一挥间。1992年，距邓小平离开中央苏区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在邓小平的记忆中，当年苏区的斗争风云依然历历在目，苏区的干部、群众和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他的心。

是的，邓小平对江西是有感情的，他时刻关注着江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注着这片红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日新月异的变化。1991年9月，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他应江西省委、省政府之请，欣然命笔，书写了“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的题词，缅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对江西人民寄予厚望。

江西人民也深情地爱戴邓小平。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邓小平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谪居江西。这一呆又是近五个年头。在他蒙冤遭受打击的时候，江西人民时刻惦记着他，以各种方法保护着他，祝福他平安、健康，盼他早日出来工作。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讲到，邓小平谪居江西时，曾于1972年秋天获准在江西境内“调查研究”。他从南昌南下，先到井冈山，后向东南，到瑞金、会昌、寻乌等地。虽然他当时还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未复出工作，但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给予了他热情的接待。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县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曾使邓小平感动不已。

1973年春，邓小平即将结束谪居的生活，奉命回京复出工作。2月7日至10日，他去到景德镇参观，受到工人们热烈欢迎。光明瓷厂的工人们听说邓小平来了，倾厂出动，聚集在厂区通道的两旁，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邓小平。这时，邓小平走下汽车，面对他深深爱着的人民，兴奋地挥手向大家致意。临行前，景德镇工人们向他赠送了几件精美的小瓷品，特别意味深长的是，其中有一件珍贵的颜色釉瓷瓶，名叫“三阳开泰”。景德镇的工人后来忆及这件事，谈了他们当时久藏心底的对邓小平的良好祝愿。原来，“三阳开泰”象征旭日东升，吉祥如意，古诗有云：“三阳开泰运，五湖转新机”。此时赠送“三阳开泰”这个吉祥物，充分表示了人民在党和国家危难时刻对邓小平即将复出工作的无限信赖和欢欣鼓舞之情，真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人民就是以这种炽烈的情怀、热切的企盼，把希望寄托予他们所敬爱的邓小平。据说，邓小平十分珍爱这个礼物，把它称作“国宝”，一直摆在办公室里。

1973年2月19日，邓小平赴京复出，从南昌乘车来到鹰潭，次日转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离开了江西。他是老一辈革命家的高瞻远瞩，以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以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对广大人民利益和意愿的深刻了解，以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以对真理的无畏追求，以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运用，从江西出发，去复出工作的。他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以坦荡博大的胸怀，在江西度过了1200多天艰难的日日夜夜，又是以一个健康的身体、健旺的精神离开江西的。

1985年2月14日，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邓小平偕同王震乘火车去广

州视察，途中又一次在鹰潭车站停留。

连同这次结束南巡途经鹰潭，邓小平已是三次来到江西东部这个新兴的城市了。如今的鹰潭市，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已建成为全国重要的铜业生产基地和铁路交通枢纽，赣东大市场开始形成。新建的火车站宽敞明亮，面貌大为改观。站外的街道拓宽了，两旁盖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以鹰潭特有的红石砌成的各式新楼房隐映在一片绿树丛中，使城市充满美感。沿着城旁蜿蜒而过的信江，春水荡漾，粲如玉带。鹰潭的山山水水，都饱含着赣东北丰厚的革命历史传统和浓郁的文化意蕴，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它不愧为浙赣线和鹰厦线文汇点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望着站内站外的巨大变化，邓楠对邓小平说：“您记得吧，我们以前也到过鹰潭，是从南昌用小车送来的，从鹰潭乘火车回北京。”她指的这个日子，就是1973年2月19日和20日。

邓小平风趣地说，我有“三个专”：从北京到江西是用“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在301医院住院，一个人住一层楼，也是一个“专”。邓小平谈笑风生，气氛轻松活跃，引得在场的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时间过得真快，邓小平在鹰潭火车站，一晃半个多钟头就过去了。他老人家没喝一口水，也没有坐下休息，在月台上时而信步，时而驻足，与毛致用、吴官正侃侃而谈。

快分别时，毛致用、吴官正依依不舍，对邓小平说：“我们大家都希望您老人家在江西住段时间。”是啊，他们表达了深受其惠的江西人民对倡导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的爱戴和崇敬，表达了老表们的热切心愿和对邓小平的想念之情。

邓小平非常高兴，挥手打着招呼，满面笑容地说，等你们更发展了，再来麻烦你们。随后，他和毛致用、吴官正握手告别。列车一声长笛，驶出了鹰潭站，向上海方向疾驰而去。

“等你们更发展了再来！”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邓小平对江西人民的嘱托，他期望并相信江西这块红色的故土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快些、更快些！

邓小平在鹰潭的重要谈话，是对江西人民最大的关怀、鼓舞和鞭策。送走邓小平后，毛致用、吴官正从鹰潭迅速赶回南昌，于2月2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邓小平路过鹰潭时所作的重要指示。常委们认真地领会邓小平谈话的精神，一致认为，邓小平的指示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对我们继续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沿着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快兴赣富民的步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表示一定深刻领会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把江西的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搞得更好更快一些，决不辜负邓小平的关怀和期望。

省委这次常委会，把邓小平重要谈话的精神和江西的实际相结合，归结为四句话：“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发展更快一点”，并以此作标题，在2月3日江西日报一版头条醒目地发表了会议消息，极大地振奋了全省人民的精神。

不久，中央下发了根据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南方视察

的重要谈话整理而成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全党掀起了学习、贯彻的热潮。这篇谈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非常精辟、深刻、系统的阐述，把这一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邓小平的重要谈话有如黄钟大吕，迅速传遍全国，响彻神州大地。蕴藏在我国社会内部的巨大潜力，火山般地迸发出来了。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我们的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生机和活力，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欣欣向荣，一日千里。在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这几年江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92年和1993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4.3%和17.4%，1994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增长18%。

江西，在邓小平漫长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历史将会永远铭记着发生在江西的这一系列令人感悟、促人坚定、催人奋起的史实。当代中国江西的历史还将永远铭记着这一天：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以后北去上海的途中，于1992年1月30日特地在鹰潭火车站短暂停留，对江西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发展得更快一点”——这铿锵有力的“四个一点”，凝聚了邓小平对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人民的殷切期望，鼓舞着江西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争取更大光荣，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

周恩来与邓小平在 1973

铁骥

1973年4月12日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周恩来总理正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邓小平，这位在六年前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引人注目地出席了今天的晚宴，其公开身份是“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戏剧性地突然露面，使在场的众多中外来宾都惊讶不已。一位有幸参加这次不寻常宴会的东欧记者，事后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奇特人物：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内，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同国内依然平静的宣传报道形成鲜明对照，第二天，港台及世界的许多新闻媒介对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都大加渲染。一时间，邓小平成了海外评论中国问题的“热点”。

（一）

作为亲自安排邓小平重新露面的人民大会堂宴会的主持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说，对宴会上及宴会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个月前，即这一年的3月10日，正是他亲自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时提出，由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一个决定，发至全国各基层党组织，将邓小平同志复出一事通报全党及党外群众。当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下“同意”二字。由此便开始了邓小平坎坷生涯中“第二次复出”的历史性转折。

和“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的最终决策者。对邓小平在这个时候复出一事，毛泽东似乎已无必要再说些什么，他要讲的话早在半年多以前就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区被“下放”达三年之久的邓小平，再次亲笔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罪行，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指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当然，在毛泽东这些决定性的批语之前，还冠有“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一句。这似乎便是毛作批示达七十月之久，邓才姗姗“始出”的重要原因。此外，它还引出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3年3月10日中这样一大段话：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

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不难看出，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没有力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平反；相反，《决定》还以落实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为其出发点，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当时对解决邓小平问题的一种历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据中央这个《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复出的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论点和作法的一种否定。它对于进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应当说，这才是邓小平此番复出的“实质”所在。

此时，真正能够洞悉并把握这个“实质”的，便是与邓小平关系甚笃的周恩来。

（二）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在邓小平问题上一直谨言慎行，几乎没有讲过什么话，即使是那种为应付场面的“违心”的话。这说明，周恩来对邓小平是胸中有数的。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时，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这倒不光是毛泽东总在众人（包括外国人）面前夸耀邓小平的才干，而的的确确是因为周恩来对邓太了解了。

如果说，毛泽东是由于1931年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才真正认识、了解的邓小平；那么，周恩来则要比毛泽东又提前了大约十年。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无限深情地追念起他与周恩来的不同寻常的交往。他说：

“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邓小平，是极少用这种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语言来表达对所尊敬的人的看法的。也许，周恩来是唯一的例外。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她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

“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毛毛接下来写道：

“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

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1969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10月18日、19日，就在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待。他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拟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随后，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少将）的住宅（通称“将军楼”），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那些“建议”。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

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同年10月20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谪居”生活。

打这以后，为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便一直念念不忘“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一家。

一年后的1970年秋，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为此，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揭露了林彪集团的篡权阴谋。

庐山会议期间，实际上起着“秘书长”作用的周恩来异常忙碌、紧张。陈伯达等人事发后，他曾连续工作达三十多个小时未合眼，终因过度疲劳导致心脏病发作，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

然而，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周恩来却想起了住在离庐山不远的邓小平——这位二十三岁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办事果决、举重若轻的老战友！

一天，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即周总理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尚羽翼丰满、权力炙手可热的1970年秋天，周恩来竟直呼还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邓在周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

（三）

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彻底覆亡。在处置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的前前后后，周恩来以其毕生所铸就的信念、智慧和忠诚，全力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

同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传达。这

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五十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八个字：“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实际上是对经历了五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创伤”做某些“愈合”工作，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初步纠正，就在领导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不幸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时，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解放”啊！

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

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这里，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直接将邓小平划到了林彪一伙的对立面，实际上等于说，邓也是属于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些老人”之列。

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其中写道：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在当时都是有根强的针对性的。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随后，中央又批准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这一年8月中旬，毛泽东作出了前面提到的关于邓小平问题的至关重要

的批语。照常理说，邓小平的“解放”已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这时，一向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政治风向突然又发生了逆转。

（四）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之前，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但是，从7月中、下旬起，当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涉入“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教、科技界之后，便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干扰。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这些单位和部门从“文革”一开始便首当其冲，并长期为江青等人所严密控制；同时也是由于生产“精神食粮”工作者的特性，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难度。对于经历了数年动乱之苦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思想认识上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短期内得到解决的，例如，1971年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便如同两副巨大的精神枷锁，令广大教师透不过气来。

为此，1972年的7月下旬，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的周培源直接上书周恩来，向中央反映了该校教师中的各种思想状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8月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提出：各单位都要好好批透极左思潮；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认识不清楚，就还会犯错误。

随即，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从教育、科技、宣传等部门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力排干扰，扫除障碍，推动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深入。

周恩来坚决要求批判和肃清各个领域、各个单位极左思潮的举动，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一伙人的极大恐慌和不安。

同年9月，姚文元居心叵测地一连几次删去由周恩来审定的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

1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的批极左的文章横加指责，无限上纲，称之为“一股修正主义的回潮”。

11月底，在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上，江青、张春桥又再次对“批判极左思潮”发出诘难，竟挥笔质问周恩来，“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云云。实际上是挑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即：批极左不是维护“文化大革命”，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2月中旬，正当周恩来与江青一伙之间在批极左问题上斗争相持不下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对“争论”作出最后裁定，指出：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批判林彪应批其极有实质。

至此，周恩来领导的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便被迫中断。

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来说，“解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

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有利的巨大影响。

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然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别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了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却迟迟不见“下文”。拟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五）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搁置”了四个月之后，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适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昨晚”（即12月17日）谈及谭震林——这位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着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回题；而周恩来信中却强调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四十月前他对邓小平来信作的长近二百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旧事重提，要求“考虑”邓小平的问题，正表明他对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正是从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时候开始，“批判极左思潮”的字眼从他本人的口头上和文字上消逝了。但是，周恩来却在思想上、在行动上继续坚持肃清极左路线流毒的工作。解除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审查和囚禁，治疗他们的疾病，恢复他们的健康，已成为这一时期周恩来工作的重心。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革”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往院治疗。由此，带动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对于解放老干部，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解释：“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

“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此时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同志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这一最大的“标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而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

化大革命”这一“难点”后，他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之路；即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

（六）

终于，历史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

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已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1972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同年3月下旬，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随即，邓小平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同毛泽东见面。

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两人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即本文开篇所描述的一幕。

之后，邓小平开始参加国务院业务会议，行使国务院副总理之职。

5月下旬，邓小平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强调：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同年8月，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这是邓小平“复出”后。

毛泽东第一次考虑由邓小平同时集中央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的问题。

12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拍板定案：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

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12月22日，病势沉重而心情轻松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的全文：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一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中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撑了整整八年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下一口气。

（原载《人物》1994年1期）

邓小平的故事

为民谋利的县委书记

刘良

邓小平是 1931 年 8 月来瑞金任县委书记的，他常穿着一套粗布灰色中山装，足蹬一双布鞋或草鞋，短短的头发，亮亮的眼睛，虽不太爱言笑，但显得普普通通，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善于思考，沉着，镇静，坚毅，不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措置自如。当年，他才 27 岁。他任瑞金县委书记时间不长，却切切实实为瑞金人民办了几件大好事。

解民危难

邓小平喜欢当地群众流传的一句话，“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他要求干部要了解群众的愿望，切实为群众办实事。

叶坪乡黄埠头村黄木生是三代老贫农，全家 6 口人，上有两老（父母），下有两小（孩子）。苏维埃政府建立后，他家分得三亩五分黄上崗田，土质瘦又无水源。人家田里收稻割谷，他的田里种红薯也尽长根不结果，忙忙碌碌一年，到头来收成甚微，生活十分困难。黄木生是个远近闻名的“厚道人”，他只知起早贪黑地干，自家收成少，怨自己工夫没到家，怨自己命苦。

原来，主持黄埠头村分田的是一个欺软怕硬、爱占便宜的人，该村的地痞富农占着好田不松手，以多报少搞欺骗，干部自己得了一份好田，对群众就稀里糊涂乱划片了，群众意见很大。邓小平知道后，卷着行李到黄埠头村蹲了下来，他挨家挨户地访，一块田一块田地看，问题弄清了，将那些不称职的干部一个个撤换了，重新组织贫农团对土地实行丈量，将田按肥瘦水源分为甲乙丙三类，然后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和劳力进行重新分配，肥瘦分均，多少拉平，并留出了部分好田作为红军公田。这样一来，问题很快解决了。憨厚的黄木生来到自己新分到的田里，抓起一把黑黝黝的泥土激动不已，他说：“这回我才算真正翻身了。”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了，干部群众无不欢欣鼓舞。这时，邓小平的脑子又转开了。他想，建都瑞金，住的吃的用的都要增加，这给原本就很薄弱的瑞金经济带来更大的困难，眼下必须借着这股东风，把喜庆当动力，将瑞金的生产建设搞上去。“一苏”大会一结束，他把县委、县苏干部找了来，很郑重地和大家商量：“瑞金的地位提高了，担子也更重了。必须多想几条办法，打通几年路子发展瑞金经济，既要保证中央机关的生活需要，还要保障红军的供给，也不能让人民群众挨冻受饿。”

会议结束后，一个确保农业丰收、发展瑞金经济的运动在全县全面展开了。兴修石水、武阳水库的工程破土动工，壬田、桃阳、安治等区的水坝渠道修整也开始了，纸槽厂、纸烟厂、被服厂、硝盐厂相继开办，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建立起来了，劳动互助队、妇女耕田队、积肥冲击队在劳动竞赛中干得热火朝天。

主政清廉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全县上下出现了几次踊跃报名加入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的高潮。对这些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邓小平明确地说：“共产党和青年团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在这里是没有什么个人便宜可占的，打仗要冲锋在前，危险困难的工作要抢着干，筹粮买公债要占大头，分田分物则要靠后边，这些你们都愿意吗？”大伙说：“邓书记，我们入党

团组织就是图个带头，如今我们想多出点力你们还不允许呢。”

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群众的觉悟和革命热情确实很高，对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号召，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热烈响应，对于党和政府的任务、困难，人民群众积极完成，主动分忧。县委书记邓小平主政清廉，给广大群众以极大的感召力。

1931年9月，新的县苏成立不久，县苏主席黄正就利用职权，非法向工人摊派生活津贴费，搜刮工人血汗，工人群众反映到县委书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当即组织人调查核实，召集会议决定严肃处理，有的同志说黄正以前做过不少革命工作，请求给予从宽处理。邓小平毫不含糊他说：这是原则问题，来不得感情用事，如让这种人继续呆在苏维埃政府里，只能败坏党和政府的名声。会议决定撤销黄正县苏主席职务，向全体工人作检查，退赔全部款项。

黄正问题的出现，在邓小平思想上引起强烈震动。他召集干部们推心置腹地讲：要让群众信赖苏维埃政权，就要真正代表人民，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得人心者得天下”，苏维埃政权虽小，可她是第一次与群众见面，她在群众中的声誉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啊！

为了及时堵住漏洞，邓小平挑选了几个积极得力的干部充实到县委监察机构，在县、区、乡、学校、厂矿设立了举报箱，在集市圩场开辟了“黑板”专栏，发动群众对于部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消极怠工、侵犯群众利益等现象进行检举揭发，一旦发现问题，经查实后就立即处理。

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领导自己的模范行为。邓小平对自己的要求是更加严格的。他任瑞金县委书记十个余月，住过祠堂、庙宇，大多数时间住在群众家里。为了方便工作，他的住处大的挪迁就有5次，聚和店、同善社、顾粟宫、东方庙、白屋子，临时性住处就更多了。他喜欢和群众在一起，哪里有问题就搬到哪里去办公，吃饭时他蹲在板凳上和群众围在一起吃，常吃的是稀粥加青菜。他吃红薯从来不剥皮，他常常风趣地对群众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浪打，丢了太可惜。”

“对群众，他能办到的都办到了。对自己他却那样无情。”群众从内心夸赞自己的邓书记。

（原载《红都纪事》，鹭江出版社1991年8月版）

群众的贴心人 邹书春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工作很忙，但对干部群众的生活极为关心，经常抽空到老表家去走走，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帮助干部、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县城红属杨老汉，老伴死得早，两个儿子都参加了红军，家里用水都是工会干部轮着挑，老汉心里很过意不去。一天，杨老汉起了个大早，想自己去挑水，省得工会的干部总把他的事儿记挂在心头。可是，没等到杨老汉走到井边，就被早起的邓小平看见。邓小平上前抢下杨老汉的扁担，放到自己的肩上，对杨老汉说：怎么你来挑水？不要累坏了身子骨。事后，邓小平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时时刻刻都要关心群众的生活，了解群众的疾苦。群众有困难，干部要千方百计帮助他们解决，处处都要为人民办实事。

有一位在县苏政府工作的干部，家里老母亲有病长年卧床，老婆又体弱多病，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子。这位干部被家庭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有点钱都用来给家人抓药治病了，家里常常无米下锅，只好用野菜充饥。但这位干部从没有向组织上诉过苦。有天傍晚，这位干部到城郊去挖野菜回来，正碰上了邓小平，邓小平见他躲躲藏藏，便主动上前打招呼。只见这位干部手里提着满篮子的野菜。邓小平心里明白了八九分，便问他有什么困难。这位干部不肯说，在邓小平的催促下，才把家中的情况说了出来。小平回到县委，把自己结存的2块银元和10来斤大米叫通讯员连夜送到这位干部的家里。

邓小平一心扑在工作上。在瑞金不到1年的时间里，便把全县各项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然而，对于自己，他却从下搞特殊。他到瑞金后，住的是老百姓的民房，有时甚至住祠堂、庙宇。他没有丝毫官架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1931年10月，瑞金的边区新陂、渡头急需派干部去打开新局面，帮助建立政权机构。黄柏区的刘启明等人接到县委通知，到县委报到。他们刚走进县委大门，邓小平就满面笑容的出来迎接，同他们一一握手说：路上辛苦了。并带他们到自己的房间里休息，倒茶打水，然后再布置工作。晚上，邓小平又到他们房间里看望他们，同他们拉家常，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个人工作等情况以及当前的生产和革命斗争。邓小平要求他们，下去应该迅速地健全党的组织，把广大的穷苦群众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武装，以便随时镇压残余的反动武装。同时，应该经常地很好地深入群众，同当地的群众打成一片。新区的情况很复杂，要时刻提高警惕，防止敌人造谣破坏。小平同志这种简朴而又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使刘启明等人深受感动。

（摘自《苏区干部好作风》，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书记带头搞优抚 萧成锦

在山峦重叠、地势险要的粤赣边境，有一个闻名遐迩的重镇——筠门岭。这里是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交界点，是通往广东、福建的“咽喉”。1932年7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迎着斗争的风雨在筠门岭坝下宣告成立。从此，湘水两岸的人民一扫积在心中的阴霾，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1932年春，家住筠门岭小吉村的红军战士刘泮林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由于当时优抚工作做得不够，刘泮林家一家7口，分到的田地无人帮耕。转眼到了这年夏收夏种大忙季节，刘家十亩田的稻谷，在亲友的帮助下总算收了回来，可是还得耕和种呀。季节催人，亲友们也顾不过来，急得刘泮林的爱人刘嫂团团转。

过了一二大，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来检查工作，有个乡干部把烈属刘嫂家中的困难向他反映了。邓小平说：“知道了。他家的田由我们耕种。”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邓小平便派了几名干部战士帮刘嫂家翻地耙田。田耙好后，他又亲自带领干部战士帮刘家蒔田，一连蒔了三天，完成了抢种任务。刘嫂感动得热泪盈眶，泮林的老父亲更是激动万分，几次拉着邓小平的手，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事后，邓小平专门召开了一次各区、乡干部会议，会上反复强调了优抚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关心群众，优抚工作尤其要做好。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纠正优抚工作中的偏差。会后，各区、乡都修订了优抚措施，组织了帮耕队、代耕队，健全了“共产主义星期六”活动制度。逢年过节，还组织人员登门访问，解除了参军战士的后顾之忧。

（原载《红星照征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肩负党的重托来会昌 杨衍芬

1931年11月27日，红军一举攻克了会昌城。接着，成立了中共会昌县委。1932年1月15日，召开了会昌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会昌县苏维埃政府，3月，召开了会昌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古柏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会昌县委。5月，古柏同志调任江西省裁判部长，邓小平受党的重托，从瑞金来到会昌接任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地方党政军工作。

邓小平刚来会昌几天就了解到：由于会昌解放才几个月，城外还存有一小股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威胁着苏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因此，他立即主持召开了有十四个区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会议决定加强巡逻和搜索，并派出一些赤卫军继续清剿“靖卫团”的残余。邓小平还经常亲自在深夜持着驳壳枪，巡视在城东步云桥上，时刻关心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实行“共产主义礼拜六”的活动，在当时是一项重要工作。邓小平经常带领县委和少共县委机关的干部，到县城水东附近帮助红军家属劳动，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多做半天工。”

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战人威胁着苏区的生产。但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摆脱剥削后的会昌苏区人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县的生产蓬勃发展。1932年会昌全县取得了农业生产大丰收，比1931年增产20%，超过了革命前任何一年的产量。

（原载《风景这边独好》，《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问病到床前

中共会昌县委党史办公室

八月盛夏，骄阳似火，邓小平带着几个干部到芙蓉寨检查地方武装工作。当他得知芙蓉寨模范营排长朱富昌患重病，无钱医治，卧床不起时，便立即来到朱富昌的病室慰问。朱富昌看见邓小平亲自来看望，病情霎时好了许多，想翻起身来向邓小平道谢。站在床沿的邓小平连忙招呼他快躺下，随即又从口袋里拿出平时省下来的二十元钱交给朱富昌，要他家里人快去请医师治疗。朱富昌感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想把钱交还给邓小平。邓小平摆摆手，和蔼他说：“安心把病治好。”

通过治疗，朱富昌很快恢复了健康。不久，他提着一篮鸡蛋去酬谢邓小平，邓小平一见朱富昌身体已经恢复，非常高兴，拉他坐下，鼓励他继续做好工作，保持模范营的光荣称号。朱富昌感激不已，路上想好一肚子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只是指着篮子说：“邓书记，您为我们操碎了心，这几个鸡蛋请收下，补补身子！”邓小平说啥也不收，亲切地对他说：“富昌同志，你的病刚好，更需要营养，这鸡蛋你自己吃吧。”说完，邓小平又把鸡蛋让朱富昌带回去了。

这年秋天，盘踞在寻乌的反动军阀谢嘉猷带领一大帮人马骚扰大墩乡。邓小平率领地方武装数百人与敌军作战。部队刚刚部署好，不料敌军人多势众，又从侧面突然袭击过来，我方情况十分不利。就在这危急之时，下受派遣之列的朱富昌闻讯后，立即率领模范营赶来。战士们如同猛虎下山，用梭标、大刀与敌军展开了肉搏。激战十多分钟，杀得敌军落荒而逃，战斗获得了胜利。事后，邓小平拍着朱富昌的肩膀夸赞道：“不错，有胆有识，大智大勇。”朱富昌腼腆地回答：“多亏邓书记的关怀、教导！”

（原载《会昌县革命传统教育资料》，1991年5月编）

一杯清茶 严修余

1932年秋天，地处中央苏区南线的会寻安三县都是边界地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拉锯式战争时而发生，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走马上任不久，便来到寻乌县视察工作。

适逢寻乌县委书记梁锡古工作变动，调中央苏区瑞金另行分配工作，派胡荣佳接任寻乌县委书记。县委原先打算举行一次迎送晚会，热热闹闹，聊表盛意。

县委的一位同志见邓小平来了，忙把自己的打算向小平作了汇报：“梁锡古、胡荣佳两位领导同志在各自的岗位上，身先士卒，劳苦功高，如今他们一个走，一个来，我们县委准备借此机会设便宴为他们饯行、洗尘，让走者愉快，来者放心！”

邓小平明白其意，忙劝导说，“服从组织需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干部交流是常有的事，不必大张旗鼓。再说，我们现在财政还很困难。我提议一杯清茶话迎送。”

在小平的提议下，县委改变了原先准备“热闹一番”的打算，每人只备了一杯清茶，由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了这次别开生面的迎送茶话会。

（原载《伟人风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吃红米饭闹革命前途无量”

杨衍芬

一九三二年九月，正当秋风送爽丹桂飘香的季节。一天，罗塘乡苏主席周月星接到去三分区指挥部驻地芙蓉寨开会的通知。天刚拂晓他便打起简便行装，抄小道匆匆走了四十里山路就到了芙蓉寨，会场是设在一间大厅里，大厅两侧的圆木柱子上，贴着一副醒目的对联。上联是“蒋介石屈膝北美张学良俯首贴耳汪精卫卖身英国半斤八两一样奴才问此等廉耻安在？”下联是“张辉瓒断头东固胡祖玉亡命广昌韩福卿暴尸白石接二连三同归阴府看我军英勇如何！”大厅里已坐满了各区乡干部，邓小平在最上首，旁边坐着罗屏汉等其他中心县委和三分区的领导同志。邓小平一眼看见周月星来了，一边招呼他坐下一边说：“你的路程不用钱买啰！”周月星的脸唰地红到脖子根，一时不解其意，他腼腆地回答：“是，我的路程远一点，四十里！”邓小平呵呵地笑了一阵之后又问：“小伙子，今年几岁啦！”周月星回答说：“二十三岁！”邓小平笑着继续说：“我比你大五岁，不错，走起路来比我还快呢！”然后对着大家郑重宣布说：“你们罗塘区苏主席谢维汉同志要调到分区另行安排工作，罗塘区苏主席职务由周月星同志接任。”

会议开始了，邓小平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当前的革命斗争形势和任务，着重讲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问题。然后，他说：“筠门岭区白埠乡的‘白’字下好，我们要把它改为赤埠乡。”会议接着由各区乡汇报工作。当周月星和谢维汉汇报了罗塘区赤卫大队大队长曾昭平带了部分队员反水后到乌鸦泊当伪乡长去了的情况后，请示邓小平要发武器以巩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邓小平听后，幽默地回答：“要巩固苏维埃政权关键在于苏区军民团结对敌。至于武器嘛，有是有，不过要到敌人手里去拿！”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晌午时分，大家都围在会场门口坪上吃午饭，吃的是红糙米饭。有几个同志私下议论：“这种红糙米饭硬梆梆的，不太好吃，踏白来就更好吃些。”

邓小平同志听见后风趣他说：“红糙米饭，外红里红，营养丰富，吃了添精神长志气。前几年，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和红军战士一起，不也是吃红米饭南瓜汤坚持斗争吗？吃红米饭闹革命前途无量呵！”说得大伙心头都乐了。这顿干餐大家吃得格外香甜。

（原载《风景这边独好》，《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暗访
严修余 谢镇祥 杨远芬

1932年秋天，正是第四次反“围剿”决战前夕。当时常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探、特务化装混入苏区，探听军情。邓小平一到第三作战分区驻地会昌县筠门岭，就加强了赤色戒严工作。

有一天，一个穿短衫、戴草帽、挑货郎担的小贩，路过筠门岭儿童局负责的一个检查路口。检查站的几个儿童团手执红樱枪，雄纠纠、气昂昂地站在交叉路口放哨，儿童团员们见来了个小商贩，便上前问道：“有路条吗？”

那商贩放下担子，在口袋里翻了一阵，说：“小同志，真对不起，路条，出门时忘了带来。你们行个方便，让我过去吧。”边说边打开货笼子，拿出一大包饼干和糖果塞给儿童团员们。

儿童团员们把饼干、糖果放回货笼里，毫不客气地说：“谁要你的东西！没有路条。走！跟我们到儿童局去！”他们留下两人继续放哨。

区儿童局长小朱查问这个商贩：从哪里来？什么地方人？为什么没有路条？听着小贩用外地口音吱吱唔唔他讲不清楚，顿时想起了苏维埃主席传达县委要“提高警惕，严防特务、暗探混进苏区”的指示，于是加紧追问。

那小贩无奈，一边求情，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钞票递给小朱说：“真的是忘了带。我是好人，你就让我这一回吧！”

小朱看他来那一套，怒气冲冲地说：“谁要你的钱，我们要的是路条！”说完就和儿童团员一起，推推搡搡地把商贩送到筠门岭区政府去。

到了区政府门口，小朱进去对区苏吴主席说明情况。

吴主席仔细一辨认，忍不住呵呵大笑起来。

小朱和儿童团员们莫名其妙，愣了好一阵，吴主席才慢慢说：“你们抓错人了，他就是布置我们加强赤色戒严工作的第三作战分区政委邓小平同志，他是化妆来检查工作的。”

听了这话，小朱和儿童团员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邓小平拍拍小朱的肩膀，笑着说：“你们儿童团的工作做得不错，以后要发扬光大！”说完，打开货笼，把一大包饼干糖果送给儿童团员们，边分边笑着说：“吃吧，吃吧，这是奖励给你们的。”

儿童团员们高兴地接过糖果，连蹦带跳站岗放哨去了。

（原载《伟人风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调查清楚再处理！”

甘洁

1933年初春的一天，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带领中心县委的几个干部，冒着严寒，来到几个乡察访。回到县委时，有个绰号叫“朱胖子”的区干部前来报告说：昨天深夜，国民党自卫队队长朱培初溜回镇里，与区苏主席朱秀歧一起在“吴发记”楼上喝酒。他们俩人一边喝酒一边说：“国民党回来我们就有大官做了。”

听了“朱胖子”的汇报，大家很气愤，这分明是朱秀歧妄想叛变通敌！

邓小平听后，镇定地问：“老朱，你的报告属实吗？”

朱胖子说：“我亲眼所见，辛耳所闻，如有谎报，雷打人烧！”

听到这里，大家一致要求立即把朱秀歧抓起来。

邓小平按了按手掌，示意大家冷静。作为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十分了解部属的情况：朱秀歧平日思想坚定，工作踏实；而朱胖子为人狡诈，工作马虎，这件事定有蹊跷。于是，邓小平决定先派人去调查。

就在这时，区保卫局的干部前来报告说：“朱秀歧带枪逃跑，保卫局已派人把他抓回来了。”

这时，大家又嚷开了：“天上下雪地上白，这不是明摆着吗？不必再调查了，把朱秀歧杀了。”

邓小平说：“大家别急，还是调查清楚后再处理吧。”

第二天，邓小平亲自到朱秀歧的家乡芙蓉寨调查。群众反映，前些年朱秀歧与朱培初因争屋基险些动刀枪，他们之间有私仇，根本不可能在一起喝酒。

邓小平了解这些情况后，立即在区苏召开干部会议，并从保卫局把朱秀歧提到会上盘问。

“朱秀歧，你为何叛变通敌？”邓小平严肃地问。

“没有此事，这实在是冤枉。”朱秀歧赶紧回答。

“那你为什么逃跑呢！”“我不是逃跑，是朱胖子说朱培初溜回来了，去了鸭分村。我一听，马上就带了驳壳枪想把朱培初抓回来。可是，追至鸭公村，连朱培初的影子也没见着。这时，保卫局的人追来，不问青红皂白便下掉了我的枪，把我关到了保卫局……”

邓小平听到这，沉思片刻，便叫人把朱胖子找来，谁知朱胖子和朱培初一起逃跑了。

原来，朱胖子是隐藏在区苏的国民党特务，那天晚上在“吴发记”楼上喝酒的正是朱胖子与朱培初，两人想出这个诡计，妄想借共产党的刀，把苏区主席朱秀歧除掉。但他们没料到邓小平明察秋毫，使他们的阴谋没得逞。很快，朱培初和朱胖子被抓了回来，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这件事，使县区干部受到深刻教育。区苏主席朱秀歧更是激动不已：“如果不是邓书记，我早就含冤九泉了。”

（原载《伟人风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裤子越穿越短

刘良

苏区时期的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仅有极少的伙食费，各级干部从没有什么工资。要想添制点日常用品，只有从口中挤出点伙食尾子。

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有一条用了好几年的花格毛巾。毛巾虽然单薄无毛了，却也完整无损。大家都很奇怪，邓小平使用毛巾有什么窍门呢？一次，邓小平洗脸时，身边工作人员通过留心观察，发现他不是拧毛巾而是用两手挤，大家觉得很新鲜，就好奇地问：“邓书记，毛巾上的水，您为什么不拧一拧呢？”

“你们想想看，毛巾是线织成的，拧来拧去线就容易拧断，用手挤，就要好一些。”邓小平看着大家惊奇的样子，又笑着加了一句，“这是我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不信，你试试看，准能延长毛巾的寿命。”后来，大家也照着邓小平办法去做，果然有效。

当时，邓小平有一条灰黑色的毕叽裤子，不知是哪一年买的，但是，一看那磨得光光的样子，便知道这条裤子有些年头了。因为这条裤子上没有打补丁，所以，只有出席会议或会客时邓小平才舍得穿它。1931年11月“一苏”大会前夕，邓小平的爱人发现裤子已经磨得毛了边，就劝邓小平买条新的。她说：“开大会来的人多，你这个县委书记穿得太破烂了也说不过去呀。”

邓小平严肃地说：现在是革命的艰难时期，怎能过份讲究吃穿？和苏区的群众比，和前线的红军战士比，他们穿着粗布衣裳在火线上流血流汗，我们的情况要好多了。共产党人要讲究干净，破一点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邓小平看到裤脚破了，便让他爱人把磨毛了的裤脚挽到里面，贴上一块布重新缝好。那条裤子的裤脚破了三次，缝了三次，裤子越缝越短，邓小平却毫不在意，照常穿着它走村串户。

（原载《苏区干部好作风》，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邓小平在江西大事记

1931年

2月5日与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五十五团在广东省韶关、乐昌之间渡过武江，向江西大庾（今大余县）、崇义县方向进军。

2月6日与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五十五团经董塘镇继续向江西挺进。

2月11日红七军五十五团从湘南东岭抵达江西崇义县文英下关遇土匪文山部发生激战，击溃匪军。缴枪四十余支。

2月12日与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五十五团抵达崇义县关田。

2月14日红七军攻占崇义县城。邓小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在此休整，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打上豪分田地，帮助地方建立红色政权和武装。

2月15日在崇义县城南坛庙红七军指挥部会见中共崇义县委书记周泰侃和上（犹）崇（义）南（康）游击大队长古达培，听取他们汇报情况。

2月17日红六军与在崇义活动的红三十五军独立营取得联系，会见独立营负责同志。

2月19日红六军政治部主任许卓在崇义县长潭圩主持举办崇义、上犹县地方干部训练班，邓小平到干训班讲课。干训班为崇义、上犹苏区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2月下旬红六军前敌委员会改称“团委”，成员有余惠，许卓、李明瑞、袁任远、张翼。邓小平仍任书记。

3月7日主持召开团委会议。为了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他提议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得到团委多数成员的赞成。并商定邓小平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团委”书记职务。

3月9日在崇义县长潭会见中共赣南特委书记陈致中，研究赣南地方工作问题。

3月10日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一部和南康、上犹，崇义县反动武装，从长龙、扬眉、中稍、磨刀坑等地合围红七军五十五团。红七军得知后，立即撤出崇义县城，途经过埠、金坑和上犹县营前向遂川县大汾转移。此时，邓小平正从长潭红军医院慰问伤病员后返县城途中得知敌军截断了归路，便决定不迫赶部队而改道启程赴上海，途经广州、香港，于3月下旬乘船到达上海。

7月中旬在上海奉命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与金维映从上海乘船经广东省汕头和福建省武平、长汀，于8月初抵达瑞金。

8月初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9月中旬在瑞金主持召开庆祝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大会。

9月下旬在瑞金锦江中学主持召开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通过了肃反、优抚工作、劳动法、婚姻法、组织消费合作社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新的县苏维埃政府、县工会等主要领导和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11月7日至20日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2年

5月被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

7月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在会昌筠门岭召开。会上正式宣告成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又称：“会寻安中心县委”），

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

7月出席少共会昌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重要讲话。

7月被任命兼任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政治委员。

9月会昌县举办团干训练班，给干训班学员讲课。

在会昌县筠门岭芙蓉寨主持召开军事会议。

11月寻乌县城失守。为此，会昌中心县委召开会、寻、安三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议，研究分析寻乌县城失守后的形势，部署新的军事行动和扩大地方武装等问题。

11月中旬赴安远县视察工作，出席为纪念“十月革命节”而举行的万人“提灯”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县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中央苏区。

1933年

3月12日江西省委给会、寻、安三县发出指示信，指责三县党和团组织犯了“罗明路线错误”和“单纯防御的错误”。

3月下旬被派往万太、公略、永丰县调查处理有关问题。

3月底苏区中央局在会昌县筠门岭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错误地对会昌中心县委进行批判。31日，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决定改组会昌中心县委，由罗屏汉接任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4月中旬中共江西省委召开工作总结会议。在苏区中央局代表的压力下，以总结工作为名，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制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的领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5月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四同志的处理决议，撤销邓小平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往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到南村不久又奉命回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后主编《红星》报，直至长征。

1934年

10月10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八万余人从瑞金、长汀、于都等地出发长征。被编在“红章纵队”，随中央红军总政治部机关行动，在长征途中继续坚持主编《红星》报。

1961年

8月底参加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等问题。

9月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

9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邓小平主持起草修改定稿的《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

9月1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邓小平主持修改定稿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9月17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离开庐山回北京。

1969年

10月3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到江西劳动，要求江西省革委安排落实地方。

10月20日偕夫人卓琳和继母三人乘飞机到达南昌。

10月26日偕夫人卓琳和继母被送到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今南昌陆军学院）一号楼居住。

11月9日偕夫人开始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直至1973年2月19日离厂回北京。

1971年

11月5日参加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党员干部、职工会议，听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事件的文件。随后，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

1972年

11月12日偕夫人卓琳前往井冈山参观，途中参观了樟树四特酒厂和江西盐矿。

11月13日从吉安出发，经永新、宁冈前往井冈山茨坪，沿途参观龙源口、三湾、苍市、茅坪、黄洋界等地的战斗遗址和革命旧址旧居。

11月14日偕夫人卓琳参观双马石哨口遗址和大小井革命旧址、旧居。

11月15日参观砂冲哨口遗址和黄汹毛泽东旧居。

11月16日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和茨坪革命旧址、旧居。

11月17日离开茨坪前往泰和县，途中参观桐木岭哨口遗址。当日中午抵达泰和县城，参观泰和糖厂、插秧机厂，观看了插秧机操作表演。

11月19日离开泰和县返回南昌途中参观吉安市禾埠公社军民大队养猪场。

12月5日偕夫人卓琳前往赣南参观抵达赣州。

12月6日偕夫人卓琳抵达兴国县参观，听取县革委负责人汇报情况。随后参观了《毛主席创建苏区兴国模范县纪念馆》、《毛主席兴国调查陈列馆》、苏区长冈乡消费合作社旧址和长冈水电站。

12月7日离开兴国县前往会昌县参观，途中参观干都县城革命旧址、旧居和中央红军长征过贡江的渡口遗址。

12月8日参观会昌县周田盐矿、县苏维埃政府旧址和物资交易会。当日下午前往文武坝参观苏区粤赣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和毛泽东旧居，随后前往瑞金。

12月9日参观瑞金县沙洲坝、叶坪、云石山等地的革命旧址、旧居。

12月10日听取瑞金县革委负责同志汇报情况。参观瑞金机床厂、电线厂、糖厂、工艺美术厂，走访群众家庭。观看县城市容。

12月11日离开瑞金前往宁都途中参观大柏地战斗遗址。在宁都县城参观革命旧址、旧居和县农机厂。

12月12日在前往广昌途中参观宁都县黄肢公社山堂、荷树、观音讲、丁家等村的革命旧址、旧居。下午在广昌参观万年亭战斗遗址。

12月13日从广昌前往抚州途中，在沙子岭参观广昌县革命历史展览馆，在南丰县听取县革委负责同志汇报柑桔生产情况。当日下午抵达抚州后，参观抚州开关厂。

12月14日参观抚州市第一制药厂、针织内衣厂、棉纺织厂，听取抚州地革委负责同志汇报情况。

12月15日从抚州返回南昌途中参观临川县湖南公社孔庄大队。

1973年

2月7日偕夫人卓琳前往景德镇参观。
2月8日参观景德镇陶瓷馆。
2月9日参观光明等瓷厂时，询问生产和工人工资收入、生活等情况。
2月11日离开景德镇返回南昌。
2月19日告别南昌步兵学校驻地回北京，途中乘车抵达鹰潭。
2月20日在鹰潭乘福州至北京特快列车回北京。

1984年

2月21日与王震从福建途经资溪、东乡前往南昌。为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题词。

6月15日为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方志敏文集》一书题写书名。

7月为古柏烈士纪念碑题字。

8月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题写馆名。

1985年

2月24日与王震赴广州途经鹰潭时，听取鹰潭市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情况。

1986年

为毛泽覃同志纪念碑题字。

11月为瑞金中学题写校名。

1991年

9月为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题字。

1992年

1月30日南方视察深圳、珠海后赴上海途经鹰潭市时，接见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吴官正，作了重要指示。途经新余车站时接见了省委副书记刘方仁。

(马骏)

